

河明中國近代史



# 简明中国近代史

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

## 简明中国近代史

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齐齐哈尔第一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08 毫米 1/32·印张 11·字数 179,000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

统一书号：11093·9

定价：0.91元

## 毛主席语录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 毛主席语录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	5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5
二、贩毒和禁毒的斗争	8
三、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15
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战后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27
五、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33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	38
一、农民革命风暴的酝酿	38
二、从金田起义到奠都天京	45
三、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和各项政策	50
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57
五、太平天国内部阶级斗争的激化	65
六、太平天国重整革命大业	70
七、太平天国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	77
八、再接再厉的斗争	84
九、太平天国英雄们永垂不朽	90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	96
一、侵略者的新勒索和“修约”活动 .....	96
二、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	98
三、沙俄侵吞中国大片领土 .....	105
四、中国人民痛击侵略者 .....	110
五、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	113
第四章 中法战争 .....	118
一、外国资本主义魔爪伸向中国邻邦和边疆 .....	118
二、中法战争爆发 .....	125
三、人民群众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 .....	132
四、中法战后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 .....	133
第五章 中日甲午战争 .....	136
一、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的中国和朝鲜 .....	136
二、中日战争爆发 .....	139
三、《马关条约》 .....	147
四、东北和台湾同胞的反侵略斗争 .....	149
五、瓜分狂潮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	153
第六章 戊戌变法 .....	159
一、中国民族工业和资产阶级 .....	159
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	163
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 .....	168

四、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74
第七章 义和团运动	181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81
二、反帝怒潮席卷全国	189
三、八国联军武装进攻与京津保卫战	196
四、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	205
五、《辛丑条约》	209
六、义和团的反帝精神永放光芒	211
第八章 辛亥革命	218
一、帝国主义角逐下的中国	218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勃兴	225
三、中国同盟会	235
四、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君主立宪派的论战	239
五、革命形势的跃进	246
六、武昌起义	260
七、武昌起义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	265
八、南京临时政府和“南北议和”	273
九、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	280
第九章 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283
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283
二、“二次革命”	287
三、短命的“洪宪王朝”	289



四、张勋“复辟”的前后·····	302
五、孙中山号召下的“护法运动”·····	309
<b>第十章 中国人民的新觉醒</b> ·····	<b>314</b>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314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318
三、打倒孔家店·····	324
四、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332
<b>附录：大事年表</b> ·····	<b>335</b>

## 前 言

中国近代史，一般是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止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充满着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的激烈斗争。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犯中国等侵华战争，从中国攫取到领事裁判权、租界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开矿设厂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传教等一系列侵略特权，把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两大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成为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风雷激荡，

浪潮翻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

翻开近代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从广州三元里点燃的反侵略的革命怒火，到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伟大革命；从台湾同胞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浴血奋战，到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国农民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农民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断动摇、削弱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斗争实践证明，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但是，农民受到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指导革命，因而不能最后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十九世纪中期，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近代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虽然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积极性，但是他们敌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严重幻想，结果历史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既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也不敢发动广大农民铲除半殖民地半封建

制度。因此，也不能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引向彻底胜利。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灭。就这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这是亿万人民长期英勇斗争和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主席在洞察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为中国革命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阶级斗争规律的正确路线，引导我国各族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结晶。它为我们正确的认识和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

苏修叛徒集团策划出笼的由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就是歪曲、篡改近代中国历史的大毒草。

苏修《中国近代史》的炮制者,用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及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历史,竭力替帝国主义列强,特别为沙皇俄国的侵华罪行辩护,为中外反动派涂脂抹粉,恶毒攻击诽谤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彻底暴露出苏修叛徒集团反华反共反革命和称霸世界的丑恶面目。

学点中国近代史,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学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以便更好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 第一章 鸦片战争

##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经济是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过着“食租衣税”的寄生生活。广大农民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鸦片战争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如大官僚琦善占有土地二百五十万亩。封建剥削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等省的矿业、纺织业、冶铁、陶瓷业等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是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政权。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已走上衰落道路，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紊乱，“官以贿成，刑以钱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五八九页。（以下引《毛泽东选集》文章，均为此版本，不再注明版本）

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以农民为主体的白莲教和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日渐活跃。国内各族人民反抗封建主义的斗争，震撼着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文化思想上，竭力鼓吹宋明理学，把孔孟儒家思想做为束缚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鸦片战争前，中国文化思想领域里充满着令人窒息沉闷的空气。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急剧发展的时期。开辟新的商品市场成为资产阶级十分强烈的要求。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后，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接着法国和美国也实现了巨大的技术改革。随着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便以更快地速度发展起来。

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开辟海外市场，缓和国内社会矛盾，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掠夺殖民地的战争，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资产阶级贪婪、残暴的反动本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

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sup>①</sup>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过缓慢发展后，又进入一个迅速上升的时期。

英国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走遍全球，疯狂扩张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十九世纪初，英国在印度建立了殖民统治，做为向东方扩展的基地。1819年武装占领了新加坡，1824年开始侵入缅甸。接着便把它的侵略矛头指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

法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虽不及英国，但同样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

**中国人民反对殖民者的斗争** 早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就侵入我国领土澳门，西班牙、荷兰接踵而来。此后，英、法、美也相继从海上侵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沙皇俄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就从陆路侵犯我国北方领土。1643年起，沙俄侵略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揭开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序幕。沙俄哥萨克强占尼布楚、雅克萨等地，筑垒屯兵，蓄意把我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据为己有，甚至两次武装侵入松花江流域。沙俄侵略者进入黑龙江地区后，打家劫舍，焚毁住宅，奸淫掳掠，甚至灭绝人性捕杀我国当地居民为食。这批喝人血、吃人肉沙俄殖民强盗的暴行，完全暴露出沙俄侵略者的

---

<sup>①</sup>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五四五页。



豺狼本性。

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对野蛮残暴的入侵者展开了激烈的反抗。十六世纪，宁波一带人民痛歼了葡萄牙侵略者。十七世纪，郑成功率军赶走了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祖国的领土台湾。黑龙江流域的各族人民，面对沙俄的疯狂侵略，奋起抵抗，并请求清政府派兵驱逐入侵者。清政府多次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沙俄侵略者撤出中国领土，但沙俄赖着不走。清政府为了捍卫领土主权，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在当地广大人民支持下，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制止了沙俄侵略势力向黑龙江的进一步扩张。1689年9月8日，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至海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当时都是中国的内河。1727年9月1日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又确定了中俄两国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边界了）。至于西段，当时中国的疆界在巴尔喀什湖，而俄国的疆界则在黑海一带，两国的疆界相距很远，并不接壤。

## 二、贩毒和禁毒的斗争

可耻的“鸦片贸易” 在中外贸易中，中国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侵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而且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购买力很低，再加上清政府对外实行限制贸易政策，因此，英、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品，如棉纱、棉布、呢绒等在中国销路不广。相反地中国劳动人民生产的优质茶、丝等，却畅销海外。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欧美资产阶级为了获取中国特产的茶、丝，就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据统计十八世纪一百年中，英国输入中国的现银达两亿余元。马克思指出：“在 1830 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sup>①</sup> 英、美资产阶级为了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地位，于是，采用罪恶的“鸦片贸易”政策，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卑劣手段。

鸦片通称大烟，具有强烈的麻醉性能。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占领鸦片产地印度的孟加拉省之后，便强迫印度农民大量种植鸦片，调制后，交给走私商人运往中国。美国鸦片贩子也不借绕大半个地球从土耳其、波斯搜集鸦片运往中国。于是，鸦片这股毒流，便滔滔不断地向中国倾泻，输入的数量急骤增加。1800 年输入的鸦片有二千箱（每箱约一百斤），1821 年为五千箱，1831 年猛增至一万多箱，到 1837 年竟高达三万九千箱，价值二千五

<sup>①</sup>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页。

百万美元。

鸦片的大量输入，使清政府受到严重威胁。从 1796 年起，清政府多次下令查禁鸦片。而英、美等国鸦片贩子在其政府的包庇下，便用偷运和武装走私、贿赂官吏、收买汉奸等卑劣手段破坏中国政府的禁令，将鸦片继续运入中国。英国鸦片贩子在武装保护下，将伶仃岛做为最大的鸦片贩运站，鸦片趸船增加到二十多只，囤存的鸦片增加二、三万箱。美国鸦片贩子的走私不仅有美国领事的包庇，而且经常在美国国旗的掩护下进行。美国强盗还专门建造了武装偷运鸦片的船只“飞剪船”，装备有各种武器，他们狂妄地叫嚣：“决不因一两只中国兵船而改变航线”。

鸦片的偷运和走私所以越来越猖狂，是与英、美鸦片贩子用贿赂的手段，收买清政府官吏分不开的。因为清政府尽管明文禁止贩毒和吸毒，但因政治腐败，各级官吏贪赃枉法，没有也不可能认真执行这些措施，这就为包庇走私，收纳贿赂以可乘之机。同时，吸食鸦片又成为清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欢迎鸦片输入；因而烟毒更加泛滥。当时马克思曾尖锐的指出：“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

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sup>①</sup>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sup>②</sup>英、美侵略者在鸦片走私中获取了惊人的利润。1813年，东印度公司每箱鸦片的拍卖价格超过成本费九倍多；英属印度政府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收税，1830年鸦片税占全年总收入十分之一；对鸦片贩子来说贩毒更是一本万利，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供认，每箱鸦片的利润可高达一千元。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说：“鸦片贸易，就象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由于“鸦片贸易”既可开辟中国市场，又可以发展印度市场，英国政府还可得到大宗的茶税收入，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丧心病狂地坚持这一罪恶的“鸦片贸易”政策。

鸦片给英、美侵略者带去了优厚利润；而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

首先，烟毒泛滥全国。据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后几年的估计，当时吸毒人数少在二百万以上，遍及十几省。它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他们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

---

<sup>①</sup>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卷，第五八八页。

<sup>②</sup>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页。

其次，鸦片输入打破了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长期优势，中国出口的茶、丝等不足抵偿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在1820年到1840年的二十年间，大约流出的白银在一亿两以上，造成清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白银外流，银价上涨，使“银贵钱贱”的危机愈益严重。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铜钱）两种，从前白银一两换制钱一千文左右，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换一两白银则要一千六、七百元制钱。劳动人民以制钱按银钱比价缴纳赋税，实际上又直接增加了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

**正义的禁烟运动** 深受鸦片之害的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坚决要求严禁鸦片。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愤怒呼声，有力地推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吏也起来要求禁烟。因此，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弛禁和严禁两派，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弛禁派是以穆彰阿（首席军机大臣）、琦善（直隶总督）为代表的鸦片受贿集团。他们以“圣朝宽大”为借口，主张取消鸦片禁令，准许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同时，提倡中国自己种植，准许自由贩卖和吸食。

严禁派是由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进士出身，1838年任湖广总督）、黄爵滋（1793—1853年，江西宜黄人，进士出身，鸿胪寺卿）等为首的爱国官员组成。他们肯于正视现实，在群众禁烟运动的

推动下，看到“鸦片以土易银”的严重后果，主张用严刑禁止官民吸食的办法来抵制鸦片的输入。1838年9月，林则徐上了一个奏折说：现在鸦片已流毒全国，为害极大，非严刑禁止不可。“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在奏折中指出的“兵弱银荒”正触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要害。道光皇帝为了摆脱封建统治危机，暂时接受了林则徐的禁烟主张。1838年12月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广大人民的禁烟要求和正义斗争推动下，又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1775—1846，江苏江宁人，进士出身）的协助，更增强了禁烟的信心，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一面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于3月18日通知外国鸦片贩子，要他们在三天内，将所存鸦片数量，造具清册，听候处理。并要他们出具保证书，声明以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如再夹带，一经查出，货物充公，犯人处死。

雷厉风行的禁烟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侵略者。英国政府代表义律，勾结美国鸦片贩子极力破坏禁烟运动。他指令各国烟贩，拒缴鸦片，拒写保证，并发出战争叫嚣。侵略者的猖狂反扑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群众包围了商馆，强烈要求对侵略者给以必要的惩罚。

在群众斗争推动下，林则徐派兵封锁了商馆，断绝了商馆与鸦片烟船的交通往来。义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叫英、美烟贩缴烟。

在广东收缴的鸦片共有二万多箱，合计二百多万斤。林则徐从1839年6月3日起到25日，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将全部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上用生石灰灌海水销毁。



虎 门 销 烟

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是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同时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严禁鸦片的坚定立场和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时不少外国商船，填写书面保证，陆续恢复贸易。林则徐又积极筹备战守，认真防御侵略者的武力进攻。他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督促水师加紧操练，修筑炮台，增设大炮，在重要海口布置木排，铁链，严阵以待。

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提倡民间自行组织乡勇团练，

又召募水勇丁壮五千人，教练他们袭击敌船和刺探敌情的技能，在必要时协助水师作战。英国侵略者义律为了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在沿海一带进行了接二连三的军事挑衅。1839年7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地方行凶，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严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拒不交凶。林则徐为维护中国主权，下令断绝对英国侵略者柴米食物的供应，义律竟进行武装挑衅。9月初，义律率军舰和快艇向九龙山口的水师开炮，遭到了中国水师的迎头痛击。11月初，又有一艘英国商船出具书面保证，要求进口。义律派兵船在穿鼻洋面横加阻拦，并发炮攻击中国水师船，挑起了激烈的穿鼻海战。

义律在穿鼻洋挑衅失败后，仍不甘心，连续在珠江口的官涌一带进行六次挑衅，都被击败。1840年1月，林则徐奉命在广州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

### 三、鸦片战争的爆发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英国发动侵略战争** 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多年，英国资产阶级和鸦片贩子，就积极进行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准备。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据此制定出侵略方案。1836年英国资本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经常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督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1839年8月，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伦敦、曼彻



斯特、利物浦等地的英国资产阶级侵华集团，立即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也狂妄地表示，对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10月初，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发动侵略战争。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全权代表，负责向清政府进行军事和外交讹诈。1840年4月，英国政府组成一支包括军舰十六艘，运输舰二十艘，武装汽艇四艘，共载炮五百四十门，士兵四千人的侵略军，开赴中国，挑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当英国资产阶级发出战争叫嚣的时候，美国在广州的烟贩也上书国会，请求美国政府采取直接行动。当时美国派遣一支海军到中国海面，替英国侵略军壮胆助威。

**广东、福建军民的坚决抵抗** 1840年6月初，英国舰队陆续到达广东海面，于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

英国侵略军的大举进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矛盾的上升，促进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

位。”<sup>①</sup>正是在这样条件下，中国暂时地形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抵抗派和人民群众共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局面。但是，地主阶级与人民根本对立的反动立场，决定了清朝政府不可能真正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抵抗外来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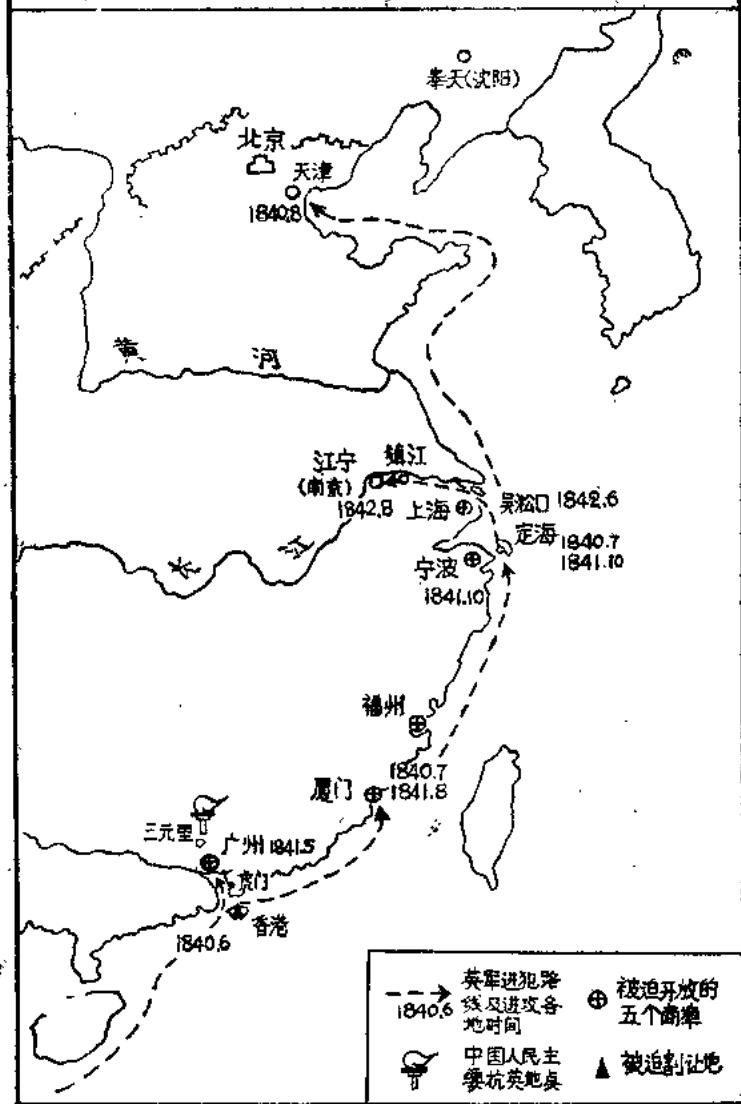
英国侵略军到中国后，首先企图进犯广东。这时，林则徐在广东认真备战，严密防守。他号召人民，如果英国兵船闯进内河，准许“人人持刀痛杀”。当地的渔民、巨户（水上居民）、盐民纷纷起来抵抗，积极参加抗英斗争。他们和爱国官兵一道，在陆地持刀杀敌，在水上奇袭火攻，使英军胆颤心惊。英国侵略者见广东戒备森严，无隙可乘，7月，分兵北上，窜犯福建厦门和浙江定海。福建军民在闽浙总督邓廷桢的率领下，挫败了侵略者的进犯。但是浙江定海却毫无应战准备，几乎未遇抵抗就被侵略军攻陷。8月，英军侵入天津海口，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英国政府给清朝政府的照会，提出赔偿烟价、割让沿海岛屿、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等等侵略特权，并声称这个目的不达到，便继续以武力逼令清政府屈服。

**定海失陷后，清政府妥协势力的抬头**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贯反对禁烟的穆彰阿、琦善等卖国贼，

---

<sup>①</sup>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九五—二九六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1840—1842年)



以定海失陷为口实，恶毒攻击禁烟运动与抵抗派，诽谤林则徐“上年广东缴烟，~~准~~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并扬言英军“船坚炮利，难以取胜”，“边衅一开，兵结莫释。”制造卖国投降理论，为侵略者张目。在侵略军的炮火威胁之下，道光皇帝由抵抗转为妥协，并向侵略者保证“重治林则徐”，以换取侵略军暂时南返。

这时，林则徐在广东人民的积极支持下，于广东磨刀洋等处连获小胜。道光又斥责他“贪功启衅”，把他撤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和侵略军谈判，走上屈辱投降的可耻道路。

1840年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他抱定投降宗旨，拆毁要塞炮台，裁减兵船，解散水勇，千方百计讨好侵略者。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路线，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在谈判过程中，侵略者为压服琦善，取得谈判的有力地位，于1841年1月初，义律率侵略军突然袭占大角、沙角炮台，威胁虎门。琦善被吓倒，与义律秘密签订《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开放广州等。六天后，英军侵占了香港。

《穿鼻草约》的签定，结束了战争的第一阶段。

战争第二阶段从1841年1月到5月。

道光皇帝原以为只要惩办林则徐、邓廷桢，默许恢复鸦片走私，侵略者就会“罢兵修好”，“终兵息战”。但是《穿鼻草约》的签订，却大大超出了道光为谋求妥协而

准备付出的代价。2月，接到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报。全国舆论纷纷，要求罢免琦善，起用林、邓，继续对英作战。道光帝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了维护封建体制，又倾向抗战，下令逮捕琦善，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各省军队开赴广东，对英宣战。

此时，义律风闻清政府改变态度，决定先发制人，于1841年2月末发动突然袭击，进攻虎门炮台。在人民抗英斗争影响下，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领爱国官兵坚守虎门。终因寡不敌众和尚未离职的琦善不发援兵，关天培和将士数百人一同壮烈战死，接着侵略军进逼广州城外。

4月中旬，奕山到了广州。这个极端腐朽的反动皇族到广州后给道光帝的第一个奏报即别有用心的说，“患不在外而在内”。大骂抗英群众为“贼党”，公然提出“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对抗英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奕山对于人民的恐惧与仇恨，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尖锐的阶级矛盾。5月下旬，奕山在侥倖取胜的心理支配下进行冒险夜袭，第二天英军发动进攻，就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在侵略军大炮威胁下，奕山向英军乞降，订立了《广州和约》。接着率军退到广州城外六十里，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两。战争的第二阶段结束。

**英军扩大侵略战争，清政府妥协投降 1841年4**

月，英政府接到《穿鼻草约》，认为在战胜的条件下，“同意了极不够的条件”，不予批准。决定改派狡诈的殖民老手璞鼎查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战争。英政府指示璞鼎查只有清政府无条件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条件，才能停止侵略战争。

1841年8月战争进入第三阶段。璞鼎查率侵略军到达中国沿海后，8月侵略军窜犯厦门。10月初进攻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爱国士兵五千人浴血奋战六昼夜，全军壮烈战死，定海失陷。接着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亲自指挥战斗，他号召军民“刀矛并施，同心痛杀”入侵之敌，但是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首先逃走，裕谦力战不支，投河自尽，镇海失陷。不久宁波也被侵占。这时英军两度入侵台湾，台湾军民一致抗敌，使英国侵占台湾的企图未能得逞。

浙东连失定海、镇海和宁波三城，清政府再度调兵遣将，派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调集各省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奕经同奕山同样反动透顶，腐朽不堪，他一路游山玩水，成天沉醉于酒色歌舞之中，走了四个月才到前线。到浙江后仍不作战守准备。1842年3月发动了毫无准备地收复三城的战斗，结果大败而回。浙东失败后，清政府从此不敢再战，派耆英、伊里布赴浙江试探议和条件，决定对侵略者妥协投降。

清政府在战争中腐败无能，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恨。

庞大的军费开支，各级官吏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反动军队的勒索骚扰，直接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这一切都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各地人民的抗租和小规模的斗争愈来愈多。1842年初，湖北崇阳县爆发了钟人杰领导的会党起义，占县城，杀知县，分封官职，树旗称王。清政府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决心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把调往江浙的清军改调湖北，镇压钟人杰起义。随即派耆英和伊里布到江浙向侵略者乞降。

英国侵略者并不理睬清政府的求和要求，仍按原定的侵略计划向长江进犯，企图占领镇江、南京扼断漕运，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国家主权。1842年6月，英军进攻长江口吴淞炮台，守将陈化成率部奋起抵抗，坚守炮台，守军官兵全部阵亡。不久，上海、宝山，相继失陷。7月，侵略军陷镇江。8月，英军到达南京江面。这时，清朝反动政府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侵略要求，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sup>①</sup> 中国人民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态度，走着与封建统治阶级根本不同的道路。

---

<sup>①</sup>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八六页。

英国侵略军的狰狞面目，进一步暴露了殖民主义者的野蛮凶残的阶级本性。侵略者所到之处，“无室不空，无家不破”，“无日不火”，其屠杀之惨更是“腐尸塞路，水为不流”。仅在宁波这个富庶的商业中心，他们就从府库中抢走了十二万元左右的现金和纹银，又抢走了可供侵略军两年之用的粮食。他们对于和平居民，更是枪打剑击，甚至周身灌注水银，活剥人皮。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广州战役开始后，城郊的人民群众立即自动起来参战。广东的香山、顺德一带人民组织义勇五百余人袭击白鹅潭的侵略军，新安人民组织火船队，夜袭停泊在虎门的英国兵船。反侵略的革命烈火遍地燃烧。三元里人民的反侵略怒火更把英国侵略者烧得焦头烂额，使纸老虎原形毕露。

三元里是靠近广州城北的一个村落。广州战役开始后，侵略军的暴行，清朝官吏无耻投降，早已使三元里人民怒火万丈，忍无可忍。1841年5月29日早晨，当一队英军来三元里抢劫时，三元里人民奋起抵抗，当场打死侵略军七、八人，其余的夹着尾巴逃跑了。

三元里人民为了迎击敌人的报复，在菜农韦绍光的领导下，于三元里古庙召开了大会，举行誓师。他们以三星旗为令旗，约定“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打死无怨”，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时，又积极联络各乡农民，迅速组成



一支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当天下午，一百零三乡的代表齐集牛栏岗开会。决定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一齐出动，各乡自成单位。约定“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决心与侵略军决一死战。

5月30日早上，英军司令卧乌古率侵略军一千余人从四方炮台出发，企图窜扰三元里。三元里人民主动应战。牵着敌人鼻子往早有埋伏的牛栏岗走去。敌人趾高气扬一意穷追，结果陷入人民群众的伏击网。这时埋伏在牛栏岗的上万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猛冲过去，把英军团团围住，实行分段截杀。中午雷雨交加，“平英团”的英雄们，更增添了战斗豪情。他们愈战愈勇，农民颜浩长当场刺死敌少校军官毕霞，英军旗手也当场毙命。侵略成性的强盗，在“平英团”的打击下，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无法突围，形成束手被擒，坐以待毙之势。在战斗中，三元里人民奋勇争先，原来规定要撤退的妇女老弱，也都前来助战，甚至儿童也在喊杀助阵。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正如当时人民所描写的“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出现了“妇女齐心已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的英勇杀敌的壮烈场面，充分显示出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无穷威力。

三元里大捷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广州城郊各个乡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更加激励了他们的斗志。5月31日，

广州附近的番禺、花县、南海、增城、从化等县四百余乡数万群众与“平英团”会合，把四方炮台围个水泄不通。

英国侵略军陷入绝境，惊恐万状。义律急忙派人以重新进攻广州相威胁，要奕山驱散群众。奕山唯命是从，立即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为英军解围。余保纯软硬兼施，令当地的地主士绅帮助“说服”群众。由于当时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处在自发阶段，对清朝统治者卖国投降的本质缺乏认识，加上参加“平英团”的一些士绅妥协调摇，致使英国侵略者在卖国官吏的保护下暂时逃脱了复灭的命运。

6月1日，侵略军逃离广州。7日，义律为掩饰败绩，贴出布告，诬蔑群众“刁顽”，并威吓中国人民“后毋再犯”。广州人民立即发出《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严斥侵略者的罪行，庄严宣告：“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恨也。”同时对于“惜命如山”、“畏犬如虎”的卖国贼也严加申斥，历数他们“割地输金”的罪恶行径。这篇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檄文，表达了中国人民蔑视侵略者，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揭穿了资本主义强盗的贪婪、残暴、虚伪、狡诈的丑恶嘴脸。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武装斗争的开始，“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

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sup>①</sup>为中国近百年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它推动了广东和全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使人民认识到“鬼子不足怕”，“官兵不可恃”，手持原始武器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打败全副新式武装的侵略者。它雄辩地证明了被压迫人民只要敢于拿起武器起来斗争，就能够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教育了人民，反对侵略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要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必须反对投降主义。

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相呼应的东南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此伏彼起，相互激荡，也取得很大胜利。

1841年8月，英军攻陷厦门，四处抢劫，当地人民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抵抗，使侵略军不敢久占厦门，不得不退据鼓浪屿。

英军侵占定海、宁波后，当地人民组织“黑水党”，在城乡内外到处打击敌人。

镇江失陷前后，沿江人民曾采取了夜间顺风施放火筏、火船的办法，阻挠敌人舰队前进。瓜州、仪征一带盐民，在英军侵入后，“团练义勇”九万余人，抗击侵略者，给英军以巨大的威胁。

各地人民轰轰烈烈的反英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侵略

---

<sup>①</sup>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五页。

者的嚣张气焰，增添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光辉篇章。

#### 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战后 反侵略斗争的继续

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卖国贼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侵略者威胁下，一字不易地接受了英国提出的侵略条款，在南京江面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又名《江宁条约》)。接着，英国又强迫清政府于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同年10月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

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英国侵略者攫夺了许多殖民特权，其中重要的有：

1. 割占香港。

2. 勒索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其中烟价六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3.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为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打开了门户。又规定英国可在五口派驻领事官员和“租地建屋”，以后逐步扩展为“租界”，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重要堡垒。

4. 控制关税。中国海关进出口货税率的变更，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

5. 废除“公行”，自由通商。

6. 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以后别国在中国取得侵略权益，英国必须同样享受。

7. 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了法，不仅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甚至中国政府都不能过问。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外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副枷锁。它也是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在外国侵略者的淫威下，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可耻开端。

**美、法侵略者趁火打劫** 在罪恶的鸦片输入中，美国商人是英国资产阶级最大的伙伴。鸦片战争期间，它派东印度舰队来华为英国侵略军助威，替英国商人转销商品，代购原料，充当了英国侵华战争的帮凶。《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立即派顾盛为专使，随带军舰前来中国进行侵略活动。顾盛到中国后，一面进行外交讹诈，一面对中国进行露骨的战争恫吓。清政府在美国的威逼下，派卖国老手，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与顾盛谈判。1844年7月3日，双方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也就是《中美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共四十三款，美国侵略者除取得英国所得到的全部侵略特权外，还取得一些新的特权，它更进

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1. 剥夺了中国关税的自主权。进一步规定“税率更变”，要经过美国领事官的“议允”。

2. 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美国人之间及美国人与外国侨民之间的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3. 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

4. 允准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设医院和教堂。“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sup>①</sup>

《望厦条约》是比《南京条约》更苛刻的不平等条约。顾盛在签订条约后，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这一段话正是美国强盗趁火打劫的自我招供。

法国政府也步英、美侵略者的后尘，派拉蓴尼为专使带军舰八艘前来中国，进行讹诈。拉蓴尼于1844年8月到澳门，强迫清政府于10月24日订立《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在《黄埔条约》里取得了比英、美更多的特权。条约

<sup>①</sup> 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九五页。

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个通商口岸设立教堂、医院、学校、坟地，如果有人“触犯毁坏”，清地方官要严加“治罪”。随后又迫使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法国是以天主教作为向外侵略的重要工具，法国侵略者在传教方面所取得的特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上，起了极恶劣的作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继美、法来华订约之后，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逼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这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便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了。

**广州人民反进城斗争** 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也继续有所发展。首先，在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广州人民掀起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侵略斗争。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之后，广州城乡人民纷纷以“社学”形式，组织武装力量，抵抗侵略者。

“社学”是广州城乡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其基本群众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商店店员，也有一些爱国士绅参加。“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最早成立的“社学”，是广州西北石井等百余乡群众建立的升平社学，此外有东平社学、隆平社学、南平社学等。参加社学的义勇达十多万人，在斗争中形成一支巨大的反侵略力量。其中升平社学成立最早，实际居于

领导地位。

在同外国侵略者斗争中壮大起来的“社学”，多次领导广州人民进行了反侵略斗争。

反入城斗争，是广州人民在“社学”成立后一次声势浩大的反侵略斗争。1846年1月，耆英在英国公使德庇时的威迫下，张贴告示宣布允许英人入城。立即激起群众的愤怒，撕毁告示，数千群众随即拥入广州知府衙门，吓得知府刘浚狼狈跳墙逃命，愤怒的群众烧毁他的朝珠公服。

1847年4月，德庇时率英军偷袭虎门，强行驶入内河，再次提出入城要求。在同仇敌忾的广州人民面前，侵略者退却了，耆英与英国相约两年后入城。1849年，英国香港总督文翰率军舰到虎门口外强迫清政府履行密约。广州城乡内外的人民群众，组织起十余万人的武装力量，昼夜操练，准备反击侵略者。两广总督徐广缙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拒绝英国侵略者的入城要求。侵略者也被迫宣布停止进城。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社学”组织的反侵略斗争，既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也猛烈地冲击了统治阶级的投降派。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抗精神。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反侵略思想** 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文化思想实行了严密的控制。大力提倡程



朱理学和烦琐考据，作为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学术思想界到处充满了令人窒息沉闷的空气。在连绵不断地农民起义，封建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的形势下，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龚自珍(1792—1841年，浙江仁和人)，首先预感到封建“衰世”已经到来。尖锐指出从北京到全国多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对于“鸦片贸易”，坚决主张采取法治路线，严加禁绝。他用沉痛的语言，揭露许多封建统治的贪污腐败，因循守旧等黑暗现实，打击了封建专制的淫威。提出限制大地主无限兼并土地的改革方案，渴望中国变成一个“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独立富强的国家。在鸦片战争的强烈震动和刺激下，“万马齐喑”的思想界出现了正视现实，要求学习外国的长处，以振兴祖国的进步思想倾向。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他和龚自珍、林则徐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守旧思想。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法家富国强兵的爱国传统，提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主张变革。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的杰出代表。魏源、林则徐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林则徐汇集西方知识，写成《四洲志稿》。魏源在这个基础上，又汇编成《海国图志》。魏源竭力反对顽固派把西方“船坚炮利”看做“奇技淫巧”的错误观点。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自办船厂、炮厂，加强国防，抵抗外国侵略。他的中心思想就

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希望学习外国进步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方面，他还提出一套积极防御的斗争策略，反映了魏源的爱国进步思想。

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和学习西方，是鸦片战争时期进步思潮的两个重要问题。它对整个思想界开通风气，活跃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虽然提出了同顽固守旧思想相对立的进步革新主张，但是他们与人民群众的阶级对立事实决定，只能把“师夷”、“制夷”的要求寄托在封建统治者身上，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

## 五、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sup>①</sup>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封建国家，而战后开始降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香港、澳门沦为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地。外国兵船任意巡行各口岸，破坏了中国领土、领海主权。侵略者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和关

---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八九页。

税协定权，破坏了中国司法和关税自主权。其它如开港、传教、居住等主权国家所固有的权利，也都遭到侵略者的践踏。特别是片面最惠国待遇，更是危害中国主权的最重要的殖民特权，使中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还控制了中国沿海的重要门户。外国侵略者在许多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强行划出一部分中国领土作为直接统治的“租界”，把“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这些“租界”不仅是外国侵略者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重要据点，而且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深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租界”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

东南沿海五口的开放，侵略者开设商行，垄断对外贸易，扩大商品输入，使中国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分解。如 1842 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是九十六万九千多英镑，1845 年就增加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英镑，其中主要工业品是棉布和棉纱。美国输华商品也有大幅度增加，从 1831 年的二十四万多元到 1845 年激增到二百零七万多元。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入，沉重打击了中国城乡棉纺织业。上海、松江、太仓等著名棉纺织业地区，从上海开埠后，“布市销减”“商贾不行”。厦门等地出产的土布、土棉，也被洋布、洋棉排挤，“壅滞不能出口”。广东顺德一带“女工几停其半。”棉纺织业是

中国自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遭到破坏，表明中国封建经济已经加速解体。资本主义萌芽也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扼杀，濒于毁灭的境地。

中国的茶、丝在鸦片战争前就是主要出口货物。战后，侵略者便加紧对中国茶、丝的掠夺。1842年广州输出的茶为一千七百多万磅，1844年广州、上海输出的茶激增到七千多万磅。鸦片战争前丝的出口为一万二千包，到四十年代末就增加到二万多包。中国的茶、丝生产开始带上半殖民地的性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外国资本主义在通商口岸开办企业，修筑船坞，控制对外贸易，使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外国洋行、船坞、水电、出版等企业里，都出现了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中国工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废除公行之后，还培植了一批买办商人，作为他们推销商品，掠夺中国农副产品的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些原来就是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公行商人，有些是原来的鸦片走私者。这些在鸦片战争后直接受雇于外国商行的买办，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豢养的一批洋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和深入，近代买办势力也日益发展起来，形成了反动的买办阶级。他们既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经纪人，又是外国侵略者同封建势力勾结的媒介。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变了，中国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战后，地主阶级继续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而且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此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但是战后，又增加了一个更加凶恶的敌人——外国资本主义，构成为中国社会的另一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sup>①</sup>近代中国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爆发的。中国人民担负起反帝反封建双重革命任务，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个关键，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明显地划分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学者，反华急先锋齐赫文斯基等胡说：1644年清军入关“恰好与世界史近代时期的上限——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相重合”，因此也必须以1644年做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否定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罪恶企图，就是妄图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四页。

一系列科学论断，从而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并为沙皇俄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以及掠夺中国大片领土的滔天罪行开脱罪责，为它在今天的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服务。苏修叛徒集团伪造历史，替老沙皇辩护，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sup>①</sup>

---

<sup>①</sup>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

### 一、农民革命风暴的酝酿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动荡**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深刻变化，日益明显地反映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伸进中国，加速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也进一步暴露出清政府的反动腐朽，使已经相当尖锐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sup>①</sup> 马克思还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sup>②</sup>

①、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页。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进一步加速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官僚和贵族，集中了绝大部分土地；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没有或只有极少的土地。如广西地主官僚、贵族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农民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地租剥削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许多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地主还巧立名目，强迫农民交纳各种畜产品，服无偿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结合起来向广大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同时加上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贪污盛行，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民的贫困和灾难就更加严重了。

外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后，大量鸦片走私，勒索巨额赔款，进一步增加了白银外流的严重性。这一切都造成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预示着一次农民革命的大风暴行将到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战后除了广州地区的反侵略斗争以外，十年间，从抗捐、抗粮、抗租，到攻城占地等规模不等的反封建斗争共有一百多次。这些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边远地区的回、藏、苗、瑶、壮、彝等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发生。

各地人民的斗争，以广东、广西、湖南三省规模最大，声势最盛。广西是清王朝统治比较薄弱，天地会相当活跃的地区。鸦片战争后也是全国阶级斗争比较激烈



的地区。这些省区深受鸦片战争的灾难，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怒火。残酷的封建压榨和连年灾荒，逼使成千上万陷于死亡线上的失业群众、遣散士兵和饥民也参加到斗争的行列。

鸦片战争后三省的重要农民起义有：

1843年，湖南武冈曾如炷起义。

1844年，湖南耒阳杨大鹏起义。

1845年，广西藤县邓立奇、钟敏率众起义；广东香山、新会、顺德等地农民暴动。

1847年，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雷再浩起义。广西、湖南天地会纷纷响应。

1849年，李沅发率天地会众在湖南新化起义，攻县城、杀县官、开仓库、砸监狱，转战湖南、广西边境，起义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1850年，广西全境有二、三十支起义的队伍。广西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高涨。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正是在这种漫天烽火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洪秀全的早期革命活动**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中农家庭出身。父兄耕田为生，家境贫困。七岁入塾读书，十六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被迫失学。在家帮助父兄耕田、放牛。十八岁开始充当村塾教师。他是一个深知民间疾苦，同贫苦农民有着血肉联系的农村穷苦知识分子。

洪秀全的青年时代，正处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那时也是中国人民开始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代。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火热斗争，一直激荡着洪秀全的心弦。促使着这个不满现实的青年，迅速走上革命道路。



洪秀全

洪秀全为了动员农民群众进行伟大的斗争，积极探索和寻找思想武器，认真阅读和研究了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他抛弃了其中宣扬“侵略有理”，“剥削有功”等谬论，吸取了西方原始基督教义的平等思想，结合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要求，创立了“拜上帝教”。他创造了一个革命的“皇上帝”，去反对代表反动势力的“阎罗妖”。洪秀全用“皇上帝”同“阎罗妖”对立和斗争的宗教语言，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中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

1843年洪秀全创立了农民革命组织——拜上帝会，立志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拜上帝会强调唯有上帝才是“真

神”。信奉皇上帝，不事邪神才能免除一切“灾难”。拜上帝会还向农民群众宣传了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朴素平等观念，并以此做为精神武器，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向一切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拜上帝会成立后，他的同乡、同学，乡村塾师冯云山首先加入，成为洪秀全最早的战友。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之后，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捣毁村塾中的孔丘牌位，公开举起反孔斗争的战旗。他还用通俗锋利的文笔，编写了一个“怒斥孔丘”的神话故事。皇上帝愤怒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皇上帝把畏罪私逃的孔丘令人捆起来鞭挞。孔丘“再三讨饶”“哀求不已”。最后罚到菜园种菜。洪秀全敢于向封建思想权威大胆挑战的反潮流精神，使他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在革命实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贵县，深入到贫苦农民群众当中宣传革命并进行组织活动，实践使他们感到拜上帝会的简单教义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必须结合阶级斗争现实充实发展拜上帝会的教义。洪秀全于是返回广东花县，先后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革命文献，为太平天国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这几篇革命文献中，洪秀全总结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把我国古代农民“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发展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

洪秀全首先斥责儒家的天命论，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大胆的批判和否定。洪秀全还提出重新分配财产的经济平等主张，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他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强调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贫与富平等，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欺凌掠夺。洪秀全谴责当时的社会是“陵夺斗杀之世”，“乖漓浇薄之世”，“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强烈要求、把它改造成为“公平正直之世”，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之世”。对此，洪秀全满怀信心的指出：“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中国目前正处于“夜退日升”的关头，热情地鼓舞人们进行战斗。

洪秀全还尖锐地指出了革命对象和战斗目标。他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之，惟恐不速者也。”他还特别斥责了封建皇帝，“他是何人，敢颯然称帝”？洪秀全把“皇上帝”与“阎罗妖”尖锐对立起来，从政治上划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

洪秀全撰写的战斗文献是以拜上帝会基本教义的形式，表达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想。它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剥去宗教面纱，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闪烁着农民反封建的光辉革命思想，是旗帜鲜明的反封建的战斗文献。

**紫荆山的革命星火** 当洪秀全在家乡创制革命理论时，冯云山正深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他以做苦工，当塾师为掩护，开展艰苦的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革命活动。经过三年的努力，已有三千多贫苦农民参加了拜上帝会，在这个广西贫瘠的山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形成了太平天国革命最早的一批骨干力量。

1847年8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建立了拜上帝会机关，制订了拜上帝教的仪式和纪律。他们派人四出宣传和组织群众，会众激增。同时，洪、冯率领群众捣毁象州甘王庙，打倒反革命神权，进一步提高了拜上帝会的威望。从此入会的人越来越多。到1849年，会众已达万人。拜上帝会成为一个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农民革命团体。

拜上帝会在同封建神权和地主武装的激烈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领袖的领导核心。参加领导核心的有冯云山和种山烧炭出身的杨秀清，贫农出身的肖朝贵，还有韦昌辉和石达开。韦昌辉是地主兼典当商，石达开出身于地主阶级，他们在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

参加了拜上帝会。韦、石都是当地富绅，各自拥有一部分实力，得以混进了领导集团。

1850年，广西阶级斗争形势迅速高涨，拜上帝会的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起义时机正在成熟。7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命令各地拜上帝会员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建立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加紧铸造兵器，积极准备起义。为解决会众的衣食等实际问题，拜上帝会实行了公库制度和男女分馆制度。它促使会众举家以赴参加革命，对于坚定革命信心，维护革命纪律和团结是有积极作用的。

## 二、从金田起义到奠都天京

**金田起义和胜利大进军**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高举农民革命大旗，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于是积郁已久的农民革命怒火，在洪秀全点燃下立即迸发出来。一场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开始了。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打出金田，转战于紫荆山周围各县，3月下旬攻入武宣东乡。洪秀全在东乡称天王，改用太平天国纪年。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极为恐慌，1851年春派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清军去广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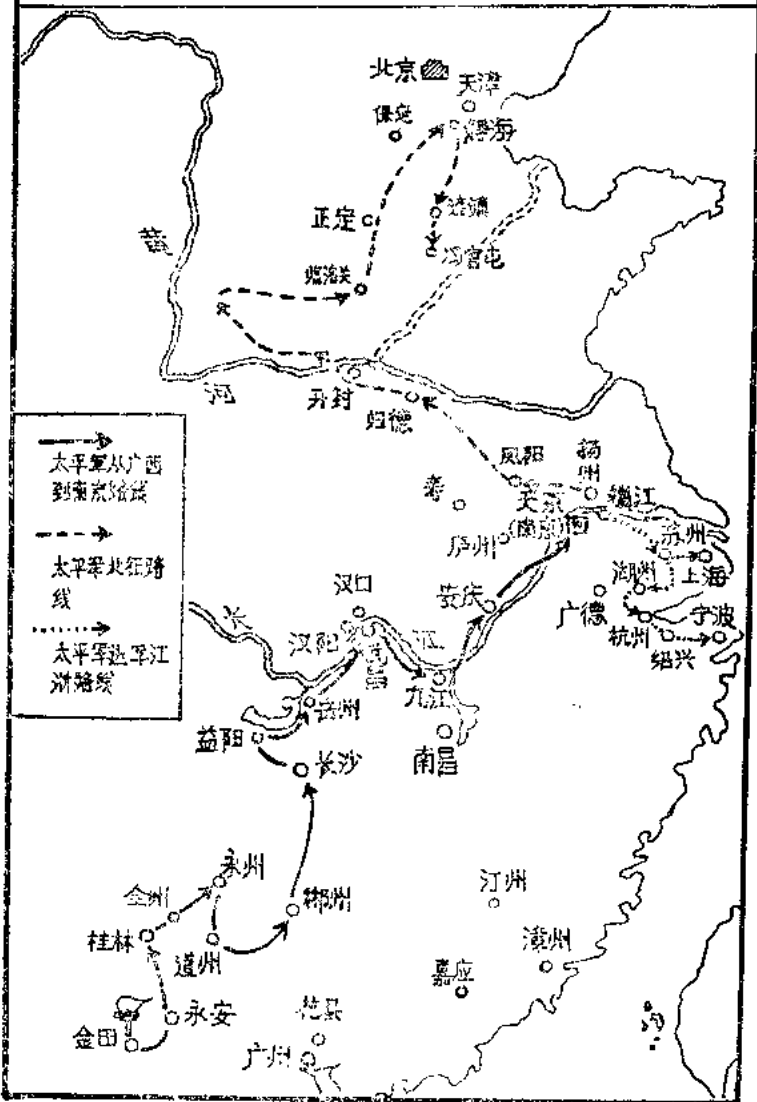
1851年9月，太平军大败广西提督向荣军，突围北上。9月25日攻占永安州城。这是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后占领的第一个城市。

太平军打进永安(今蒙山县)，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组织了政权机构。12月，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实际上掌握着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还制定了法律、军制和历法。同时，揭发了内奸周锡能破坏革命的阴谋，把周锡能及其同谋者一网打尽。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初步具备了建国规模。

清军对太平军追击堵截失败后，包围了永安城，妄想把太平天国革命扼杀于永安山城之中。1852年4月初，太平军在洪秀全正确指挥下，乘雨夜突围北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斩杀清军四个总兵，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

太平军永安突围后，乘胜攻取桂林。桂林是广西的反革命中心，清军负隅顽抗，太平军久攻不下，撤围北

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1851—1864年)





上攻全州。冯云山不幸中炮牺牲。冯云山是太平天国革命卓越的宣传者、组织者，对太平天国初期斗争建树很大。他的牺牲对太平天国革命是一个重大损失。

攻克全州后，太平军离广西向湖南进军。6月攻克湖南道州，进行整补。以杨秀清、肖朝贵名义联合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讨胡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战斗檄文。愤怒声讨清朝的反动黑暗统治，热情号召广大劳动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

太平军驻道州两个月，分兵攻克江华、永明、嘉禾、桂阳、郴州等地。在郴州焚毁了学宫，砸碎了孔子牌位，把讨孔运动推向前进。并先后吸收了挖煤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五、六万人加入太平军，组成了土营。这时太平军克服了“怀土重迁”重返广西等保守思想，确定了“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方针。接着北上攻长沙。9月中旬，太平军攻长沙，肖朝贵身先士卒，跃马扬刀往来指挥，不幸在长沙城下中炮牺牲。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又主动放弃长沙，避实就虚，西取益阳，转攻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量船只及器械枪炮。许多船户、纤夫踊跃参加太平军，组成了水营。12月，太平军水陆并进，在“千船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甃响，沿岸凯歌声”中，以雄伟的气势直逼武汉，不数日攻克汉口、汉阳。1853年

1月中旬，太平军在武昌城郊人民的支持下，胜利的占领了武昌。夺取了长江上游战略要地——武汉三镇。清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清政府革职拿问。反动阵营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太平军入城后，纪律严明，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太平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数十万人。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声威震动全国。金田起义点燃的星星之火，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已发展成燎原之势。

武昌是清政府湖北省城，也是长江上游的军事和政治重地。武昌被太平军攻克，咸丰皇帝发出了“吃睡不安”的哀号。急调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督兵防守江苏、安徽，妄图堵截太平军，挽回败退的危局。

**奠都天京** 太平军在武汉经过短期休整后，洪秀全指挥五十万大军，水陆两路蔽江东下，势如破竹，清军不战而溃。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芜湖，乘胜直捣金陵。3月19日，用地雷轰塌仪凤门，攻破南京城，斩清两江总督陆建瀛。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从此，天京成了当时农民革命运动的中心。不久又攻下镇江、扬州，横扫了天京外围。

太平军代表广大农民阶级利益，坚持了一条农民革命路线。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发布了革命文告，揭露了清王朝的罪恶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推翻清朝政府。太平军在进军途中，焚烧衙门和粮册、田契、借券，杀逐

豪绅、地主。沿路焚毁孔丘牌位，砸碎佛道寺院的鬼神偶像。对封建神权、君权、族权、夫权进行了革命的扫荡。

洪秀全指挥千军万马，战略战术，灵活主动，纪律严明，指挥统一，内部团结，受到贫苦农民和劳动群众的拥护，革命队伍迅速壮大。金田起义后，仅仅经历两年多的战斗历程，即由一万人发展到雄师百万。太平军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席卷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最后奠都天京。革命形势如急风骤雨，很快把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推向高潮。

### 三、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和各项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以改革土地制度为核心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纲领的基本思想是废除私有制，彻底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按照绝对平均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活。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借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分田的办法是“田分九等”，每家“好丑各一半”。实

行“计口授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同时又规定“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多踰十五岁以下一半”。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以二十五家做为社会基层单位。除农耕外“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根据财产公有的原则，一切生产品除日用必需外，均需交给国库不得私有。其办法是：“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苳苳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一切婚娶生死，都由国库按标准供给，“不得多用一钱”。强调“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又规定二十五家中的冶炼和制造农具以及木工、石工都要在农闲时自己充任。

《天朝田亩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明确规定平分土地给农民耕种。这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来渴望获得土地，强烈要求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集中反映。它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伟大的革命纲领。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sup>①</sup>这个纲领鼓舞着千百万农民为实现这个理想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原

---

<sup>①</sup>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一三卷，第二一七页。

则，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毛主席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①

由于《天朝田亩制度》本身的空想以及战争频繁的客观环境，平分土地的主张没有也不可能彻底付之实施。但是，太平天国的伟大革命实践却极大地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关系。在强大的革命风暴袭击下，整个封建统治秩序被打得七零八落，许多地主走死逃亡，一些庵观寺院被焚毁，农民自发的夺取了这些土地。太平天国对得到土地或拒不交租的农民则予以保护。规定“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又发给农民“田凭”，确认农民所承租或夺取土地的所有权。“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

太平天国实行的保护广大农民占有土地的政策，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又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建设。

**太平天国的军队和政权** 太平天国紧紧依靠自己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武装，打出了一个革命的天下，因此

---

①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八九页。

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太平军有严密的组织。建制以军为单位，一军一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平时由军帅负责治军。战时由中央派遣将领节制各军，统一指挥。太平军有严明的纪律，早在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宣布纪律五条：一、遵守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儻，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后又颁布了《定营规条十要》等作了补充。它保证了太平军内部的团结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良好关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太平天国除中央政权外，又建立了地方政权。地方政权采用守土乡官制。设省、郡、县三级组织。三级政权的长官由中央选派，称守土官。县以下设若干军，军设军帅，军帅以下设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称乡官。按照《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乡官由民众公举产生。各级乡官负责组织生产，管理生活，并维持革命秩序。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充分显示了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农民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守土乡官制是在打碎封建地主统治权力基础上建立的，它是具有朴素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政权。它在支援革命战争，镇压反革命势力，维护地方革命秩序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政策** 太平军在起义之初，就实行了“圣库制度”。这个制度到天京又有所发展，设置

总管公有财产的“天朝圣库”。在圣库制度下实行一种供给制度。凡参加革命的人，衣食全由圣库供给。圣库制度的实施，保证了革命成员的生活需要，同时对于消除革命队伍内部的贫富贵贱，杜绝不良行为和保证革命队伍的良好纪律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太平天国设立了诸匠营和百工衙，对各项手工业生产采取统一管理、经营的方式，分类集中生产资料和工匠，进行生产。这个制度在满足革命战争的紧急需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曾一度废除商业，但因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久又在各地设立了公营商业，实行公卖政策。在太平天国境内开设商店都发给“商凭”（营业执照），太平军每到一处，必出告示，让百姓各安生业，照常贸易。太平天国所征的商业税很轻，许多城镇出现了“百货流通，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

太平天国根据“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男女平等原则，实行解放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主张男女经济平等；又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封建的买卖婚姻。在太平军中有女军，天朝内有女官，妇女也参加科举考试，此外还明令禁止缠足、买卖奴婢、娼妓、蓄妾等封建恶习。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曾担任太平军中的重要职务，她为太平天国革命作出

了贡献。在广西桂平的一首民歌中称赞她：“妇女去跟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牛排岭前大摆阵，杀得清兵折断腰”。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反映了广大妇女要求解放的革命愿望。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太平天国对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进行了革命的扫荡和批判。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把封建统治阶级用孔孟之道毒害人民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正式宣布为“妖书邪说”。明令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对《四书》、《五经》严格禁止买卖藏读。同时，全面审查了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所发布的文件，将其中引用孔孟以及儒家仁义道德的说教，尽行删除。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删改儒家经书。太平天国在天京设立“删书衙”，由洪秀全亲自主持。“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既在政策上有明确规定，又有坚决的革命措施，极大地动摇与破坏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太平天国不仅对封建文化展开了荡涤和批判，而且还很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印制的图书四十多种，包括典章制度、军事条规、文告、论文等，如《天父诗》、《太平诏书》等。

在文学方面，太平天国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的文风。强调去浮言，面用实话的写实精神。诗歌



在太平天国很盛行，许多重要文献也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写成的。太平天国的文学改革，不仅反映了革命文艺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精神，而且表现出文化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进步倾向。

太平天国为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政权，实行了开科取士制度。试题严禁用儒家经典为题，这是它的批孔战斗精神的又一表现。

太平天国在永安时就创制了《太平新历》。每年定为三百六十六天，一年十二个月，单月三十一天，双月三十天。

太平天国对外采取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侵略，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革命立场。

在太平天国革命形势飞跃发展下，外国侵略者采取伪装“中立”的策略，伺机反扑。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到天京。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也相继到天京窥探。6月，新任英使包令打着“中立”的招牌到天京“访问”，窥探太平天国的虚实，观察太平天国对侵略者的态度，以便乘机渔利。

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这是太平天国遇到的新问题。实践证明，太平天国从朴素的平等思想出发，坚持了严正的反侵略立场。当英使文翰的座船擅入太平天国水域时，太平军立即开炮警告，英舰被迫停止前进，

经说明意图后始得通过。文翰到京后，太平天国官员立即义正词严的警告，“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当场给予侵略者以极大的蔑视和斥责。

太平天国主张平等贸易，严格禁止鸦片输入，太平天国曾明确宣布：“平定时不唯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

太平天国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税法，外商违反法令，即予以制裁，扣留其货物船只。

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坚持了独立、平等原则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反侵略立场，这是农民革命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但太平天国时代的农民还不可能有科学思想的指导，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认识不足，没有想到就是这些满口讲上帝教义的国家，竟会帮助敌人来打倒自己。

#### 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太平军的胜利大进军，有力地推动了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全国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

**天地会、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 当时活跃在南方的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武装起义：

1852年，广西南宁天地会首领胡有禄、朱洪英率众起义。1854年占灌阳，建立升平天国。1855年应太平军

的邀请往天京会合，进入湖南后，被清军击败。胡有禄被俘死难，余部返回广西活动。

1853年5月，黄威率天地会支派小刀会起义于福建漳洲，后被迫撤到海上坚持战斗。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率众起义，杀死上海知县，占领上海县城及其附近各县。起义军以“大明国”名义发布告示，表示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并派出代表与太平天国联系，但无结果。小刀会起义军在上海及其附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多次打败进犯的清军。1855年初，清政府勾结法国侵略者进攻上海城，小刀会英勇抗击中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2月，起义军弹尽粮绝，清军与法军攻破上海城，刘丽川牺牲。

1854年，陈开、李文茂率众在广东佛山起义。以佛山为根据地与清军对抗。起义军围攻广州。广东各州县天地会乘势纷纷起义，占领了广大地区。1855年陈开率主力进入广西，围桂林不下，克浔州，改称秀京，建立大成国，坚持斗争到1861年。

在北方坚持斗争的主要是捻军。

捻党原是淮河西岸广大农村劳动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秘密组织。他们以皖北为中心，活跃于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地。1853年在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推动下，捻军纷纷起义。捻军的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1855年8月，各路捻军首领，集会于安徽亳州雒河集，

推张洛行为盟主，建号大汉。捻军从此由分散到统一，进入斗争的新阶段。1856年，捻军在雒河集同清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声威大振。此后，捻军一直活动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成为北方抗清斗争的主力。

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少数民族起义，也是风起云涌。

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又是白莲教活跃的地区。1855年，苗族雇农张秀眉率苗民起义。占据台拱，迅速发展成为黔东南苗民反清斗争的中心。11月，白莲教支派灯花教发动了起义，以服饰和旗帜的颜色分为红号、黄号、白号等三支起义军；也称为“号军”。其中以红号势力最大，拥有万人队伍，震动全省。

1853年和1856年，云南哀牢山区彝民和各州县回民先后发动了反清斗争。彝族雇农李文学、汉族佣工王泰阶领导的彝民起义，在1856年在弥渡建立了革命政权，实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的土地政策和“彝汉同利”的民族政策，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护。

云南彝民起义爆发后，回民起义也在酝酿。清政府加紧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挑动汉、回械斗，清政府乘机惨杀回民。1856年杜文秀率众起兵反抗，各地回民纷纷响应。

从1851—1855年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南、广东、河南、山西、直隶、内蒙、奉天、（今辽宁）先后发生了抗租、抗粮的斗争。清朝统治的中心直隶（今河北）也爆发了盐民和饥民暴动。

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彼此推动，互相激荡，革命烽火燃遍祖国大地，很快形成一个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  
中国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

**革命冲击下的清政府** 清政府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危机四伏，朝不虑夕。咸丰皇帝多次“诣文庙行释奠礼，亲临辟雍讲学”。“奉神牌入太庙，行谒列圣”。妄图利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把革命镇压下去。1853年2月，清政府任命向荣为钦差大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3月末，向荣尾随太平军在天京城外紫金山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窥伺天京。又任命卖国贼琦善为钦差大臣，会同胜保率直隶、陕西、黑龙江三省马队和步兵进驻扬州一带，建立了江北大营，逼向天京。同时抽调各地清军进驻河南、山东、直隶，防堵太平军继续北上，威胁反革命老巢。

清政府利用汉族地主、军阀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与人民革命顽固对抗。从1853年初开始，先后在十省任命四十三个团练大臣。曾国藩的“湘军”就是这些反革命地主武装中最凶恶的一支。

清政府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军费，千方百计地设法筹饷，除加捐加税、滥发钱币外，又实行了“捐

厘助饷”。1853年，清政府帮办江北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开征“厘金”。厘金分两种：一种是行厘、抽于行商；一种是坐厘，抽于坐商。第二年推行到各省，成为经常的税收制度。厘金制度的实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动措施，仍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队伍同清朝反动军队的大搏斗使它进一步陷入了重重的危机。

**太平军的北伐** 太平天国为了摧毁清王朝的统治，1853年，派林凤祥等率军两万出师北伐。5月，北伐军从扬州出发，经安徽，进河南，由巩县渡黄河攻入山西，转入直隶。10月，北伐军前锋逼近保定，北京大为震动。清政府急命惠亲王绵愉、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带领清军，会同钦差大臣胜保，严防保定、涿州一带。北京设立了巡防所，宣布戒严。咸丰帝更做了逃往热河的准备。北京城内的官僚地主逃迁外地者三万多家。北伐军由于孤军深入，遭遇清军的正面拦截，于是乘隙东进，略取天津。清军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受阻，退守静海、独流镇坚持战斗。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又到寒冬腊月，粮食寒衣不继，于是被迫放弃进攻北京的计划，转入守势。1854年2月，北伐军放弃静海，转至阜城，等待援军。

洪秀全多次接到北伐军的请援报告。1854年2月，

派黄生才等带兵北上增援。北伐援军从安庆出发，一路奋战，攻至山东。由扬州来援的曾文吕部，也赶到山东会合，4月攻入临清。北伐援军因兵力单薄，被胜保重兵截回，在南退途中，几乎全部损失。

北伐军在阜城战斗一个多月，古文元英勇牺牲。5月初退至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不断击退清军进攻。1855年3月，林凤祥军粮尽，太平军将士以坚韧毅力克服饥饿疲劳，奋勇突围，全军壮烈牺牲。连镇被攻陷，林凤祥一马当先，冲杀在前，不幸被俘，在北京被残杀。在遭受“寸磔”的酷刑时，林凤祥英勇顽强，“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表现了太平军将士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北伐军历时两年，驰驱六省，转战五千里，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农民革命的发展。牵制了清政府的重兵，有效地支援了西征军在长江流域的斗争。北伐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艰苦卓绝的革命作风、临危不惧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质，必将永远激励革命人民奋勇前进。

北伐军的失败，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们保守思想和错误的战略方针造成的。太平天国领导者把战略重点放在天京和西征战场，没有认识到一鼓作气推翻清王朝的重要。不仅未派重兵北上，相反是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终于招致了北伐的失败。北伐的失败，失去了乘胜

直捣清王朝心脏的大好时机，使清政府获得喘息的时间，得以重新集结反革命力量，并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猖狂的进行反扑。

**太平军的西征** 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军开始了西征。1853年5月，胡以晃、赖汉英、石祥贞等率军西征。6月克安庆，进围江西南昌，久攻不下。9月，太平军从南昌撤围，出湖口，占九江。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1854年1月，克庐州（今合肥），击毙安徽巡抚江忠源。一支西上，1853年10月，重占汉口、汉阳，后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1854年再度西上，乘胜三占汉口、汉阳，包围武昌（随后攻下武昌）。3月，西征军攻入湖南，连克岳州、湘阴等地。西征军进入湖南后，遇到了曾国藩的反革命地主武装的顽抗。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官至侍郎。1852年初，奉命在湖南督办团练，扩编成湘军。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死硬派、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湘军主要将领都是湘乡人，都是一些顽固不化的儒生。他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等封建关系笼络上下，以封建伦理道德麻痹士兵。湘军招募士兵的办法，由营官自招，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相依为命，结成死党，成为一支野蛮凶残的反革命地主武装。1854年3月，湘



军练成水陆两军全军，共一万七千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地主团练，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反革命军阀集团。

湘军倾巢出动时，曾国藩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讨粤匪檄》。在这篇黑文里，他站在维护封建名教的立场，疯狂攻击太平天国革命。胡说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举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如丧考妣地狂呼：“此岂独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曾国藩一方面，把地主阶级分子纠集在“卫道”的黑旗下，一方面，主张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德报德”，妄图投靠帝国主义，联合中外反动派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孔孟之道已成为大刽子手曾国藩对内屠杀革命农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精神支柱。

1854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水师攻靖港，在太平军重炮轰击下，湘军几乎全军覆灭。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捞起。旋因太平军在湘潭受挫，曾国藩得以借机重整湘军。7月，湘军开始疯狂反扑，陷岳州、武昌、汉阳，12月进犯九江。这时，曾国藩杀气腾腾的叫嚷：要“肃清江西，直捣金陵”。

在斗争十分艰苦紧急的情况下，太平天国派罗大纲等率大军西援。太平军到湖口后，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诱使湘军一部水师进入鄱阳湖。太平军立即封锁湖口，把湘军截成外江与内湖两段。太平军乘黑夜火攻，烧毁敌战船四十余艘，夺获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急得又要

投水寻死，结果被其喽罗拉住，逃往南昌。

湖口大捷，太平军乘胜反攻。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11月，太平军一部绕道攻入江西，一路势如破竹，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占了江西八府五十余县。这时，南昌内外隔绝，盘踞南昌的曾国藩成为瓮中之鳖。经过三年浴血苦战，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夺取了辉煌的胜利。

1856年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又组织了天京破围战。4月解镇江之围，乘胜东进，大败清钦差大臣託明阿，克扬州、浦口。6月初，连破镇江一带清营七八十座，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打破了江北大营后，太平军又乘胜攻取江南大营，经过激战，江南大营被击破，向荣狼狈逃到丹阳毙命。击破江南、江北清军大营，扫除了天京外围的障碍。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是太平军又一辉煌的胜利。

1853年—1856年，通过三年的殊死斗争，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夺得了重大胜利。太平军控制了东起镇江，西至武汉的长江流域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和江苏的大部分土地都纳入太平天国版图。

## 五、太平天国内部阶级斗争的激化

太平天国是一次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它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又不能抵制剥削

阶级思想的腐蚀。在革命不断胜利的形势下，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者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剥削阶级意识和作风，这些都严重地损害着革命队伍的团结。革命高潮的到来，阶级斗争也空前地加剧起来。地主阶级不断派遣奸细潜入天京和暗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勾结，策动反革命暴乱，妄图从内部颠覆太平天国革命政权。1854年2月，太平天国领导者破获的地主阶级反动文人张继康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正是太平天国内部阶级斗争激化的一个信号。

**韦昌辉的反革命暴乱** 1856年9月，天京发生的韦昌辉反革命暴乱，是太平天国内部的一次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天王洪秀全在革命发动时期，表现了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刚毅不屈的革命精神，奠都天京后主要从事删改六经等工作，军政大事由杨秀清负责处理。杨在紫荆山时取得了代上帝立言的大权。他在对敌斗争中机警坚定，但在建都天京后，个人权位思想和骄傲情绪进一步滋长，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如东王驾出，官兵回避不及，就要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1854年5月，曾因燕王秦日纲的牧马对杨秀清的同庚叔（拜把兄弟的叔父）失礼小事，将其五马分尸，并杖责秦日纲和对此事持正确态度的兴国候陈承谿、卫国候黄玉昆。又常借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借细小事故要杖责洪秀全。杨秀清这

种上欺天王，下压首义有功将领的恶劣行为，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关系上造成极不正常的现象，也使他 and 洪秀全及其他领导人间的矛盾日趋尖锐。1856年夏，西征战场和打破江北、江南大营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冲昏了杨秀清的头脑，认为这是扩大个人权位的最好时机，公然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杨矛盾激化，给钻进革命领导集团的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发动反革命暴乱以可乘之机。

地主阶级分子韦昌辉，一贯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在领导集团内部，摇唇鼓舌，播弄是非。并且结党营私，弄权舞弊。他是隐藏很深的地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和口蜜腹剑式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为了窃取更多的权力，对洪秀全极力阿諛奉承，骗得一个“爱兄之心诚”的评语。为了减少杨秀清对他的防范，表面上更是装得恭敬驯服，唯命是从。每逢杨秀清轿到，他总是扶轿相迎。同杨秀清谈不上几句，就跪在地上连声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才识短浅的意思），几不知此。”他为了取媚杨秀清甚至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其兄。韦昌辉表面上讨好杨秀清，实际上却对杨秀清恨之入骨。甚至连反动派都看出韦昌辉的罪恶目的就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昌辉利用一切机会，施展两面手法，竭力扩大和加深洪、杨之间的矛盾，伺机而动。洪秀全等领导者对他的反革命活动虽有所察觉，但受到历史和阶级

的局限，还不能及时识破他的反动本质，从根本上消除这个隐患。

韦昌辉接到天王回京图杨的密诏后，认为篡夺太平天国领导权的时机已到，星夜带领心腹部队三千人赶回天京。1856年9月1日深夜，韦昌辉指挥部下包围了东王府，残酷地杀害东王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数千人。韦昌辉更公然抗拒洪秀全对其滥杀无辜的责备，串通秦日纲在天京城内大肆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惨杀了两万多太平天国的优秀将士。韦昌辉灭绝人性的暴行，充分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野心家的反革命面目。激起了天京内外太平军将士的无比义愤。在天王洪秀全的领导下，“合朝同心”，镇压了韦昌辉及其死党，粉碎了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使天京在危急中重新稳定下来，挽救了太平天国革命。

阶级异己分子韦昌辉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发动反革命暴乱，这是太平天国革命史上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加强革命内部的团结，就要善于识别那些伪装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并把他们清除出去。时刻提防阶级敌人从内部破坏革命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石达开的分裂出走** 韦贼被诛后，1856年11月，石达开回到天京，主持政事。石达开回京是怀有趁机擅权野心的。洪秀全鉴于杨秀清专权和韦昌辉反革命暴乱的

教训，对石达开存有戒心，在任命他“提理政事”的同时，还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与石达开同理政事。石达开对此极为不满，借口洪秀全对他“重重生疑忌”，于1857年6月脱离天京，并利用他在太平军中的地位与影响，欺骗和裹胁江西、安徽战场上的几十万太平军精锐部队，走上了分裂主义的罪恶道路。

石达开从安徽、江西出走，流窜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处处失利。1860年到广西后，更改太平天国制度。广大太平军将士，在实践中逐渐觉悟到分裂行动的错误，要求“万里回朝，出江扶主”，与石达开分裂路线进行斗争。终于在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位将领率领下，二十万太平军将士不顾石达开的压制，也不怕重返天京的艰险，“欢欣鼓舞，万里回朝”。1861年9月一路奋战到达江西，和太平军兄弟部队会师。洪秀全对吉庆元、朱衣点等二十万太平军将士的归来，十分高兴，特把这支部队命名为“扶朝天军”，以示嘉奖。

这时，坚持分裂主义路线的石达开一意孤行，更加众叛亲离。带领几万人从广西，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到达四川。1863年5月在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绝境。石达开穷途末路，向清朝总兵投书请降，然后带领他的儿子和亲信数人到清军营内投敌。石达开在敌人军营中写了一份“自述”，后被处死。这就是叛徒的可耻下场。

## 六、太平天国重整革命大业

**洪秀全力挽危局** 韦昌辉反革命暴乱和石达开分裂出走后，清朝反革命军队乘机向太平军大举进犯。1856年12月武昌失守。湘军以武汉为据点，顺流而下，进逼九江。1857年5月，九江失守，守将林启荣和全军一万七千余人壮烈牺牲。1857年12月，镇江失陷。接着敌人又侵占瓜州。江南、江北大营死灰复燃，重新包围天京。安徽方面，敌人占领了三河、庐州等地。江西战场也趋于瓦解。曾国藩狂妄叫嚣：太平军“不患今岁不平”。也从反而说明了局势的严重性。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广大太平军将士更加团结在洪秀全的周围。天王洪秀全果断的提拔了陈玉成等一批青年将领，充实了领导集团。

1858年8月，陈玉成等将领在安徽枞阳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拔掉江北大营，恢复天京与江北交通，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封锁。9月，陈玉成攻克庐州，会合各路大军大败清军，并挫败江南大营的援军，歼敌一万多人。太平军乘胜攻占了江浦、扬州，摧毁了江北大营。这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自九江攻入安徽，连陷太湖、潜山、舒城、桐城，安庆外围阵地全被夺走。11月敌军进犯太平军重要据点三河镇，守将吴定规告急。陈玉成率军往救，得到捻军配合，内外夹击，猛攻敌军，全歼湘军“精

锐”李续宾部六千人。李续宾部被歼后，曾国藩懊丧的承认：“三河之败”“大局顿坏”，“士气，亦为不扬”。三河战后，太平军乘胜收复太湖、潜山等地。1859年6月，天王以陈玉成战功卓著，晋封为英王。9月封李秀成为“忠王”。

浦口、三河战役的胜利，是太平天国在韦昌辉反革命暴乱之后，在军事上转败为胜的关键战役，也是挽救革命危机的一次出色战斗。太平天国为稳定天京局势，掌握主动权，决定再次打掉江南大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制定了出奇致胜的策略。2月，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湖州、杭州，造成敌人错觉，江南大营果然派出重兵驰援杭州。当敌援接近杭州时，太平军立即撤出杭州，乘隙蹈虚。5月初会攻江南大营，经过五个昼夜激烈战斗，终于再次踏破清军江南大营，夺取了天京解围战的重大胜利。

天京解围后，洪秀全召集将领会议。决定东进，取江南富庶地区，然后西上，取江西、湖北。6月，陈玉成等部太平军开始东征，先后攻取常州、苏州、嘉兴、松江等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太平军便以泰山压顶之势，取得江南大片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

革命暴力是推动社会生产的伟大动力。苏、浙广大地区解放以后，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经过革命战争的扫荡，有的地方的土地转到农民手里；有的地方农民虽



未得到土地，但在革命政权的保护下，农民不再向地主交租；也有的地区，地主租额受到严格限制。太平天国在苏、浙地区实行了奖励生产措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谷物丰收”，“民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后期复辟倒退势力的代表。他私读孔孟“妖书”，在墙上挂满孔孟经书的“道德格言”。竭力破坏太平天国禁令。在政治上推行一条复辟倒退路线。

他选任地主分子充任乡官，甚至担任县、府一级的官职。对待反动地主武装采取“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政策，因而地主武装力量得以保存下来。他对清政府的官吏也是优容礼待，对阵亡的清朝将领，派人“寻找尸首，用棺木埋之”。政治上的投降，必然导致在经济上对地主阶级的保护。在常州、元和、吴县等地他竟允许和保护地主收租，甚至设局代地主催租。在常熟公然贴出告示“佃农置田抗租，……木人处斩”。在李秀成的默许下，甚至出现太平军将领站在地主阶级一边，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太平天国对投敌变节分子一贯采取严厉打击政策。李秀成却相反，如1858年李昭寿投敌，李秀成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瞞着天王而偷偷送去，以后并有书信往来。李秀成还以“苏杭繁华之地”作为发展个人势力的资本，他拥兵自重“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在天京危急时刻公然违抗天王命令，拒绝营救天京。

李秀成在苏浙地区实行阶级投降路线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反革命势力相当嚣张，局部地区出现了封建势力的复辟。给以后的苏南保卫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洪仁玕的新政** 1858—1859年，太平军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革命形势转危为安。清军江南大营的覆没，苏南广大地区的解放，形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的新高潮。但在这个时期里，太平天国掌握中央政权的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缺乏积极进取、力图振兴的精神。天王吸取杨秀清专权和韦昌辉叛乱的教训，大封王爵二千七百多人。滥封王爵，不仅造成领导权的分散，而且增加了将领之间、部队之间的磨擦，使太平天国领导力量受到很大削弱。1859年4月，洪仁玕由香港来到天京。

洪仁玕（1822—1864年）是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会的最早会员。太平天国起义后避居香港，与外国传教士有较多的接触，接受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到天京后，很受洪秀全的器重，不久就封为“干王”，总理朝政。他根据自己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资政新篇》。在政治上，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洪仁玕认为要扭转太平天国当时“人心不一”的局面，必须“权归于一”，“禁朋党之弊”，加强革命内部的团结。同时通过报纸、告密箱、尊重社会舆论等来沟通上下关系。在经济上，主张兴建铁路、公路以及修浚河道、行驶轮船、举办邮政，设立

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开采矿藏、兴修水利，奖励发明创造。在社会改革方面，提出创办学校、报纸、医院；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禁止封建迷信和贩卖人口、使役奴婢、及禁食鸦片等等。此外，还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

《资政新篇》反映了洪仁玕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图引导太平天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进步倾向。《资政新篇》虽然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政纲，但洪仁玕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实践，对广大农民的迫切土地要求认识不足，完全没有涉及土地问题。

洪仁玕在天王的领导下坚持进行武装反对封建统治的正确主张。他继承太平天国的革命传统，继续开展对封建神权和儒家学说的批判。他指出：一切偶像，都是人手雕塑制造出来的，崇拜这些木石偶像，是统治阶级实行的愚民政策。他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徒以牲醴敬孔孟，以院寺祀诸贤，或拜文昌妖魁星妖”。都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制度。他对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也进行了批判。洪仁玕还提出“文以纪实”“读书不在多采佳句，惟在寻求书中之骨气”，注意学以致用。

天王洪秀全逐条的审阅了《资政新篇》，并作了批示。只对设新闻官和戒杀两条表示了不同意见，对前条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对后条批道：“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

也”。表现出洪秀全警惕敌人，坚持革命的坚定立场。《资政新篇》是经洪秀全批示后，做为太平天国文书镌刻颁行的。因此其中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也可以说是洪秀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真理的组成部分。

**安庆保卫战** 安庆是一个战略要地，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革命的成败。当时洪仁玕正确指出：“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湘军头子曾国藩也认为争夺安庆是关系天下大局的战役，因此，把进犯安庆做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一环，牢牢抓住不放。1860年9月，各路将领齐集天京，在天王的主持下制定了南北两路大军西上，进攻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部署。决定北路军由陈玉成率领，由安徽入湖北；南路军由李秀成指挥，由江西入湖北。议定次年四月会师武汉。

英王陈玉成的北路军，挥戈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由霍山进入湖北。1861年3月克黄州，威胁武汉。这时敌人极为恐慌，官僚豪绅争相逃命。胡林翼吓得旧病复发，怨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正在这个紧要关头，英国侵略分子巴夏礼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竭力阻挠太平军进攻武汉，用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利益来威胁。又胡说，太平军南路军尚未进入江西，现在进攻，势将得不到各路军的支持。在外国侵略者的干涉下，由于李秀成行动迟缓不能按时会师，加上陈玉成驰援安庆的心情又很急切，于是留下赖文光驻守黄州，4月回师援救安

庆。

10月，李秀成经过天王几次催促才出发西上，年底逼近曾国藩的祁门老营。当时曾贼心惊肉跳，惊惶万分，写了遗书，准备一死。李秀成害怕祁门屯有重兵，不敢进攻，竟绕道而过，使曾贼死里逢生。从江西到湖北的进军途中，李秀成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又沿途招兵买马，直到5月中旬才进入湖北，6月才到黄州的对岸武昌县。这时李秀成有军队五十万，如联合赖文光进攻武昌，仍会扭转安徽战场的形势。但李秀成为保持个人实力，竟放弃夺取武汉的全局性的战略任务，率军返回苏、浙。李秀成这种叛卖行动，断送了太平军在长江上游的有利战机，使安庆保卫战处于十分不利地位。

1861年8月，太平军会攻安庆，守军从城内杀出，太平军将士英勇奋战，杀伤了大量敌人。这时，湘军更加疯狂进攻安庆，9月初，敌军用火药炸塌西门城墙，乘势冲入。安庆城内绝粮已久，但英雄的太平军将士虽无粒米充饥，仍坚强不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和全军一万六千多人，苦战到底。安庆一役，全军壮烈牺牲。充分显示了太平天国英雄儿女的顽强革命精神和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

安庆失陷后，陈玉成退守庐州。他派陈德才、赖文光率军远征西北，广招兵马。陈玉成在庐州困守无援。1862年5月突围北走，在寿州中了团练苗沛霖毒计被俘。陈

玉成被俘后，敌人以死威胁他投降。他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地痛斥敌人：“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完全表现出陈玉成忠贞英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1862年6月4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被害。陈玉成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陈玉成是太平天国优秀的青年将领，是在革命烽火中由童子兵迅速成长起来的太平军的杰出军事统帅。陈玉成十二岁参加太平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英勇机智，为革命立下了无数战功。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敌人无比仇视，对革命赤胆忠心，取得部众的拥护，获得天王“一身都是胆，是个好将领”的褒奖。在刑场上，他是宁断头颅不变心，慷慨捐躯的好汉。列宁说：“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sup>①</sup> 陈玉成就是在阶级大搏斗中锻造出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将士的杰出代表。1958年，人民政府在河南延津陈玉成就义的地方，竖立“太平天国革命英雄陈玉成墓”，表达了革命人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

## 七、太平天国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

### 江苏、浙江战场的激战 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华既

---

<sup>①</sup>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七一页。

得利益，第二次鸦片战后，更加支持清王朝。它们不但继续供给清政府大量军火，而且加紧了政治上的勾结。美国指使华尔同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拼凑了一支臭名昭著的“洋枪队”。英法两国也成立了类似的中外反动武装，并同沙俄侵略军、联合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打破江南大营乘胜进军苏浙。6月，太平军攻克苏州、青浦、松江等地，逼近上海。太平天国英雄们在中外反动派进攻面前，没有丝毫的怯懦，同它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华尔“洋枪队”袭取松江后，两次进犯青浦，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太平军缴获大量武器，击毙击伤“洋枪队”三分之一。连“洋枪队”头子华尔也五处受伤，几乎丧命。

正当太平军乘胜向上海进军时，中外反动派成立了“上海中外会防局”。在中外反动派共同策划下，以外国侵略者为军官，用中国人为士兵，把“洋枪队”改组为“常胜军”。英法侵略军也陆续调来上海，对抗太平军。并在上海划分防区。太平军这次进攻上海，因帝国主义的破坏阻挠，未能攻下。1862年1月，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分五路自杭州出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清军四五万顷刻瓦解，太平军迅速攻克金山、奉贤、青浦、嘉定、宝山等地，上海处在太平军四面包围之中。2月，太平军在高桥一带与洋枪队和英法侵略军展开激战之后，太平军退出了高桥。4月下旬至5月中旬，侵略军频

繁出动，进犯嘉定、青浦、奉贤等地，大肆抢掠屠杀，接着又进犯太仓。太平军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内外夹攻，连战皆捷，歼灭敌军一千多人，连破清营三十余座，缴获大批洋枪洋炮。同时，太平军在奉贤南桥，击毙法国干涉军司令卜罗德，乘胜围攻嘉定，又击退英法侵略援军，收复嘉定。5月，太平军进围青浦，大败敌人援军，生擒了“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收复青浦。“常胜军”成了常败军。侵略军被打得龟缩在上海，从此不敢出击。这时，外国侵略军丧魂落魄，清军望风丧胆，上海指日可下。正当东线战斗异常紧张炽烈之际，反革命湘军逼近天京，扎营雨花台，天京告急。太平军急于回援天京，由上海郊区撤退。

1861年的北京“宫廷政变”之后，清政府由恭亲王奕訢等媚外权贵当权，进一步重用刽子手曾国藩。授予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兵权。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让他放手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62年初，清政府又任命曾国藩的心腹死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当时湘军的反革命战略部署是：曾国藩坐镇安庆，派其弟曾国荃率湘军主力顺江东下进逼天京；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从江西进入浙江对抗太平军；派李鸿章纠合安徽地主武装组织淮军，由英国侵略者用轮船运到上海，进犯苏、常。这时，太平军既要保卫长江下游，又要援救天京，已陷于东西两面作



战的被动局面。

1862年6月，天京形势危急。天王洪秀全令围攻上海的太平军撤出东线回援天京。太平军汇集了二十万精锐大军，直捣曾国荃的雨花台大营，恶战四十六天，打得湘军人仰马翻，叫苦连天，“父子兄弟，不能相顾”，曾国荃也受了伤。湘军修筑长壕、堡垒并有水师配合，因此太平军没有突破湘军阵地。到了11月太平军消耗了大量兵力，加上严冬已到，没有准备好寒衣，太平军不得不从雨花台一带战场上撤退，渡江西上企图会合西北太平军陈德才、赖文光部，抄袭湘军后路，以解天京之围。但过江后，未能与陈、赖所部会合，反革命湘军又猛扑天京，太平军过江部队又不得不返回援救天京。由于沿途供给困难和敌人的阻击，太平军受到很大的损失。

东线太平军回援天京，江浙地区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上海方面的反革命势力获得了喘息的时机，江苏战场和浙江战场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浙江战场上，太平军和外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当1861年12月，李世贤部进攻宁波时，外国侵略者就妄图插手干涉。1862年5月，清军进犯宁波，外国侵略军也配合清军作战，并致书太平军守将，要求太平军撤出宁波。太平军守将严词拒绝这种挑衅行为。侵略军悍然开炮攻城，太平军英勇抵抗，激战五小时，打伤英

国军官两人，打死法国舰长一人。太平军也付出巨大牺牲，退出宁波。太平军在宁波保卫战中，以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连英国侵略者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作战非常坚定勇敢”。

英法侵略军占领宁波后，组成了中英混合军（又称“绿勇”）和中法混合军（又称“常捷军”）。侵略者为了扩大在浙江的武装干涉，把华尔的“常胜军”调到浙东战场。9月下旬，英法侵略军进攻慈谿，华尔率“常胜军”增援。慈谿战役华尔被太平军击毙。接着太平军在绍兴打死“常捷军”头目勒伯勒东。1863年夏，左宗棠围攻富阳，太平军顽强抵抗五个月后退出现富阳。1864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浙江战场除少数据点外，都被清军夺去。

江苏战场上，太平军主力撤出上海地区后，由慕王谭绍光主持苏南战事。1862年8月，太平军一度打到上海城郊法华寺。10月，又攻至嘉定的黄渡等处。1863年初，淮军进攻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叛变投敌，把常熟城献给李鸿章，为反革命军队进攻苏南打开一个缺口。接着，敌人又夺取了太仓、昆山，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1863年夏，李鸿章派淮军和戈登的“常胜军”向苏州进攻，并分兵北取江阴、无锡，南取吴江。吴江、江阴先后失守，反革命军队包围了苏州。

太平军苏州统帅慕王谭绍光是久经沙场的将领，他沉着的指挥战斗，致使敌人无法占领苏州。在紧急关头，部永宽等在戈登和李鸿章的引诱下，阴谋杀害谭绍光开城投降。当时往援苏州的李秀成发现部永宽等人的叛变活动，不仅不予严肃处理，竟丧心病狂的加以鼓励，最后又匆忙的离开了苏州。几天之后，谭绍光在军事会议上同叛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表示：宁可拼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慕王谭绍光终为叛徒所杀害，为革命献出了一生。

1863年12月，谭绍光被害的第二天叛徒开城投降，苏州沦陷。这伙叛徒也被李鸿章一起处死。结果闹了个狗头落地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苏州失陷后，太平军先后在金坛、常州等战役中痛歼侵略军。“常胜军”统领戈登也被打伤，几乎丧命。

**天京陷落** 在浙江战场，外国侵略者和左宗棠湘军，侵占了绍兴、富阳等地。1864年春，左宗棠又攻陷杭州。太平军在江苏、浙江战场接连失利以后，反革命势力更加疯狂地扑向天京。天王洪秀全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关头，临危不惧，以惊人的毅力，继续领导太平天国将士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苦斗。粮食不足，天王带头以“甘露”充饥。当天京保卫战进行十分艰苦激烈的时候，洪秀全积劳成疾。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革命的杰出领袖洪秀全逝世了。

毛主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sup>①</sup>洪秀全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以伟大的气魄和革命胆略，点燃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对儒家反动思想和封建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和革命的冲击。他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拿起武器向国内外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同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战斗，粉碎了他们篡权复辟的阴谋。洪秀全为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主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sup>②</sup>洪秀全的光辉名字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的伟大业绩，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洪秀全逝世后，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7月3日，敌人控制地保城高地，架炮轰击，太平军坚守天京这座英雄城市，拼死抵抗。7月19日，敌人用炸药轰开城墙二十多丈，湘军从缺口处拥入。守城的太平军勇猛战斗，同冲进来的敌人展开肉搏巷战，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连大刽子手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天京城中的太平军“无一降者”。

李秀成在逃跑途中，被敌人捕获。曾国藩从安庆赶

<sup>①</sup>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五八页。

<sup>②</sup>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七五四页。

到南京，亲自进行审讯。李秀成对敌人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下了几万字的自供状，恶毒的诬蔑革命，无耻的阿諛敌人，替敌人出谋划策出卖革命。这个可耻的叛徒，就在写完供状的当天，被曾国藩处死。李秀成供状是叛徒的自白书。正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叛变革命、不足为训。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苏修叛徒集团硬要把李秀成塞进英雄行列，千方百计美化叛徒李秀成。然而华丽的外衣掩盖不住叛徒的丑恶嘴脸。历史的真象、残酷的事实，只能把他们捏造的“英雄形象”砸得粉碎。刘少奇等和苏修叛徒集团美化李秀成，恰好证明他们和李秀成有共同的叛徒嘴脸和肮脏的灵魂。

## 八、再接再厉的斗争

**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坚持斗争**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战斗。

太平天国余部转战在大江南北。天京失陷后，幼天王与洪仁玕在广德会合，8月到浙江湖州，决定前往江西会合李世贤、汪海洋部。不幸，洪仁玕与幼天王在江西先后被俘，10月，在南昌英勇就义。洪仁玕到天京后，勇于担负重任，在太平天国后期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被俘后，英勇不屈，直指敌人为“妖军”。

他所留下的《洪仁玕自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革命气节。他总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

李世贤部进入福建后，群众奋起响应，声势复振，号称二十万大军。李世贤进驻漳州，汪海洋驻汀州，屡败清军。1865年5月，敌军攻占漳州，太平军大部败散。

李世贤长途跋涉，到汪海洋营，被汪海洋刺死。汪海洋军转战江西、广东边境，1866年2月，汪海洋战死。余众由部将谭体元率领突围，在山中迷路，被敌军包围，全军牺牲。英勇的太平军余部在天京失陷后，转战江、浙、赣、闽、粤各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革命坚持苦斗，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太平天国革命写下了最后一页壮丽的篇章。

长江以北的人民在捻军的旗帜下，继续向清军进攻。1864年11月陈德才在霍山牺牲。捻军和西北太平军共推遵王赖文光为领袖。在黄河流域继续展开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1865年初，赖文光与张宗禹在河南鲁山大败僧格林沁。随后采取“以走致敌”的运动战，退入山东境内，诱敌穷追。5月中旬在曹州高庄一举全歼僧军，沾满人民鲜血的僧格林沁也被捻军杀死。

僧格林沁全军覆没，对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清政府急调曾国藩率湘军、淮军北上。曾国藩根据

其反革命经验，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想把纵横驰骋的捻军，围困在运河、沙河、淮河和黄河之间。但由于捻军作战勇敢，行动灵活，曾国藩的阴谋没有得逞。曾国藩“剿捻”失败，清政府又换上了淮军头子李鸿章。

赖文光为了坚持长期斗争，于1866年10月，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1866年底赖文光率东捻军从河南进入湖北，横扫黄陂、孝感、德安等地。1867年2月，在尹隆河展开激战，把淮军主力刘铭传部打得人仰马翻。由于捻军防备不周，遭到湘军的袭击，也受到很大损失。东捻军突围后，1867年6月进入山东，被围于山东登州、莱州地区，逐渐失去战斗的主动权。在抢渡大塘河战斗中，赖文光在突围后被俘，1868年1月在扬州英勇牺牲。遵王赖文光是太平天国一位英勇的将领，他为革命转战南北，英勇杀敌，特别在天京陷落后他联合捻军继续奋战，为保卫太平天国革命的成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一首民歌中高度赞扬了赖文光的英雄业绩：“遵王大刀三尺高，妖兵一见魂飞掉，慌忙跪在马脚下，口口声声来求饶，遵王说：你听好，再当妖兵吃一刀”。

西捻军在张宗禹率领下，从河南进入陕西，发展很快。1867年1月十里坡战役大败清军。清政府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捻军突破左宗棠的包围，进军陕北，声势大振。这时传来了东捻军危急的消息。西捻军立即出陕西，经山西，进河北。张宗禹原计划用威胁北京来

解东路捻军之围，可惜东捻军早在一月前失败。4月，西捻军攻天津，遭到外国侵略军的攻击。1868年8月，西捻军被围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茌平一带，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战。

捻军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同盟军和直接后继者，它给清统治者以极大的打击，他们多次以劣势兵力打败优势的敌人。他们高举农民革命的旗帜，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捻军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泯灭的。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反封建的革命怒火仍在边疆地区炽烈地燃烧着，各族人民继续坚持大规模的斗争。

**西南和西北各族人民坚持斗争** 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始终坚持反对地主豪绅的统治，得到各族人民武装力量的支援。1858年贵州苗、教军已达数十万人，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几乎完全垮台。1868年初，湘军攻陷荆竹园，教军失败。苗军失去友军，更加孤立。1869年5月，湘军万余人进攻台拱，苗军英勇应战，获得大胜。终因孤军作战，1870年台拱失守。张秀眉率余部转入深山，坚持战斗。1872年3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张秀眉被俘遇害。历时十八年，转战数千里的苗民起义军，至此失败了。

云南哀牢山彝族人民在李文学的领导下，一直坚持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彝族起义军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



大，到1868年控制了哀牢山的大部分地区。1870年，清军对起义军疯狂进攻，王泰阶牺牲。1872年，清军围攻回民军据点大理，李文学率部往援，作战失利，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余部英勇不屈，坚持斗争，1876年失败。坚持二十一年的彝族人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彝族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在近代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云南回民起义军于1856年攻占大理，各地回民纷纷响应。清政府对回民军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实行诱降。1862年马德新、马如龙受抚。1866年清政府调马如龙攻杜文秀，马如龙兵败。1869年杜文秀军失利，退守大理。在英法侵略者的勾引下，1871年杜文秀派刘道衡前往伦敦出卖云南，只因大理政权迅速垮台，其阴谋未能得逞。1872年清军攻陷大理，叛国分子杜文秀被杀。

陕甘地区的回民也纷纷起来向清政府斗争。1862年扶王陈德才率军入陕后，陕西回民大举响应。回民起义军建立了十八大营，占领了渭河流域地区，多次围攻省城西安。在陕西回民军影响下，甘肃回民军纷纷响应，并肩作战，共同斗争。

西捻军失败后，反革命湘军左宗棠率部回陕西，全力进攻回民军。由于起义军的领导者多是回族上层分子，敌人又采用剿“抚”并用的反动策略，收买上层分子及叛徒作为内应。陕甘回民军于1873年最后失败。

**封建统治阶级反攻倒算**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

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绞杀之后，封建统治阶级立即向革命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血腥的屠杀，残暴的统治，沉重的剥削一齐压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反革命势力对革命人民首先是挥舞屠刀，大肆杀戮。早在1853年，尊奉程朱理学的卫道士，民贼曾国藩就公开主张对被俘的太平军“一概剜日凌迟”或者“全部斩决”。1861年安庆失陷时，曾贼反革命兽性大发，“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存留”。崇阳之役，太平军被俘七十余人，曾国藩先“活祭”，然后令湘军士兵“割人肉生吞”。1864年天京陷落时，曾国藩在南京“分段搜杀”，三天就杀掉革命人民十多万人，尸体塞满秦淮河。南京朝天宫地区内现在有个“七家湾”，就是因那时在曾国藩的屠刀下幸存七户人家而得名的。曾国荃带头抢劫天王府。抢劫之后，继以大火焚烧。繁荣的天京，顿时化为一片灰烬。

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在中外反动派烧杀抢掠、野蛮破坏之下，江、浙、皖三省，几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皆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河南东部“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皆无人烟”。在事实面前，大刽子手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它们的反革命暴行，造成“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封建统治阶级在重建反革命政权的同时，还普遍推

行了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对于所谓“不安本分之徒”，编入“另册”。对劳动群众加强镇压。

封建统治刚一恢复，清王朝即悍然宣布：“不分熟荒，概不准佃户私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又全部被夺走了。新起的湘、淮系军阀，依仗权势，乘机大肆兼并土地，如淮系军阀李鸿章兄弟六人，在安徽合肥等地，先后置田六十万亩。曾国荃夺得土地一万亩。其它官僚、地主豪绅也大肆强占土地，造成广大农村“十室九空，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局面。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广大农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毛主席指出：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sup>①</sup>随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暴而疯狂的压迫，一个新的反帝革命大风暴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正加速孕育着。

## 九、太平天国英雄们永垂不朽

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太平天国的英雄儿女不仅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对封建制度发动了猛烈地进攻，而且同帝国主义侵略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掀起了中国近代史

<sup>①</sup>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上第一次革命高潮，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它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峰。

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相当丰富而又深刻的历史经验，值得革命人民永志不忘。

太平天国革命无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残暴罪恶统治。但是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因而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自己并彻底战胜封建制度。太平天国英雄们第一次接触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但它没有丝毫的怯懦，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它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阶段，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本质，甚至错误地认为都是信奉上帝的兄弟，而丧失应有的警惕。

太平天国英雄们虽然提出了农民革命的伟大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表现了广大农民渴求消灭封建制度的美好愿望，但它是绝对平均主义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能使广大农民获得真正的彻底解放。太平天国英雄们在革命斗争中敢于拿起武器英勇善战，但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更不能抵制剥削阶级的思想侵袭，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太平天国领导者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到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存在

着封建势力复辟的危险性，对于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未能及时识破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并把它们清洗出去，因而造成极大的损失。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坚持了发动群众，大打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但也犯了一些战略性的错误。如“师行间道”孤军深入的错误指导思想，导致北伐的失败，使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对占领区往往弃地不守，使敌人卷土重来，重建反革命的统治；两次西征没有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因此，虽争得了上游，却守不住上游。农民阶级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使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把各地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力量，因而克服不了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太平天国英雄们用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农民阶级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军，又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但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才能成为现实。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①

---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八八页。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被中外反革命联合势力所绞杀了，但太平天国英雄们的革命活动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业绩，在中国历史上却永放异彩。

太平天国英雄们组织起强大的革命武装，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与封建王朝对峙着斗争着。英勇的太平军足迹遍及十八省，占领了六百多个城市，坚持了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它的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是中国封建社会任何一次农民战争不可比拟的，也是世界历史上所少见的。

太平天国英雄们高举反封建的旗帜，猛烈地扫荡了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它在广大的地区内把清政府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权力打得落花流水；反革命清军几乎被全部打垮，就是用新式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湘、淮军也屡吃败仗，使民贼曾国藩多次陷入绝境。大半个中国变成了农民的天下。

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进行了果敢的斗争。太平天国英雄们把封建统治阶级奉为“至圣先师”的孔丘这个精神偶像，打翻在地，把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宣布为“妖书”。它把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太平天国英雄们高举反侵略的旗帜，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武装反抗。从根本上否定了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不平等条约和一切侵略特权，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太平天国境内出现了“谷物丰收”，“民安物阜”的繁荣景象；江南某些地区大地主经济的削弱，自耕农的显著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活跃了商品经济。

太平天国革命给后来革命者留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启迪了后继者走上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

太平天国革命同时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十九世纪中叶，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国家进行疯狂掠夺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波斯、印度人民都举行了反对殖民者的起义，而以太平天国革命规模最大、时间最久，影响最深，它有力的影响和推动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

革命。”<sup>①</sup>

太平天国英雄们反封建反侵略的光辉业绩将永照史册，他们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崇高革命精神，将不断激励着我们团结战斗，奋勇前进，为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斗争！

---

<sup>①</sup>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六页。



##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 一、侵略者的新勒索和“修约”活动

**贪得无厌的侵略者** 1856年至1860年，英、法侵略者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它们企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基础上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十九世纪中叶，对于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经历了一个不平常的岁月。当时英国号称“世界工厂”。它的工业和贸易在世界上占第一位。鸦片战争后英国企图在中国增开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和内地税，扩大商品倾销市场和鸦片贸易。为了从政治上控制中国政府，它还提出公使常驻北京的要求。当英国资产阶级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之后，便不惜发动一场新的侵华战争，以武力逼使清政府妥协就范。

法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高涨，货币资本的高度集中，法国以大银行家为中心的货币和高利贷资本迅速膨胀起来。法国妄图以武力威胁清朝政府，以攫取更多殖民特权，特别是阴谋扩大在华传教势力，借以打开深入侵略

中国的道路。

沙俄在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国内建立了许多工厂，其中大多数是使用雇佣劳动的机器工厂。但落后的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沙皇俄国在政治上充当了“欧洲宪兵”的可耻角色。它反对和仇视一切进步事业，疯狂镇压欧洲人民的革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它支持英、法侵略者的罪恶目的就是趁火打劫，从中国吞并大片土地和掠夺其他殖民特权。

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棉纺织业、煤铁业都得到迅速发展。1850—1860年期间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它的经济发展急剧上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紧紧跟在英、法侵略联军后面，继续采取趁火打劫的侵华方针，企图攫取更多权益。

英、法、俄、美四国，尽管它们之间矛盾重重，但是出于共同的侵略利益，结成了暂时的联合侵华阵线。

**英、法、美的“修约”活动** 1854年，《中英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根据《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后“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的规定，援引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特权，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无理要求。美、法政府认为一旦英国“修约”成功，它们也可以援例修改《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因此采取了支持英国的立场。英国当时提出“修约”的主要内容是：（一）、要求中国全境开放，或长江自由通航，并开放

镇江、南京、温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二)、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三)、废除内地税；(四)、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次“修约”涉及到中国广大内地向侵略者开放和帝国主义势力伸进北京问题，清政府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对此加以拒绝。当时英、法正忙于克里米亚战争，美国更没有单独发动侵华战争的能力，因此外国侵略者这次“修约”的阴谋没有得逞。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要求全面修改《望厦条约》，以便乘机扩大侵华特权。英、法侵略者以“亚罗号”划艇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已决定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美国看到战争一触即发，认为“修约”的意义已经不大，于是宣布“中立”，加紧进行乘火打劫的活动。

## 二、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发动战争的借口** 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中国商船，从厦门开到广州黄埔港。广东水师象过去一样行使自己的权力，逮捕了隐藏在这艘走私船上的两名海盗和十名可疑的水手。蓄谋已久的英国侵略者故意歪曲并利用了这一事件。英国广州领事巴夏礼竟蛮不讲理地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还造谣说：清军在船上捕人时撕毁了英国的“国旗”。强令中国立即释放捕去的人犯，并向英国道歉。

实际上，英国提出的上述“理由”，纯属捏造。马克思在1857年时曾严正指出：“‘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现在用作借口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已经满期了。”<sup>①</sup>事实雄辩的说明，所谓“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完全是英国政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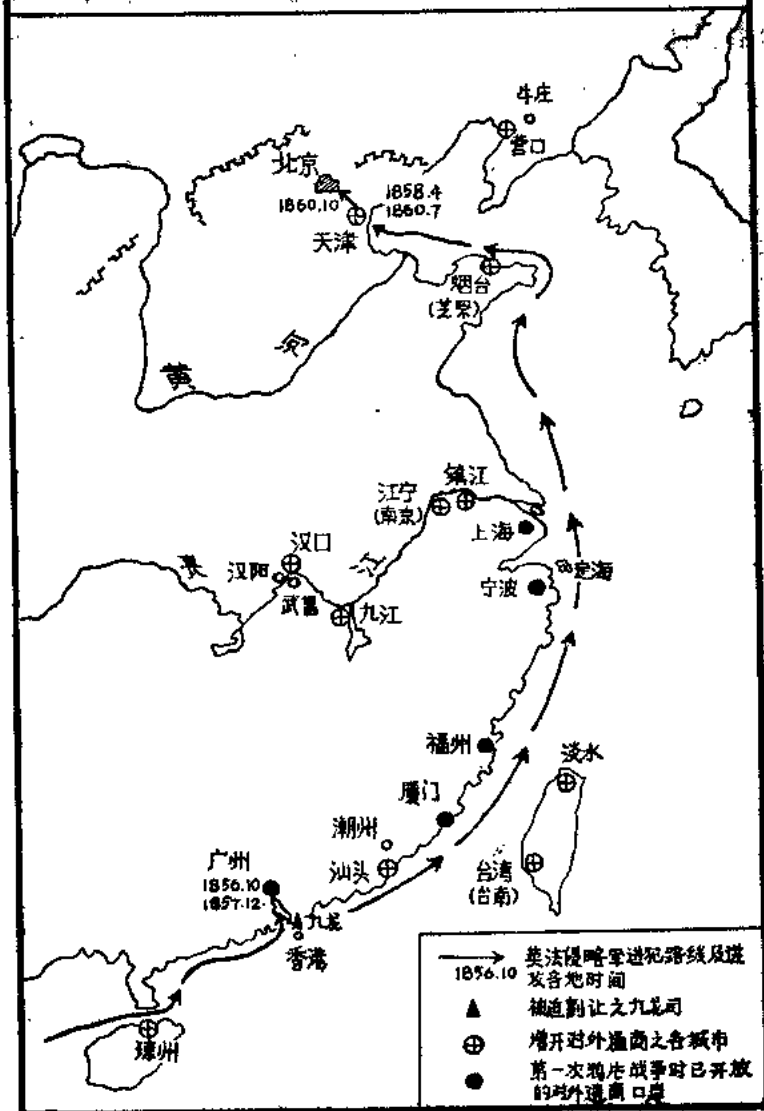
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个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不战不和不守”的家伙。他迫于英国的压力，把逮捕的水手送交英国领事馆，但巴夏礼既不接收水手，又拒绝接收叶名琛的复照。英国政府借机点燃了侵略战火。

英国发动这次侵华战争首先得到了法国侵略者的支持。1854年有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私自窜入广西省西林县传教。他勾结一些土豪、地痞，抢劫奸淫，无恶不作，激起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1856年2月，马赖被当地官府逮捕处死。法国政府却以此事件为借口，立即扯起“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与英国狼狈为奸，共同组成“英法联军”，开往中国，公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天津条约》 1856年

<sup>①</sup>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三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 (1856-1860年)



10月，英国侵略军悍然对广州发动进攻，侵占了省河两岸的炮台，并曾一度冲入广州城内纵火和掠夺。但因兵力不足，又不得不从广州退出。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准备，1857年12月，英、法组成五、六千人的侵略联军再次进犯广州。沙俄、美国公使也尾随在后。侵略军进城后，进行了野蛮的烧杀和掠夺，他们从广州布政使衙门抢走库银五十二箱，共二十二万七千两。叶名琛被侵略军捉住，送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竖起白旗投降。英、法侵略者在广州组织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利用卖国投敌的柏贵等充当他们的走狗，为侵略者维持地方秩序，禁止人民的反抗活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得寸进尺，步步进逼。英、法、俄、美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各项侵略要求。英、法的要求大致相同，主要内容是：要求公使驻京、开放新口岸、内地游历、赔款等殖民特权。俄、美除支持英、法外，沙俄还提出以黑龙江为中俄新边界的无理要求，美国则要求全面修改《中美望厦条约》。

1858年4月，英、法侵略联军麇集大沽。英、法、俄、美四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继续对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俄、美公使表面上装作“调停”，实际上完全和英、法侵略者一鼻孔出气。

5月20日，英、法联军对大沽炮台突然发起猛攻。俄、美两国把船舰驶进白河，为英、法联军助威壮胆。在侵略者的进攻面前，广大爱国士兵和下级军官英勇迎战，给侵略者以很大杀伤。这时由于清政府被太平天国革命烈火烧得焦头烂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人民革命，急于对外妥协退让，因此，大沽炮台很快陷落。接着，英、法联军又侵占天津，威胁北京。当时清政府慌作一团，面对着农民革命的打击和外国资本主义强盗入侵，决定采取对内坚决镇压，对外屈辱求和的反动方针。

1858年5月29日，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进行谈判。从6月13日至6月27日，先后与沙俄、美国、英国、法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商埠；外国军舰、商船可任意驶入长江各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同年11月，清政府又派遣桂良等在上海同英、法分别续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规定进口的洋货一律按百分之五的比率交纳关税，洋货运往内地及输出中国土货，只需一次交纳百分之二·五的子口税。还规定中国海关要邀请外人“帮办”。从此，外国侵略者通过他们的使节常驻北京，直接监视和控制清政府。凭

借很低的税率，向中国倾销外国商品，进而把它们的侵略势力向中国内地扩张起来。使中国主权再次遭到野蛮地践踏。

1859年，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乘船赴北京换约。清政府要求外国公使由北塘登陆，不得随带兵船，被外国侵略者蛮横拒绝。6月25日，英、法侵略联军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重新燃起侵略战火。当地中国守军坚决自卫反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沉击伤敌军兵船十余艘，敌军伤亡四百余人，侵略军头目、英舰队司令贺布也受了重伤。当时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看到英、法联军的惨败，高喊“血比水浓”的口号，鼓动美国舰队参加战斗，但也无法挽救败局。大沽保卫战的胜利，说明只要众志成城，坚决抵抗，就一定能挫败侵略者的武装进攻。这一胜利，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

**侵略战争的再起和《北京条约》**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的惨败，激怒了外国资产阶级。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豺狼即刻露出海盗的狰狞面目。马克思揭露说：“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致高声要求实行大规模的报复。”<sup>①</sup>在英国资产阶级一片战争鼓噪之下，1860年春，英、法又

---

<sup>①</sup>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二页。



纠集侵略军二万五千多人陆续开到中国。7月闯进大沽口外。8月敌军乘虚而入，攻占北塘，包抄大沽，占领天津，威胁北京。9月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同时派恭亲王奕訢向侵略者乞降求和。10月24日和25日，奕訢与额尔金、葛罗分别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同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到此，外国资本主义强盗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二）开天津为商埠；（三）准许外国侵略者掠卖华工；（四）割让九龙司给英国；（五）赔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产，法国传教士可以任意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六）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

**英、法侵略军焚掠圆明园** 1860年，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口，侵占天津之后，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北京。10月6日，侵略军闯进北京西北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明清两代皇帝的别宫，是经过一百多年时间修建成的。内有宫殿、别墅、花园、祠庙等精美建筑物二百余座，园内珍藏着中国罕见的历史文物——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金珠珍品和铜瓷玉器。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宫苑、园林艺术的典范，也是举世闻名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英、法侵略军闯进圆明园后，大肆抢劫。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头目格兰特都跑到圆明园去坐镇指挥，并亲

自进行掠夺。当时每个侵略者都是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他们遇到珍贵品则争相攫取，不便携带的如铜器、瓷器、木器等物，就立即击毁，借以寻欢作乐。

侵略军把抢劫的东西，一些直接装入自己腰包，一些集中到所谓“战利品管理处”，公开拍卖，集体分赃。英国女王和法国皇帝也都“分享”一份。这样，侵略者从最大头子到走卒，都得到了赃物。

不仅如此，在抢劫之后，为了消灭罪证，最后竟放火烧毁了这个世界名园。

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文学家雨果曾经斥责英、法强盗焚掠圆明园的罪行，他说：“把我们各大教堂的宝藏集拢在一起也是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的辉煌的博物院的。里面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杰作，并且堆积着金银珠宝。是丰功伟绩，也是贼运亨通，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篋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雨果对英、法强盗的愤怒抗议，表达了全世界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人士的无比义愤。

### 三、沙俄侵吞中国大片领土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直打着“中立”和“调

停”的幌子，紧紧跟在英、法侵华联军后面，不断对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趁火打劫，鲸吞我国大片领土。早在1847年，沙俄就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加紧向黑龙江流域扩张。1850年8月，海盗式冒险家涅维尔斯科伊领导的“探险队”强占了黑龙江下游的中国重镇庙街，改名为“尼古拉也夫斯克”（以沙皇尼古拉的臭名命名），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据点。沙皇尼古拉一世指着地图上庙街一带地方狂妄地宣称：“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升起来，就不应当再降下去。”接着，沙俄又侵占了库页岛的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北岸的许多中国领土。1854年5月，穆拉维约夫率领船只七十余艘，运载大批军队，蛮横地经石勒喀河闯入黑龙江，公然在黑龙江下游一带驻军，实行军事占领。1855—1857年，沙俄不顾清政府多次抗议，接连三次从后贝加尔地区调来哥萨克侵略军，擅自在呼玛河对岸，精奇里河口等地建立哨所，设置村屯，霸占了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的中国领土。

沙俄用武力蛮横地侵吞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后，乘英、法联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机会，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集结重兵，随时准备向中国开战；一面进行外交讹诈，派出又一侵华急先锋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企图以武力作后盾，逼迫清政府签订割地条约。这一阴谋计划受挫后，沙俄公使南下，与英、法、美相勾结，

共同对清政府施加压力。

1858年5月，英、法侵华联军攻占天津，威胁北京。穆拉维约夫突然率兵船直奔瑗珲城下（今黑龙江省瑗珲县境内），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领土要求。谈判一开始，沙俄就拿出事先拟好的条约草案，扬言不许更改。并且威吓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沙俄提出的要求，俄国就要联合英、法对华作战。同时，俄国兵船在黑龙江示威，鸣枪放炮，摆出一付杀气腾腾的架势。在沙俄威逼下，1858年5月28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沙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所谓“共管”，只不过是沙俄正式吞并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罢了。两年之后，沙俄便将中国这块神圣领土割占去了。

《瑗珲条约》的签订，赤裸裸地暴露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此曾加以强烈地谴责。1858年时马克思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sup>①</sup>恩格斯也指出：俄国

<sup>①</sup>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四一三五页。

**“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sup>①</sup>**

殖民强盗的胃口是永远填不满的。《璦琿条约》的墨迹未干，沙俄在1858年6月13日，又勾结美国公使以“调停人”的伪善面孔，抢在英、法前面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在这个条约里，沙俄除保持旧有的陆路通商权之外，又获得在上海、广州等沿海重要口岸通商的权利，以及内地传教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凡是其他侵略国家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好处，《中俄天津条约》都一点不漏地写了进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约第九条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所谓“秉公查勘”边界，它是沙俄企图借勘界机会，进一步吞併中国领土的一种阴险手段。当时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这一阴谋，指出：俄国“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sup>②</sup>后来沙俄吞噬

<sup>①</sup>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七页。

<sup>②</sup>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九页。

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恩格斯的英明论断。

沙俄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是无止境的。它从中国抢去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之后，又着手吞并乌苏里江以东地区。1858年，沙俄强行占领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中国重镇伯力，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以沙俄侵略中国急先锋、杀人魔王哈巴罗夫名字命名）。1860年6月，占领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控制东方”。可见沙俄侵略野心之大。

为了加强侵略中国，1859年6月，沙俄政府委派近卫军将领伊格纳切夫为驻华公使，他比普提雅廷更为狡猾。他一到北京，就向清政府提出了所谓“补续和约”六条，蛮横地要求中国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割给俄国。这一罪恶阴谋失败后，他便离北京南下，赴上海，再度与英、法合谋，以图借助英、法的军事压力实现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英、法侵略联军向天津、北京进攻时，伊格纳切夫也尾随北上，并向法国提供了关于清军在白河两岸设防的重要情报。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伊格纳切夫同英、法一起研究攻城的军事计划，并把俄国人测绘的北京地图交给英国侵略军使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伊格纳切夫又急忙窜到北京，帮助英、法侵略者展开对清朝的逼降活动。沙俄一方面装扮成中国的“救世主”，对清朝进行欺骗拉拢；另一方面又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清政府接受英、法的侵略要求，以便从

中渔利。1860年11月14日，清政府被迫派奕訢与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沙俄对中国西部领土也垂涎三尺，肆意侵占。中国西部疆界原在巴尔喀什湖。1847年，沙俄武装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54年占领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到1860年，沙俄侵略势力已扩展到伊塞克湖一带。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 四、中国人民痛击侵略者

**广东人民的愤怒反抗**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发扬了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南起广东，北至黑龙江，外国侵略者到处遭到我国人民的沉重打击。

1856年10月，英国悍然进攻广州，攻占沿海沿江炮台，到处烧杀、掠夺、奸淫，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新安县人民自动捐款，集结队伍，表示要与侵略者作殊死战斗，直到把它们赶走为止。12月，满腔怒火的广州十几万民众杀向侵略者盘踞的十三行洋楼，放火烧掉了敌人的据点。同月，英国邮船“提斯特尔”号满载从广州抢

来的珍贵物品，在虎门停泊，广东人民在夜间集中数百只小船，围攻这艘贼船。吓得侵略者慌忙割断绳索，狼狈逃窜。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烽火越烧越旺。三元里人民继续高举反侵略斗争大旗，并且庄严地宣告：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就“格杀勿论”。1858年4月，香港掀起大罢工，不到一个月就有两万余人罢工离港，使香港商业陷入瘫痪状态。6月间，侵略军一千余人攻打白云山，驻守在该地的乡勇设下埋伏，诱敌深入，当敌人到来时，主动出击，毙伤敌军多人。

侵略军被广东人民打得大败，十分恐惧，一直龟缩在广州城内，不敢出动。广州城内人民，常常三、五成群埋伏在重要道口，待敌人经过时突然袭击敌人。他们还在敌人经常活动的地方，挖陷阱，投火把。弄得侵略者胆战心惊，狼狈不堪，不敢轻举妄动。

当《天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人民义愤填膺，坚决反对这个不平等条约。愤怒的群众把揭帖贴到总督的衙门口，敦促官府反抗。1858年8月3日，英国侵略军头目巴夏礼乘轮船到新安县张贴告示，妄图镇压人民反侵略斗争，广大义勇当即奋起反抗，杀死敌军和汉奸数人。8月11日，侵略军出动兵船数十只，共二千多人，攻入新安县城，西乡沙井团勇进城与敌军展开顽强的战斗，“该夷力不能支”，“全军纷纷败回驶逸”。此战役，击毙敌兵一百多人，“击



伤者无算”。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曾经叫嚷：要“象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在广东人民坚决有力地打击下，粉碎了侵略者的痴心妄想。

**京津和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 在侵略者侵入天津和北京时，当地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狠狠地打击敌人。1860年6月，侵略军在天津抢劫时，天津人民爬上屋顶，向敌人大量扔瓦砾，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纷纷逃窜。同年9月间，天津王兴邦、隋登初等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焚毁敌船，打死打伤多名侵略军。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趾高气扬地向北京步步逼进时，谢庄人民更以出色的战斗对侵略者迎头痛击。谢庄距离北京西郊圆明园十余里，全村居民大多数是猎户。他们听说敌军要来侵犯谢庄，个个摩拳擦掌，怒火万丈，自动组织起来，在重要地点修筑石砦土堡，做好反击敌人的充分准备。10月1日，敌军逼进村庄时，猎民埋伏在石砦、土堡后面，群众一齐向敌人发起进攻，把外国强盗打得七零八落，遗下一百多具尸体，狼狈逃跑了。

地处祖国边疆的东北人民，很早就对沙俄的侵略奋起反抗。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的穷凶极恶，进一步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愤怒。世代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刨夫”（以采捕为业的贫民），不堪忍受沙俄侵占我国领土，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就安营扎寨一百五

十余座，集合一万多人，随时准备抗击俄军。少数民族也敌忾同仇，踊跃参加战斗。赫哲族的妇女，用斧头同沙俄侵略者英勇搏斗。1860年5月，居住在阔吞屯附近的赫哲族三十户，二百六十九人，带着牲畜和船只，迁到松花江一带，誓死不做沙俄的奴隶。分布在珲春以东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也大批迁到珲春。

革命导师恩格斯当时曾经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说：“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sup>①</sup>，“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sup>②</sup>

## 五、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各自从维护自己的反动利益出发，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基础上，结成了反革命同盟。这就是中外反动派吹嘘的所谓“中外和好”。

“总理衙门”的建立和“宫廷政变” 清政府为了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需要，于1861年1月，在北京设立

<sup>①</sup>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〇页。

<sup>②</sup>同上，第二一——二二页。

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负责办理外交事务，这是中外反动势力实行勾结的一个重要步骤。当这一机构刚要成立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鼓励和赞赏。英国公使威妥玛说：“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处（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说：“此实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

1861年8月，逃往热河的咸丰皇帝在承德病死。其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同治”。载淳年幼，咸丰遗诏命载垣、端华、肃顺等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朝政。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野心勃勃，擅长权术，急于取得实际的最高统治权。同年11月，那拉氏等回到北京，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发动了“宫廷政变”，罢免和处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顽固派官僚，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扫除了与侵略者勾结的障碍。那拉氏立即宣布垂帘听政，任命奕訢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从此，卖国贼那拉氏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进一步推行投靠外国侵略者的反动路线，在“中外和好”的幌子下，和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外国公使驻京控制清朝政府** 外国侵略者在北京设立使馆，目的是监督和操纵清朝中央政府，达到扩大他们侵略势力的罪恶目的。1861年3月以后，英、法、美、俄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外国公使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凌驾于清政府之上，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和外交。

实际上他们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外国公使驻京后，为了加强控制清政府，又不断提出“遣使出洋”的要求，英国在华大坐探、总税务司赫德曾经明白表示：通过遣使出洋可以把清政府更加“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它“欲退不能”。1868年即将离任回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演出了一幕直接“代表”清政府出使外洋，投递国书，擅订条约的丑剧。这个“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德、俄等国，并且同美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奇闻。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病死于俄国，这幕丑剧才算告终。

**侵略者扶植媚外势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反动势力加速了罪恶的勾结。外国侵略者纷纷表示愿意“助剿”太平天国革命，清朝封建统治者在它的主子支持下向太平军猛扑过来。在中外反动派杀气腾腾、反革命气焰高涨的时候，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洋务派是从封建统治集团中产生出来的，是一批直接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的、买办化的军阀官僚。洋务派以“求富求强”相标榜，首先是从“求强”开始。无非是购买外国枪炮，聘请外国教官训练中国反动军队。接着，洋务派自己又陆续创办军火工业，制造杀人武器。洋务派最早创办的军火工业是1861年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军械所。但它的规模较小。以后又相继创办几所较大

的军火工业。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制炮局，1864年在苏州建立西洋炮局，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建立机器制造局。

洋务派在创办军火工业的所谓“自强”过程中，感到筹款困难，于是又提出所谓“富”是“强”的“根本”。这样，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又创办一些“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算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洋务派为了和外国办理交涉，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培养翻译人员。同时，还派遣留学生出国，培养买办人材。

洋务派所从事的这些洋务活动，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操纵清政府，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从封建统治集团中产生出来的这批洋务派，在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湘系军阀曾国藩、左宗棠和淮系军阀李鸿章为代表。他们在政治上推行一条崇洋媚外的卖国路线。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洋务派鼓吹的什么“求强”、“求富”，纯粹是一个骗局。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既没有强，也没有富，而且是越来越弱，越来越穷。历史事实戳穿了洋务派的无耻谎言。洋务派绝不是进步力量，而是帝国主义豢养的十分凶恶

的走狗。

**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 在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过程中，海关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外国侵略者掌握中国海关等于掌握中国大门的钥匙。1854年英、美、法驻上海领事，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乘清朝地方政权瓦解之机夺取了上海海关的管理大权。这种上海式的殖民地的海关制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很快扩展到镇江、宁波、天津、福州、武汉等地。全国总税务司职务也为外国人窃取。总税务司职务先由英人李泰国担任，1864年由英人赫德继任。在总税务司下面，各口岸的税务司、付税务司、关长、帮办等高级职务全都由外国人控制。海关关税也由外国人征收。外国侵略势力直接管理中国海关，就为他们进一步控制清政府，影响与干预清朝内外政策，提供了重要条件。

事实上，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几乎事无巨细，都要听从总税务司和地方税务司的摆布。

由上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通过这次侵华战争，英国霸占了九龙司，俄国霸占了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国侵略者在战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从而全面地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此后，中外反动派进一步勾结起来，公开地站在一起疯狂地向中国人民猛扑过来，最后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 第四章 中法战争

### 一、外国资本主义魔爪伸向 中国邻邦和边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宁指出：“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sup>①</sup> 远东是资本主义国家剧烈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更是它们争夺的主要对象。在英、法、美、俄和后起的军国主义日本、德国的加紧侵略下，琉球、朝鲜、缅甸、越南等邻国，先后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外国侵略者并以这些国家作为桥头堡，向中国伸张侵略势力，造成中国边疆地区的严重危机。

**美、日侵犯台湾** 邻近国家中第一个完全丧失独立的是琉球。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曾被台湾高山族误

<sup>①</sup>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九八页。

杀做为借口,出兵侵入台湾。5月,三千日本侵略军在台湾东南部琅琦登陆,对当地居民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

当时日本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实力有限,竟敢冒然侵略中国,是和美国的支持分不开的。美国对台湾早有侵略野心。1867年,美国派军舰侵入台湾,被当地人民击退。此后美国不断怂恿日本的侵华活动。日本侵略台湾时,美国军舰还停泊在琅琦,为日本打气壮胆。

1874年10月,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北京专条》,赔偿日本白银五十万两,清政府被迫承认:台湾高山族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此次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日本侵略者以此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根据。1875年,日本侵略势力伸进琉球,并强迫琉球断绝同中国的一切关系。1879年,正式吞併琉球,改为冲绳县。

日本还积极对中国的友邻国家朝鲜扩张侵略势力。1875年,日本兵舰侵入朝鲜江华岛,大肆烧杀抢掠。朝鲜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这是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于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美、英、德、俄、法等国,先后强迫朝鲜签订条约,争夺在朝鲜的权益。

英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侵入缅甸南部各地。



在英国侵略缅甸的同时，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也极为猖狂。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侵占了越南南部以后，七十年代又开始向越南北部进攻，妄图占领整个越南，进而侵略中国。

由上可见，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魔爪，已从四面八方向中国伸来，中国边疆地区发生了普遍危机。

**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覬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曾妄图修建一条由缅甸到云南的铁路。1874年，英国派遣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从缅甸进入云南。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前往缅甸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窜到腾越，强行过境，首先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群众奋起将马嘉理打死，给英国侵略者当头一棒，“探路队”狼狈逃回缅甸。

英国这时借机向中国讹诈勒索。清政府在英国威胁下，于1876年9月，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

(二)各地涉及英国人生命财产案件，英国可派员“观审”；

(三)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

六

(四)洋货运入中国内地，不论华商洋商，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

(五)英国得派员调查中缅边界贸易情况；

(六)英国可以派员从北京出发，经过甘肃、青海或经四川前往西藏，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

《烟台条约》进一步暴露了英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我国西藏的狼子野心。

**沙俄对新疆的领土野心** 英、俄对我国新疆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很快占领了天山南北两路，并建立了几个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先后为反动封建主所窃取，他们实行封建割据，甚至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1865年，中亚细亚浩罕汗国的军队头目阿古柏乘机率军侵入新疆，先后侵占了天山南北大片中国领土，1867年，建立了“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在新疆实行残暴的统治。

阿古柏是英、俄的一条走狗。英国承认阿古柏伪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并给以大批枪枝弹药。沙俄急于同英国争夺阿古柏，1872年同阿古柏订立“商约”，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首领”。阿古柏成为俄、英侵略我国的工具。

野心勃勃的沙俄，为了吞併中国西部领土，还直接出兵新疆。1871年，以所谓“代收”“代守”为名，驱使俄

军占据了伊犁。在这里设官分治，建造房屋，移民垦殖，妄图赖着不走。充分暴露出沙俄久据伊犁和扩大其占领地区的野心。

1876年，清政府经过充分准备，决定派左宗棠率领军队用武力收复新疆。新疆各族人民苦于阿古柏反动政权的压迫，到处掀起反抗斗争，并同清军夹击阿古柏军队。阿古柏在败逃中丧命。1878年清军收复新疆，英、俄分割我国新疆地区的阴谋遭到沉重地打击。

1878年，清政府向沙俄提出索还伊犁的正义要求，并派崇厚赴俄交涉。1879年10月，卖国贼崇厚在沙俄政府的逼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规定中国把霍尔果斯河以西及特克斯河一带大片领土割给俄国。此外，还赔款五百万卢布，开辟新的通商路线，允许俄国在乌鲁木齐等七处设领事馆等。中国用重大的代价所收回的只不过是残破了的并丧失了险要的伊犁九城。消息传来，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纷纷要求改约。1880年，清政府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交涉，被迫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了《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伊犁，沙俄却仍然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大片领土，并且把赔款增为九百万卢布。

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签订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吞并了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政府是世界人民最凶狠最残暴的敌人，它“有

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sup>①</sup>它不仅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而且不顾条约的规定，还强行侵占中国领土。如1892年，沙俄违约侵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沙俄共割占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整个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

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邻国和边疆侵略的加深，引起边疆局势的动荡，预示着中国更广泛更严重的边疆危机的到来。

**黑旗军和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兄弟邻邦，中越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友好往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sup>②</sup>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指出：“越中两国人民早就有着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近百年来两国人民都曾长期饱受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不但是友好邻邦，同时也是患难的兄弟。”<sup>③</sup>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对越南和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

---

<sup>①</sup>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七页。

<sup>②</sup>毛泽东：《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196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sup>③</sup>1955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侵略战争。面对穷凶极恶的法国侵略者，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

早在十六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就进入了越南。

法国侵占越南南部之后，继续向越南北部进犯。在越南北部战场上，黑旗军和越南人民共同抗击法国侵略者。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起义的队伍，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又名“黑旗军”。起义失败后，于1867年进入越南。当法军侵占河内时，黑旗军应越南政府邀请，参加了抗法斗争的行列。1873年12月，法国侵略军出来挑战，刘永福挥师猛进，在河内城郊初战告捷。击毙侵略军头目安邨，并缴获大量武器。为表彰黑旗军的战功，越南国王授予刘永福三宣副提督职务。

1883年5月，法国侵略军向黑旗军阵地进攻，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纸桥一战，大败法军，侵略军的头子也在战场上丧命。

1883年8月，法军重新集结，猛攻黑旗军驻地怀德。侵略者竟利用河水上涨的机会，掘开河堤，企图淹灌黑旗军阵地。由于黑旗军早有预防，以及越南人民连夜开船救援黑旗军，黑旗军退到丹凤驻地，使法国侵略者的阴谋破产。9月，法军又进犯丹凤，激战三昼夜，使法军受到沉重地打击。

正当中越人民并肩战斗，节节胜利的时候，1883年

8月，法国侵略军攻入顺化，用武力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把越南变为法国的“保护国”。

## 二、中法战争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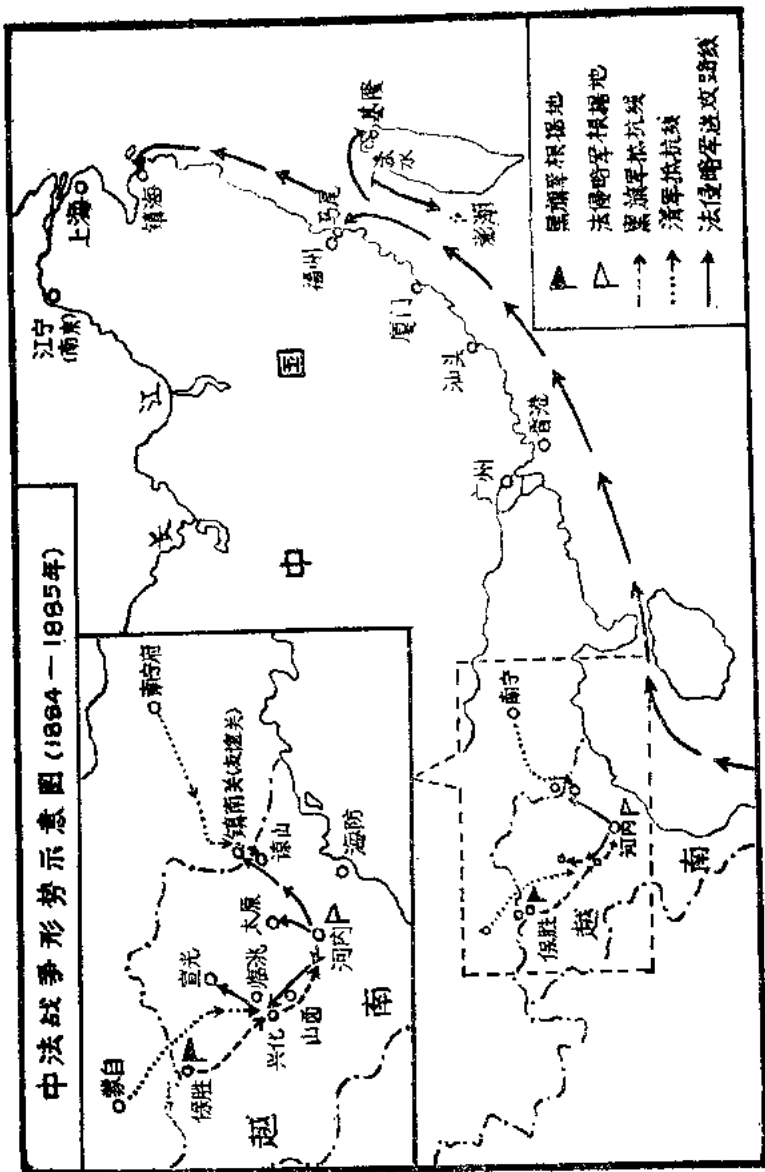
1884年

**法国发动侵略战争** 1883年，法国组成第二届茹费理内阁。狂热的殖民主义头目茹费理，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

1883年12月，法国侵略军头子孤拔率法军六千人，分乘十二艘兵船，带大炮二百多门，向越南的山西大举进犯。黑旗军在给养缺乏的困难条件下，与敌军血战三日，歼敌三百余人。后因山西前线军队庞杂，指挥不统一，特别是前线指挥唐炯是个逃跑主义者，交战后滇、桂军和越军相继撤退，唐炯逃回云南，山西因此失守。

1884年2月，米乐接任法军司令职务，调孤拔指挥海军。米乐重新调兵遣将，企图继续进攻越北。3月，法军一万六千人进攻北宁，清军把北宁重镇拱手让给敌人。山西、北宁失守后，接着，法侵略军又占领太原、兴化等城，越北一些重镇相继落入敌人手中。

这时，法国乘胜展开诱降活动。1884年3月，法军舰长福祿诺通过德国人德璀琳，向李鸿章提出议和要求。卖国贼李鸿章迎合法国侵略者，竭力主张投降。他和法国一唱一和，用“外战”会引起“内乱”来恐吓清政府。清政府立刻派李鸿章和法国谈判。1884年5月6日，李鸿



章与福祿诺在天津会谈。一个外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道：“这两位谈判者谈得情投意合”。在短短一个下午，就全部达成了协议。5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法天津简明条约》。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法国在中越边界通商；清政府撤回在北圻的军队。

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并没有换来它所希望的“和局”。1884年6月，法侵略军向谅山、北黎推进。中国守军当即予以反击，法军大败。法国侵略者，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反而诬蔑中国违反《中法天津简明条约》，要求中国撤军、赔款，同时向中国海面调动军舰，立即把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

**马尾海战** 1884年7月15日，法国舰队开向我国闽江马尾军港，清军不但不进行反抗，反而“殷勤欢迎”。8月23日停在闽江的法国军舰采取突然袭击的强盗手段，向中国舰只开炮，中国兵舰仓促应战。海战开始后七分钟，中国军舰大部分被击沉、击伤，三十分钟后海战结束。

马尾海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的广大下层军官和士兵仍然英勇抵抗。旗舰“扬武”号，用尾炮打击法国兵舰“伏尔他”号，击毙侵略者六名，孤拔也差一点丧命。“振威”号在法舰开炮后，立即砍断锚索，向法军发炮还击，在被打沉前，这艘只有五百多吨的小炮艇，还



发射了最后一枚炮弹，给敌人最后一击。“福星”号在开战后即向敌舰冲去，法国鱼雷艇几乎被它击沉，它的炮弹连连命中法国旗舰“伏尔他”号。“福星”号英勇善战，最后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船官兵壮烈牺牲。“福胜”、“建胜”等舰，也都英勇不屈，直到沉没。接着，法国侵略军用大炮轰毁了马尾造船厂。这个船厂是洋务派聘请洋人，花费十多年时间和几百万两银子开办起来的，是清政府的重要军事工业之一。这个由法国工程师设计、用法国设备建起的造船厂，最后仍被法国侵略者摧毁。马尾海战的失败，完全是清政府妥协投降路线造成的。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才正式对法宣战。

马尾海战后，法国侵略者一面通过英、法驻华公使，加紧诱和活动；一面继续增兵，大举进犯。1884年10月，法军把主力转为进攻台湾，在基隆港口，强行登陆。台湾各阶层人民纷纷起来进行抗法斗争，协助守军抵抗法国的侵略，在淡水大败法军，并多次击退从基隆进攻台北的敌军，粉碎了敌人占领台北的计划。

1885年3月，法国舰队侵扰浙江镇海，中国守军坚决还击，孤拔座船被击中，法军狼狈逃跑。法国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3月底又强占澎湖。

**镇南关、谅山大捷** 法国和中国进行海战同时，在越南北部和中越边境也展开了激战。法军分东西两路进攻。1884年底和1885年2月，先后攻陷西路宣光和东路

谅山，并攻入镇南关(今友谊关)。

法军侵占谅山，气焰十分嚣张。广大人民对法国侵略者恨之入骨，决心把镇南关变成埋葬法国侵略者的坟墓。在人民群众反侵略浪潮的推动下，一部分爱国将领也率领广大官兵，英勇杀敌。此时，中国军队重整旗鼓，前敌指挥机构经过了重大调整和改组，任用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帮办军务，担任前敌主帅，指挥作战。广大士兵义愤填膺，准备与法国侵略军决一死战。

1885年3月，中法两国军队在镇南关展开了关系全局的一战。法军在司令尼格里驱使下，兵分三路闯进镇南关。中国军队在阵地前奋勇阻击，官兵们表现了旺盛的战斗意志。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的指挥下，与法军展开肉搏战。中国军队在战斗中得到越南人民的热情帮助，有的带路，有的报信，有的直接参战。在这场激战中，法军死亡千余人，受到了致命打击，狼狈逃出镇南关。接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收复谅山等地。法军司令部在向法国政府报告中哀叹：“我痛苦地报告你，尼格里将军受重伤，我军撤出谅山。中国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地涌出三个纵队，势不可挡地攻击我军”。法国侵略者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惨败。

在东路捷报频传的时候，西路的黑旗军、滇军和越南军也获得了重大胜利，在临洮挫败法军，接连收复很多失地。

镇南关——谅山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法国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使法国在政治、军事上陷于一片混乱。法国人民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发动侵略越南和侵略中国的战争，欢呼中越两国人民在反对法国侵略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法国人民在巴黎举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打倒卖国贼！”这个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的内阁，在中越人民铁拳的打击下，在法国人民的抗议声中终于垮台了。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正当前线大捷，法国茹费理政府垮台，形势变得对中国十分有利的关键时刻，清政府反而唱出所谓“乘胜即收”的卖国论调，于1885年4月7日下诏停战，向法国侵略者妥协投降。

从中法战争爆发以来，战争和谈判不断地在交替进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从中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都争先恐后充当“和事佬”，从中渔利。马尾海战以后，幕后的“调停”活动更加活跃。英国帝国主义大坐探赫德以总税务司的特殊地位操纵清政府的谈判大权，曾派他的亲信、海关税务司金登干为代表，在巴黎和法国进行秘密谈判。1885年4月4日，金登干代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主要内容为：

- (一)、两国遵守《中法天津简明条约》；
- (二)、双方停战；

(三)、中国从越南撤兵。

《巴黎停战协定》签字后，中法双方又继续商订条约细目。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正式签订和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结束中法战争的最后和约，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

(二)、在中越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

(三)、法国从云南、广西进出口货物，应减轻税率；

(四)、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和法国人“商办”；

(五)、法国撤走澎湖和基隆的军队。

《中法巴黎停战协定》、《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声言，黑旗军一日不离开保胜，法国就一日不交还澎湖，以此逼迫清政府消灭黑旗军。清政府也极端仇视黑旗军，由于中法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清政府曾一度利用黑旗军，抵抗法国的进攻。一旦中法达成“和议”，清政府便调转枪口准备消灭黑旗军。1885年4月到6月，清政府连下九道命令调刘永福入关回国，在清政府的种种威胁利诱之下，8月初，刘永福率领黑旗军三千人入关。清政府任命刘永福为广东南澳镇总兵。以后黑旗军被逐年削减，最后裁掉十分之九，只剩下三百人。刘永福投靠清政府的行为，损害了黑旗军的反法斗争事业。但是，留在越南的黑旗军余部，仍

然和越南人民一道坚持抗法斗争。

### 三、人民群众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

中国人民具有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中法战争时期，同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活动相反，当法国侵略者深入中国领土之后，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进行反侵略斗争。

这一时期，法国侵略者的急先锋——法国传教士，紧密配合法国的军事行动。他们加紧搜集军事情报，散布谣言，收罗党羽，从精神上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为法国侵略中国鸣锣开道。因此，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

1880—1882年间，广东的清远、花县，广西的南宁、梧州多次爆发了反洋教斗争，群众拆毁教堂，殴打教士，驱逐教徒。1883年，群众围攻云南浪穹县长营教堂，将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张若望等十余人处死。1884年秋季，广东人民听到法军进犯闽江的消息后，无不怒火满腔，几百里内互相传达消息，万余人集会，要求赶走法国传教士。广东省东莞、潮州、揭阳、佛山、广州等地的教堂先后被捣毁。广东的传教士纷纷逃往香港。

沿海和边疆的反洋教斗争，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制止了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前方对法作战。

在中国人民反抗法国侵略中，香港工人反法斗争，

表现尤为突出。1884年9月中旬，被击伤的法国军舰，开到香港修理，香港船坞工人罢工，拒绝为敌人修理战舰。

香港搬运工人也举行罢工。正当法国侵略军全力进攻台湾时，法国虽然出高价招工搬运物资，但香港搬运工人坚决拒绝搬运。驳船工人、人力车工人、制木工人、轿夫，也相继举行罢工。香港的中国商人也罢市支援工人的斗争，拒绝卖给侵略者商品。

当时香港是法国侵略军的战略物资重要供应基地，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造成了法国远东舰队物资补给的严重困难。法国侵略者勾结港英当局镇压工人罢工，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香港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法战争期间，越南人民发动了广泛的反法斗争，多次支援中国军队作战。为中国军队带路，侦察敌情，直到直接参战。越南人民在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越两国人民在共同反侵略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 四、中法战后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

中法战后，法国侵占越南，英国吞并缅甸，日本侵入朝鲜，一连串触目惊心的事件，使中国边疆完全暴露在侵略者的刀锋之下，出现了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严重局势。

当时法国最关心的是在中越边界进行陆路通商的问题。1885年至1886年间，法国代表戈可与李鸿章进行了多次谈判。1887年6月中法在北京又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其中规定：中国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蛮耗为商埠，法国可在这两个地点派驻领事；法国商品经过上述地点运入中国，比沿海口岸征税额减十分之三，法商由中国运出土货经越南，减税十分之四，法国船只交纳少量船钞后可从中国河流自由航行于越南的谅山及高平间，法货也可利用这些河流运入中国。上述关于设立领事、减税、航运等条款，使法国在我国西南地区取得了特权地位，为以后法国霸占我国西南地区为其“势力范围”打下了“基础”。

法国侵占我国西南各省的时候，英国和沙俄进一步侵入了我国西藏地区。

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英国先后侵占了靠近西藏的中国邻国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不丹，把这些国家作为侵略西藏的桥头堡。1888年初，英国发动了侵略西藏的战争。清政府不仅不积极支持西藏同胞的抗英斗争，反而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向英国屈服。1890年签订了《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哲孟雄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1893年中英再订《藏印条款》，清政府同意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多年企图侵入西藏的阴谋，初步得到实现。

十九世纪下半期，沙俄不断覬覦我国领土西藏。从1870年开始，十多年间，接连五次派“调查团”到我国西部地区进行阴谋活动。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沙俄又打着“科学考察”、“旅行”、“访问”等招牌，纷纷潜入西藏搜集情报。甚至沙俄总参谋部的军官也到西藏，进行间谍活动。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沙俄企图侵略我国领土西藏的狼子野心。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也尾随在英、俄、日之后，乘机向中国敲诈勒索，企图把早已侵占的中国领土澳门变得“合法化”。在中法关系紧张时，葡萄牙曾几次乘机逼迫清政府正式承认澳门归它所有，但它的阴谋没有得逞。中法战后，在赫德的操纵下，派他的得力干将金登干代表清政府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谈判。1887年3月，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其中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

中法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侵占了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危机更加恶化。



## 第五章 中日甲午战争

### 一、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的 中国和朝鲜

**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争夺** 十九世纪末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统治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就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sup>①</sup>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争夺日益激化，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非洲、亚洲地区和国家，基本上被各帝国主义瓜分完了。于是朝鲜和中国，便成了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主要目标。

贪婪的沙俄，在不断吞噬中国领土的同时，还妄图争霸太平洋地区。从1891年起，它便加紧修筑从欧洲直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并极力向朝鲜和中国东北渗透侵略势力。图谋在西太平洋抢占不冻海港，打开向

---

<sup>①</sup>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三九页。

太平洋扩张的通路。

当时在亚洲殖民势力最大的还是英帝国主义。英国为巩固与扩大它的侵略地位，同大肆向远东扩张的沙俄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世界大部分弱小国家已被几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分割，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更加疯狂地争夺朝鲜和中国。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1893年吞并太平洋战略要地夏威夷群岛之后，野心勃勃地要建立太平洋帝国，极力向西太平洋（主要是中国）扩张侵略。

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国。朝鲜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物产，使帝国主义垂涎三尺。在它们互相争夺之下，朝鲜成了世界列强在远东角逐的焦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充当了帝国主义争夺朝鲜和中国的急先锋。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经济、政治上封建残余势力还十分顽固。“武士道”精神仍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日本广大劳动人民十分困苦，国内市场越发狭小。日本一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带有军国主义的显著特色。“明治维新”后，日本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就制订了首先侵占朝鲜，然后大举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

1884年，日本侵略者利用中法战争的机会，唆使朝鲜亲日派官僚，在朝鲜发动了叛乱，组织了亲日政府。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广大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数十万朝鲜军民奋起“入宫杀尽倭奴”（倭奴，即日本侵略分子）。给日本军国主义以迎头痛击。

这次政变失败后，日本统治集团，发出一片战争叫嚣。疯狂地准备对朝鲜进行报复并决定趁机进攻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气焰所以这么嚣张，是和它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和纵容分不开的。英帝国主义，为维护它在中国既得的侵略权益，企图利用日本来抵制沙俄南下。因此，它对日本向朝鲜的扩张，在没有从根本上触犯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的前提下，便采取了支持和纵容的态度。

美帝国主义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采取扶助日本打头阵，从中取利的侵略方针。所以美帝国主义是日本对中、朝推行侵略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中日甲午战前，沙俄在远东的侵略力量还有难以克服的弱点。它的运输条件没有解决，它在远东的兵力还不足。尤其当它发现，在日本的背后还有美、英的影子时，为顾及其自身的侵略利益，宁愿暂时坐守观望，而不肯冒险从事。

**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路线** 1893年，日本军国主义在美、英的支持和纵容下，决定加速推进战争日程。于是，

远东战云密布，形势极为紧张。这时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地位。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1874年同治帝死后，新即位的光绪帝年幼，由同治帝的生母那拉氏操纵政权。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对那拉氏把持政权越加不满。于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帝党”和“后党”两个派系。“帝党”和“后党”同属清朝统治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中日甲午战前，以那拉氏为首的“后党”，包括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仍然控制着清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他们是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一小撮民族败类。他们对外仰承帝国主义鼻息，推行所谓“以夷治夷”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仇视一切新生事物。八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打着“自强”的旗号，致力经营以威海卫和旅顺口为基地的“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已建成拥有一定实力的近代海军。可是，这支海军从训练到管理，都操在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手里。北洋海军，实际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

## 二、中日战争爆发

**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 1894年春，朝鲜民间的秘密组织“东学党”（又名“东学道”），举起“逐灭夷倭”、“除暴救民”的革命大旗，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6月初，起义军攻克了全罗道首府全州，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朝鲜南部。朝鲜统治者无力镇压，急忙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见有机可乘，便诱使清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对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恶意煽动和虚伪保证信以为真，当即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出陆军一千五百人，由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于6月4日开赴朝鲜。

在清政府正式出兵前的6月2日，日本政府就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作出乘机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定。接着，组成了大本营，发布了动员令，集结了全部的陆、海、军。借口“保护侨民”向朝鲜出兵。6月9日，从仁川登陆逼向汉城。大批海、陆援军也陆续开向朝鲜。李鸿章对迫在眉睫的战争，不作任何准备，继续把赌注押在帝国主义列强身上，幻想它们出来制止日本的侵略。电令牙山驻军，不准抵抗。当时日、英两国正在进行肮脏的交易。日本以承认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侵略权益为条件，与英帝国主义达成了“谅解”。这时，心怀鬼胎的沙俄假惺惺地扬言，要对日本实行“压服之法”。实际上，狡诈阴险的沙俄，也只是在观望形势，以求一逞。李鸿章推行的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路线，只能进一步助长日本侵略者的气焰。

日本侵略者，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蛮横地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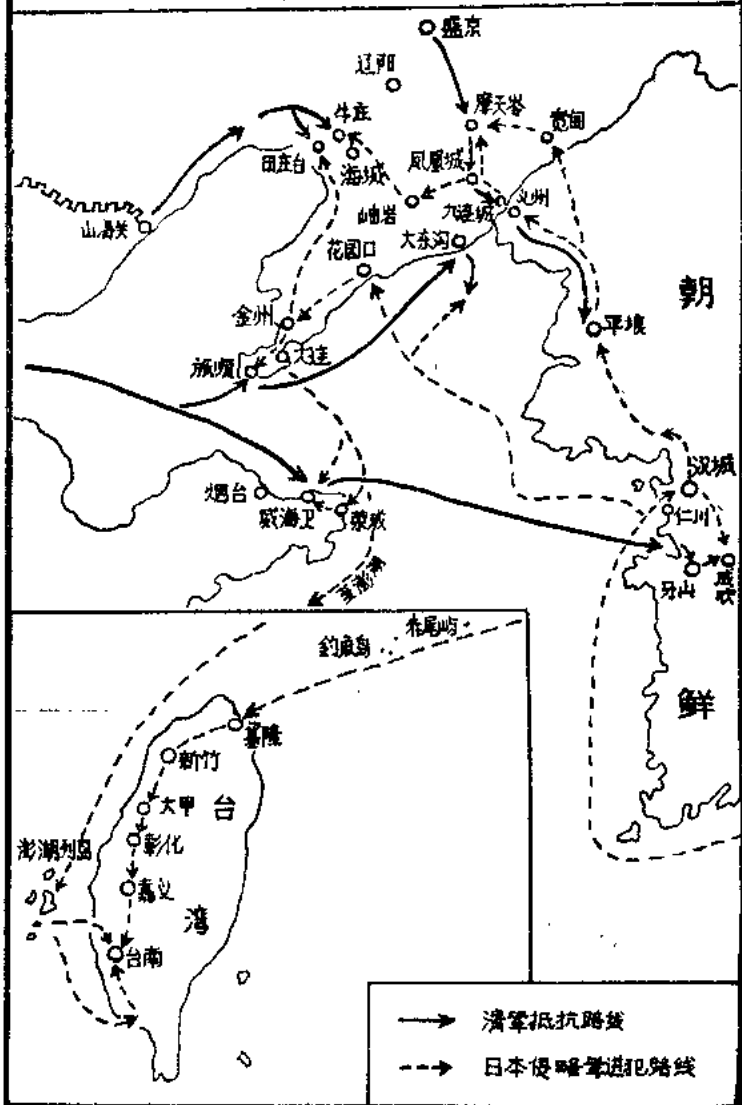
绝清政府关于中、日双方同时自朝撤兵的建议，并且于6月10日侵占了汉城，控制了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包围了牙山的中国守军。到6月底，在朝鲜的日军已增加到一万来人。驻守牙山的中国军队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7月23日，日本侵略军冲进朝鲜王宫，劫持了朝鲜国王，扶植起傀儡政权。

7月21日，由于广大爱国军民的强烈要求和社会上反侵略舆论的日益高涨，李鸿章被迫租用英国的“高陞号”等三只轮船，运载一支援兵，在军舰护送下开赴朝鲜。当这支援军开到丰岛附近，即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在战斗中，主力舰管带（即舰长）方伯谦放弃指挥，临阵逃脱，致使中国舰只遭受严重损失。与此相反，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广大士兵出自爱国义愤，自动发炮奋勇反击，使“吉野号”敌舰受到重创。“高陞号”轮船虽中敌炮徐徐下沉，但船上近千名中国官兵，宁死不屈，与船同归于尽。驻守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贪生怕死，狼狈地逃往平壤。而于光圻等广大爱国士兵却坚守阵地，顽强抗敌，直至最后壮烈殉国。

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海、陆军发动偷袭后的第七天（即8月1日），才向中国正式宣战。同一天，清政府也被迫对日宣战。这时李鸿章才无可奈何地向平壤和中朝边境地区，增派了较多的援军。

**平壤战役** 坚守平壤，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方

中日战争形势示意图 (1894—1895年)



面，可以挫伤敌人气焰，打乱日本侵略者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更可以鼓舞斗志，使朝鲜北方免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然而，清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投降路线支配下，既不指令平壤守军进行积极主动地战守；又不组织有力地后勤支援。平壤守军“总统”（即“总指挥”）叶志超，忠实地执行了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一再消极敷衍。9月14日，日本侵略军向平壤大举进犯。扼守大同江东岸的前沿守军，奋起杀敌，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当时，据守北门的总兵左宝贵，一方面派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他潜逃；另一方面亲自带领广大士兵与日军展开浴血奋战。他全身受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炮手牺牲了，左宝贵亲自动手开炮，猛轰敌军。直到最后英勇战死，为国捐躯。在左宝贵的影响下，全体士兵斗志昂扬，一再挫败日本侵略军的攻势。东线和南线的中国守军，不断打退敌人的进攻，也取得了胜利。在敌我展开激烈争夺战的关键时刻，叶志超放弃指挥，致使日军突破北线，攻占了牡丹台。9月15日，叶志超强令全线撤兵，连夜向北逃跑。21日，叶志超率领败将残兵逃回国内，平壤失守。

**黄海海战** 平壤战役后的第三天，在鸭绿江口爆发了“黄海海战”。9月17日，由海军提督（即“海军司令”）丁汝昌，率领一支北洋舰队（共由十四艘舰艇组成），护送边防军到辽东大东沟登陆以后，刚刚启航要返回旅顺



港的时候，发现远处驶来一支悬挂美国国旗的舰队。当双方舰队渐渐接近时，对方舰队的国旗突然变成日本国旗了。日本舰队以美国星条旗做掩护，是美、日狼狈为奸侵略中国的又一铁证。

日本出动的舰艇共十二艘。从双方的实力来说，不相上下。但是日本侵略者，这次仍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手段。中国方面，李鸿章竟然委派德帝国主义分子汉纳根，随舰队作指挥。并在这支舰队出航前，责令丁汝昌“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海战爆发后，刘步蟾、方柏谦等投降派将领，违抗丁汝昌的命令，在汉纳根的庇护下，争相退缩，破坏了作战部署，使自己舰队队形发生混乱，给敌舰造成可乘之机，因此，中国舰船先后被毁伤数艘。但是以管带（舰长）邓世昌、林永升，炮手谭成文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官兵，始终同仇敌忾，拚死抗敌，重创敌舰多艘，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由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官兵，战斗分外勇猛。当炮弹打完之后，邓世昌亲自鼓轮，开着渐渐下沉的重伤战舰，向敌主力舰“吉野”号猛冲过去，誓与敌舰同归于尽。不幸“致远”舰途中中雷沉没，邓世昌与舰上全部爱国官兵壮烈牺牲。这次海战共进行五个多小时，最后，日本的所有舰艇都受到轻重伤。日本唯恐再遭到中国增援舰队的攻击，便慌忙撤走。丁汝昌也率领余下的舰只回到旅顺。

**日军侵入中国及其暴行** 平壤、黄海海战后，中国的

陆、海军还有相当的实力。同时，由于日本把侵略战火燃到中国本土，清政府的主战派又十分活跃。国内要求组织抵抗的舆论更加强烈。可是，清政府的投降派势力，依旧把持着军政实权。他们大肆散布“抵抗必败”的投降谬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乞求英、俄帝国主义出面“调停”上面，对组织武装抵抗，更加敷衍消极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按照它原定的侵略计划，从10月下旬起，分水、陆两路进犯中国。水路自花园口登陆南侵；陆路从新义州过鸭绿江西犯，扑向中国辽东。日军侵入辽东后，几乎没有遇到清军的有力抵抗，就先后攻陷安东（今丹东）、宽甸、凤凰城、岫岩、金州等地。11月7日，大连港也相继失陷。日军侵占大连后，继续扑向旅顺。当时驻守旅顺的各部将领，只顾抢船内逃。独有总兵徐邦道率部奋起抗敌，给敌军先头部队以沉重打击。终因徐部兵力单薄，支撑不住，旅顺的北部防线被敌突破。11月22日，旅顺要塞被日军侵占。

旅顺是洋务派头子李鸿章，从1880年起，耗费了无数人民血汗，修建的一座近代化北洋海军基地。这里地势险要，炮台棋布，是个易守难攻的海防要塞。旅顺要塞被日军轻易攻陷，充分暴露出洋务派“求强”的骗局。

日寇侵入旅顺后，对无辜的中国居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造成尸体成堆，血流成河。据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学者记述，日本侵略者大屠杀后，仅留下三十六

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日寇血洗旅顺的暴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野蛮、兽性的大暴露。

日军侵占旅大以后，又派兵进犯海城、辽阳等城镇。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国辽河以东大片领土。

**北洋海军的覆灭** 旅大沦陷后，北洋海军尚有铁甲战舰、炮艇、鱼雷艇等二十余艘，并没有失去作战能力。可是，李鸿章把北洋海军当作他私人财产。严厉拒绝了丁汝昌要求出海抗敌的正确主张，强令所有的海军舰只都集中到山东威海卫军港，不准出航。

凶相毕露的日本侵略者，于1895年1月中旬，向北洋海军的最后据点威海卫大举进犯。威海卫与旅顺相对，是渤海的海门。威海要塞存亡关系到京津地区的安危。日本侵略者首先用军舰封锁了港口，然后派陆军自成山登陆，从背面包抄威海，把北洋舰队围困在港内。在中国海军腹背受敌，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丁汝昌命令各部将领，整队突围抗击敌军。当突围不成时，丁汝昌又指令炸毁炮台、舰只，以免落入敌手。这时，副提督英帝国主义分子马格禄、美帝国主义分子浩威，却煽动部分胆小怯懦的将领，发动骚乱，逼迫丁汝昌投降。在对敌斗争的严重时刻，丁汝昌保持了民族气节。最后，在一群胁迫投降的暴徒面前，服毒自杀，以身殉职。丁汝昌死后，那些人面兽心的帝国主义分子，写了投降书，替中国守军向日本投降了。到此，北洋海军全部覆灭。

### 三、《马关条约》

(91)

当日本侵略者把侵略战火燃到中国以后，别有用心的沙俄立即叫喊“为保卫我们在极东（极东即远东——编者）的利益起见，”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沙俄通过它的驻外公使，加紧勾结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逼迫清政府尽快对日投降，劝告日本尽快结束战争。

当时美帝国主义，力图单独操纵中日和谈，便拒绝了列强联合干涉的要求。但是日本侵略者对此却置若罔闻，一直到侵占旅大之后，才通过美国公使表示，清政府可以派代表赴日谈判。1894年12月中旬，清政府委派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去日本试探议和条件。因为美、日的反对，德璀琳的试探活动宣告失败。1895年1月底，清政府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代表，赴日乞和。野心日增的日本侵略者，想在攻陷威海卫一举消灭中国海军之后，再通过议和以便最大限度的勒索中国。于是，日本政府便借口张、邵两人所带全权证书不符手续，把他们驱逐回国。

日本侵略军接着侵占了威海卫，直接威胁天津、北京。这时日本侵略者大肆扬言，必须让李鸿章赴日谈判。在北京的美国公使田贝，也制造舆论说：李鸿章“对外国人很公道”。清政府终于屈从美、日帝国主义的壓力，决定派大卖国贼李鸿章率代表团去日本。并以美国前国

务卿科士达，为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同时，日本也组成了以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也请了一个美国人端迪臣为高级“谋士”。就这样，美日狼狈为奸，设下了共同宰割中国的陷阱。

1895年3月19日，由李鸿章率领的议和代表团，抵达日本马关。接着，由美国人从中牵线，中、日代表开始了所谓的议和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头目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庞大的勒索清单，逼李鸿章表示：“允不允，两言而决。”这时，端迪臣积极为日本草拟约文，策划宰割中国的罪恶阴谋；科士达便逼迫李鸿章迅速签字。在美、日侵略者的明逼暗压下，李章鸿彻底对日屈服，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中日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本强迫清政府承认朝鲜完全“自主”。朝鲜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割中国的领土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与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白银。

(四)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

(六)日本轮船在长江可从宜昌航行至重庆，还可以在吴松江、南运河航行船只。

此后，在1896年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里，日本又攫取到“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华特权。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侵华权益，同样被其他各帝国主义国家援引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特权，也一体“均沾”了。

《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又一具沉重枷锁，它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加严重的民族灾难。

中国大片领土被日本割占，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助长了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侵略气焰。

巨额的战争赔款，养肥了日本资产阶级，损害了中国人民。使已经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新的苦难。

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设厂，大量掠夺中国原料和劳动力，沉重地打击了民族工业，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中国不仅成了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而且又变为它们资本输出的场所。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角逐的激化，民族压迫和阶级苦难，更加沉重了。

#### 四、东北和台湾同胞的反侵略斗争

日本侵入中国以后，广大劳动人民发扬了反侵略的斗争传统。遭到日寇蹂躏最重的我国辽东人民，个个义

愤填胸，更加众志成城，与日寇展开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粉碎了日寇声言“取奉天（今沈阳）度岁（过年）”的梦想。海城、岫岩、辽阳等地人民群众，都自发的组织起抗日“民团”，“壮夫老弱，死战不降”。使日寇陷入到处挨打的狼狈境地。

宽甸、安东等鸭绿江一带的人民群众，和义州（今新义州）地区的朝鲜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战斗，不断挫败日军的进犯。1895年2月，抗日军民相继收复宽甸、长甸等城镇。患难与共的中朝人民，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马关条约》签订后，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举国上下一致怒斥李鸿章为卖国贼，“率天下人皆欲食其肉”。活跃在四川省的余楝臣农民起义军，当即发出《告示》，对日本侵略者“割台湾”索赔款等侵略罪行，表示了“呼天之痛！”对清政府统治者“叛国家”“畏洋人”等卖国行径，进行了愤怒的声讨。他们壮志满怀的举起报“国仇”的反侵略战旗。表达了全国广大人民反侵略反卖国的共同决心。

在国内舆论界，反映也十分强烈。上海的《申报》发表文章宣告，“我君（清政府当权者）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

当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广大台湾同胞奔走相告，人人痛心疾首。他们怀着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深情，

抱定“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决心，发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的钢铁誓言。许多台湾的爱国志士，纷纷上书清政府，要求增兵台湾支援抗战。大陆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要求东渡和台湾爱国同胞并肩战斗。卖国求荣的清政府无视人民的正义呼声，却命令台湾的大小官吏和所有的驻军，立即撤回大陆。甚至封锁台湾海峡，禁止大陆人民东渡。并派出李经芳（李鸿章之子）到台湾海面去办理割让手续。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威武不屈的台湾骨肉同胞，自发的组织起抗日义军，同未撤回大陆的刘永福率领的部分清军，协同设防。为保卫祖国的锦绣河山，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日本强盗，虽然从中国一小撮卖国贼手里，垂手获取了割台契约。但是，当他们从1895年5月底，一踏上我国台湾之后，就立即陷入台湾爱国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遭到台湾同胞的迎头痛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力“近卫师团”从基隆登陆后，沿着台湾西海岸向南进犯，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重大伤亡。在基隆、新竹、大甲溪、台中、彰化、嘉义、台南等地的每一个城堡，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谷，都变成了埋葬日寇的坟场。战斗在各地的抗日义军，气壮山河，“抵死不退。”由徐驥率领的抗日义军，转战在新竹、大甲溪、彰化一带，以无比的英雄气概，一再深入敌后，出敌不意重创敌军。在8



月底进行的彰化保卫战中，徐驥把义军主力埋伏在山里，他亲率小队高举大旗，诱敌深入，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杀伤。广东人沈仲安率领的抗日义军四千多人，与刘永福军一起，坚守彰北，顽强战斗，最后与敌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沈仲安等抗日志士壮烈牺牲，彰化失守。

日本侵略者，为侵占我国台湾，镇压台湾抗日军民，不断从本国调来大批增援部队。可是，反动透顶的清政府一再无耻地破坏台湾抗战。在敌我力量悬殊，又得不到接济的艰苦条件下，台湾同胞仍然宁死不屈，顽强奋战，直到最后弹尽粮绝。10月21日台南失守。台湾沦陷。

台湾爱国同胞，和冲破清政府的封锁来到台湾的大陆军民一起，发扬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坚持武装斗争，给穷凶恶极的日本侵略者以空前沉重地打击。台湾军民五个月的激烈抗战，使侵略军死伤或因病遣回的达三万二千多人。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也被击伤毙命。台湾同胞英勇抗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民是外国侵略者永远征服不了的。台湾同胞的反割台怒潮，是甲午战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卖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骨肉同胞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近代史上谱写了又一页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

此后，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我国台湾同胞时刻怀念祖国，从未间断过抗日斗争。1945年台湾重

新回到祖国怀抱。随后，又被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蒋匪盘踞。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对社会主义的祖国无限向往。他们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台湾同胞的崇高愿望，必定能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 五、瓜分狂潮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

**帝国主义争夺贷款、投资的争斗** 《马关条约》刚一签订，沙俄看到日本抢先夺去它垂涎已久的中国辽东半岛，便迫不及待地勾结德、法两国，向日本施加压力，逼迫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当时日本被甲午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不得不暂时向俄、德、法三国妥协。最后，日本又向清政府勒索了三千万两赎银，表示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三国干涉还辽”这一事件，揭开了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革命导师列宁在1900年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sup>①</sup>一针见血地指出，沙俄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急先锋。

阴险狡诈的沙俄，在纠合德、法“还辽”之后，就以清政府的“恩人”自居。趁清政府无力支付对日赔款的机会，勾结法国，于1895年7月，强行与清政府签订了一

---

<sup>①</sup>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个四亿法郎（合一万万两）的贷款合同。这笔贷款不仅利息高而且折扣大（借一万万两，沙俄只付九千四百万余两）。同时还附有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抵押的政治条件。

1896年3月，英帝国主义也纠集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笔一千六百万英镑（合一万万两）的贷款合同。也附有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以及英国继续控制中国海关事务的政治条件。就这样，在围绕对华贷款的问题上，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疯狂抢夺在华修筑铁路权的活动中，沙俄又抢在前面。1896年5月，沙俄政府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诱骗清政府派李鸿章前往祝贺。卖国贼李鸿章到俄京彼得堡后，沙俄用威胁和贿赂等无耻手段，逼迫李鸿章秘密地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通过这一《密约》，掠夺了横贯我国东北（从满洲里，经哈尔滨、牡丹江直到绥芬河，全长一千七百公里）的中东铁路修筑和管理权。1898年，沙俄又夺取了从哈尔滨，经长春、沈阳直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修筑权和在中东铁路沿线开矿、采伐森林等侵略特权。从此以后，沙俄就通过中东铁路，残酷掠夺我国东北的丰富资源，榨取我国人民血汗。

沙俄在掠夺中国东北铁路利权的同时，又支持比利时出头，同美、英争夺芦汉铁路（即京汉铁路）的修筑权。

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英、俄是两个主要对手。

英帝国主义，为独占我国长江流域地区，积极同沙俄展开激烈的竞争。1898年，除夺取了长江流域铁路利权之外，又抢到从北京起，经天津、山海关直到营口的铁路承筑权。还获取了与德国共同修建津镇铁路（自天津至镇江）的特权。从而造成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针锋相对的局面。

当时的美帝国主义，在争夺芦汉、津镇铁路承筑权失败后，于1898年，又掠夺了粤汉（自武汉至广州）铁路的投资权。

在这期间，法国抢占了自镇南关（今友谊关）至龙州；自昆明至中越边界的滇越铁路修筑权。德帝国主义抢夺了胶济（胶州湾至济南）铁路、津镇铁路北段（山东以北）的修筑、管理等侵略特权。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1898年，俄、英、比、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一共掠夺了一万九千多里长的铁路利权。中国的铁路修建和管理权落入帝国主义手里，它便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吸血管”；成了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工具。在这同时，中国的长江、西江、吴松江、海河等主要的内河航行权，也被各帝国主义列强夺去了。于是，帝国主义列强，便全面地控制了中国的交通命脉。

帝国主义加紧对华投资，还突出地表现在，大肆在中国开办厂矿。仅在1897年一年当中，英、美、德三国，

就在上海开办四家大型纺纱厂，吞并一家中国纱厂。在其它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开办的各种工厂企业，也得到迅速扩张。1896年，美国资本伸进河北宛平县的“通兴煤矿”。沙俄在夺取了沿中东路的开矿权之外，还抢到在我国新疆开采金矿特权。在这期间，英、德、法帝国主义，也都掠夺了在四川、山西、山东、贵州等地区的采矿权。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开办工厂、开采矿藏资源，这就使它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适应资本输出和控制中国财政的需要，它们的银行势力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显著的膨胀。从1895年到1901年除原有的几家外国银行外，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沙俄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都先后在中国开业了。随着帝国主义金融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也被帝国主义控制了。

**瓜分狂潮与“门户开放”政策** 帝国主义在疯狂地争夺对华贷款、投资权的过程中，到1897年以来，又进一步掀起了一个抢占港湾、划分“势力范围”（即独占区）的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7年11月，德帝国主义在沙俄支持下，以它的传教士被中国人民处决为借口，派军舰侵占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在1898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不仅侵占了中国的海军战略要地胶州湾，还把整个山东省划归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2月，在德国侵占胶州湾后，沙俄马上侵占了旅顺军港。1898年3月至5月，逼着清政府先后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侵占了旅顺大连湾。从而把它的侵略势力扩展到整个东北。实际上这时中国的东北三省完全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接着，法国也租占了广州湾，并强迫清政府默认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和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租占了九龙半岛、山东威海卫军港，同时还迫使清政府承认中国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独占区。日本也迫使清政府承认，福建省为它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为了宰割中国，它们之间既争夺又勾结。从1898年以来，英、法；英、德；英、俄之间，先后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各自在中国抢夺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山东省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为法国（一部分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省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我们伟大的祖国，又面临被各帝国主义分割、灭亡的严重关头。

正当俄、德、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疯狂宰割中国的时候，美国正陷入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斗争中，一时无力兼顾中国。1898年秋，美西战争结束后，其它各帝国主义国家已在中国抢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梦想建立太平洋帝国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分享”其它帝国主

义已经取得的侵华利益，于1899年9月，便向英、俄、日、德、法等国政府发出了一个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通牒。这个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主要内容是：

（一）、各国互相承认在中国抢占的“势力范围”和其它侵略权益。

（二）、在各自侵占的租借地、“势力范围”内，在征收货物运费和关税方面，各国一律同等待遇。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产物。它的险恶用心就是，在“机会均等”的幌子下，一方面，使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互相妥协，组成一个联合侵华的反动阵线；另一方面，美国企图依靠它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步压倒其它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最后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当时，各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的斗争正不可开交，便表示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作为暂时的缓冲。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进一步造成中国被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局面。

所以说，美国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成了各帝国主义联合控制中国的反动纲领。也是美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的宣言书。

总之，在甲午战后几年间，中国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争夺下，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救亡图存，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呼声。

## 第六章 戊戌变法

### 一、中国民族工业和资产阶级

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sup>①</sup>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使中国经济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后果：一方面，绞杀了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更快的变化。随着中国城乡手工业的迅速破产，使中国原来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更快解体。越来越多的城乡群众，对生产和生活用品的需要，都依赖市场上的供应。这就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商品市场。同样，由于广大手工业者、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日益失业破产，流浪街头，又为中国民族工业产生提供了劳动力市场。

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便有一部分买办商

---

<sup>①</sup>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七三页。



人和地主官僚先后办起一些近代工业，产生了中国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据不完全统计，到中日甲午战前，全国民族工业有九十多家。甲午战后的三、四年间，又新办了五十多家。其中比较有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有：1872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77年，杨德、孙振銓在安徽池州开办的煤矿；1889年，由台湾商人在基隆开办的发昌煤厂；1888年，凌佩卿在上海开设的鸿文书局等。这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城镇。基本上都是加工性的缫丝、纺纱、制面、火柴等轻工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条件下产生的。资本少，规模小，发展缓慢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特点。在这些早期民族工业当中，资本在十万两以下的占大多数，少的只有几千两。就其雇佣的工人数来说，多数厂矿在三、四百人左右，有些厂矿只有十几人或几十人。特别是，中国民族工业出现的时候，外国侵略者已经控制中国的海关和沿海、内河的航运业，洋货到中国又享有减税、免税等一系列侵略特权。相反，中国民族工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仍然遭受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因此，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排挤、打击和本国封建制度的束缚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仅得不到顺利发展，而且时刻有被外国资本吞并、挤垮的危险。从1872到1888年先后创办的三十七家民族

工业，就有十一家被迫关闭或被外国资本吞併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物。由于半殖民地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民族工业既有与外国侵略势力相矛盾的一面，也有对它们依赖的一面。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有能力创办近代工矿企业的，首先是那些与外国侵略势力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他们办的工厂不仅机器设备从外国买来，甚至生产原料也依靠进口。有的还吸收外国资本，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利用外国商标等。这就给外国资本吞併中国民族工业敞开了大门。至于与本国封建势力的联系更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人，在投资近代企业同时又购置土地，开设钱庄，保持封建剥削。有些政治势力小的买办、商人、地主以及清政府的一些不操实权的官僚，要向近代企业投资，又往往依附封建买办大官僚李鸿章等人。或者向这些大官僚控制的“官办”企业投资，或者请求“官督商办”（即私人集股办企业，清政府派官员监督管理）、“官商合办”（由清政府拨出部分资金和私股合办）。实际上，多数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都是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商办的途径，依附洋务派大官僚的庇护发展起来的。因此，与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又矛盾又相联系的双重性，便构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特征。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产生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控制中国最大企业的洋务派大官僚、大买办不同。“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sup>①</sup>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国内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它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但同时，因为他们没有切断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反抗是无力的、不彻底的，带有很大的妥协性。毛主席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sup>②</sup>

---

①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四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六〇二—六〇三页。

## 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封建经济的瓦解，和民族工业的产生，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反映在思想战线上，便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中日甲午战前，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这些人原来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后来，他们先后被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网罗去，成了洋务派举办新式企业的赞助者或经理人。从七十年代以来，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越发尖锐的形势下，他们当中有些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洋务派的反对派。他们提出了一些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张，在社会上逐渐传播开来，形成了新的社会思潮。这时期的改良主义思想，主要内容是：

在经济上，提出“振兴商务”，主张发展民间工商业。鼓吹中国自己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银行、设邮电、立学校。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海关、掠夺中国社会财富等侵略罪行，进行了抨击。呼吁从外国侵略者手里收回利权。同时，他们对清政府不能“护商”、反而“病商”，以及洋务派官僚

侵吞商股、垄断工商业等反动行径，也进行了揭露。大声疾呼地要求发展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政治上，初步提出了兴资产阶级民主，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主张。这些人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是仇视的。他们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主张建立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为那些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富商争得一些参政权利。

在思想方面，改良主义者为给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革新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大力宣扬“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改良主义思想家，用这种事物不断变化的新思想，来反对在当时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复古思想。其中比较激进的一些人，还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孔孟之道”提出怀疑，甚至加以抨击。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新的社会思潮，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向。

**康有为、严复等变法维新活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主张革新、进取的法家思想传统，并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民主主义观点，对儒家道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们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于1898年发动了一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即戊戌变法运动。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

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从小受过严格的“程朱理学”教育。后来又去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事物。中法战争后，他看到清政府日益腐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产生了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改造封建中国的进步思想。他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鼓吹改良变法的著作。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并绘制了一幅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蓝图。为资产阶级戊戌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当时公认的变法运动的领袖。

严复(1853—1921年)，福建候官(今闽候)人。少年时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67年被派往英国学海军，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回国后任天津水师学堂监督(校长)。甲午战后，他怀着爱国热情，大力鼓吹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时期，严复为了实行改良变法，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写了《原强》、《辟韩》等著作。并编译了西方早期资产阶级一些有名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外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谭嗣同(1865—1898年)、梁启超(1873—1929年)也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谭嗣同当时写的《仁学》，激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是改良派的激

进分子。梁启超也写了一些鼓吹改良变法的文章。

1895年春，在举国上下反对《马关条约》斗争日趋高涨的时候，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科举考试，当即联合十八个省的一千余名知识分子，写了一个呼吁变法图强的上皇帝书，即《公车上书》（“公车”在中国古代，凡到京城参加考试的分子，都坐公家的车。这里说的“公车”，是指到北京参加全国考试的分子）。康有为在《公车上书》里，怀着激昂的爱国热情，愤怒地谴责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沉痛地指出中国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公开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把宣传变法维新与实际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维新变法开始变成具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了。

《公车上书》虽然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那里。但是，在知识界却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此后，康有为又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图强。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光绪皇帝周围的大官僚进行接触。康有为为了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当年7月，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每天刊登一些鼓动变法的文章，向清政府官员传送。8月，康有为、梁启超又联络了一些地方官僚、士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召开会员大会，宣讲维新变法的道理。11月，康有为又到上海，发动东南沿海一带的官僚、资产阶级人士以及一些接受新思想

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建立了上海“强学会”，出版了上海《强学报》。通过康有为等人一系列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面对这种形势，封建顽固势力，十分恐惧，他们先后封闭了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加强了思想上的控制。

“强学会”虽然被反动派查封了。可是，变法维新已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再也阻挡不住了。

从1893年以来，严复在康有为的影响下，联络当地一些有革新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连续发表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于是，天津的思想界也顿时活跃起来了。

1898年1月，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创建了“南学会”，成立“时务学堂”，出版了《湘报》。当北京、上海“强学会”被查封后，“南学会”继续高举维新变法的旗帜，成为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团体。《湘报》发表了谭嗣同的一些攻击封建伦理道德的文章，在湖南产生了强烈地反响。在“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的推动下，湖南维新变法运动发展的十分迅速，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地区，对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在中国面临瓜分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组织了“保国会”。制订了《保国会章程》，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响亮口号。规定了在全国建立各级保国会的组织。实



际上，保国会成了一个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保国会联合并统一全国改良派力量，把维新变法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1896—1898年，不到三年时间，到处成立了鼓吹维新变法、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学会、学堂、报馆等机构三百零九所。它为维新变法运动，大造了社会舆论，并扩大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影响。

### 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 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引起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极端仇视。他们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对蓬勃发展的维新变法运动，实行疯狂地抵制和破坏。特别是以“后党”和洋务派大官僚为中心的清政府实权派，当他们看到用封禁学会、书报的办法，阻挡不住迅速发展的维新变法运动后，就通过奏折、书院讲坛，对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讨伐围攻，实行残酷打击。因此，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在思想战线上，便展开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激烈论战。这场思想论战，主要是围绕下面两个中心问题进行的：

**要不要变法维新** 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代表大地主和带买办性的封建统治势力，拼命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极端仇视一切新生事物，反对任何的社会

变革。他们死抱着儒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点不放，竭力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清王朝的贵族大官僚徐桐就声嘶力竭地叫喊：“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荣禄也一口咬定，“祖宗之法不能变”。

地主阶级御用文人，公开打起尊孔反法的思想破旗，大喊大叫：变法根本不能治理天下。他们说：“与其言变法，不如言变人”。在这些孔孟的徒子徒孙看来，当时已经腐败不堪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祖宗留下来的“成法”，决不许动一根毫毛。洋务派官僚也大肆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论，把封建制度和它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当作反动统治的“命根子”，认为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找来“进化论”作为思想武器。宣传：“变”是古往今来的“公理”。并依据这一发展变化的思想，猛烈批判了封建顽固派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观点。康有为针对顽固派官僚提出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反动说教，尖锐地指出：“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康有为从变法维新的斗争需要出发，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的理论，即从“据乱世”到“升平世”，最后进入“太平世”的“三世”说。他认为，这三个历史阶段，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指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升平世”，中国还处在“据乱世”。改良派认为，从

“据乱世”到“升平世”再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这种进化的历史观，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复古守旧的反动观点。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政治路线的彻底破产。改良派沉痛地指出，在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必须发愤“革旧图新”，中国才能走上富强的资本主义道路。改良派还指出，中国必须变地主阶级之法，维护资产阶级之新。要求改变半殖民地的落后地位，发展资本主义，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反映了时代前进的客观要求。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up>①</sup>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的“变”，只是渐变，反对革命的突变。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在理论思想上的具体体现。

**要不要改变封建专制制度** 资产阶级改良派，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改造成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君主立宪制。他们提倡“兴民权”，反对“尊君权”。资产阶级改良派指出“民为贵”是“古今之通义”；历代的封建君主，都是欺压人民的“大盗窃国者”。当然，他们说的“民”，实际还是指那些没有掌权的

---

<sup>①</sup>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六〇页。

新兴资产阶级。他们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力要求改变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资产阶级参政的权力。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按着资产阶级的面目改造中国，他们就不得不到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寻找思想武器。“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sup>①</sup>当时改良派在文化思想上，强烈要求开办新式学堂、报馆等近代文化教育机构，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即所谓的“新学”）；主张废除束缚人们思想的八股科举制度，反对复古倒退的儒家思想（即所谓的“旧学”）。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1895年在《国闻报》上发表的《原强》、《辟韩》两篇文章，就以鲜明的资产阶级观点，举起了反儒尊法的旗帜，公开批判了唐代尊孔派、封建卫道者韩愈鼓吹的“君权神授”等反动观点。指出，韩愈之流宣扬“君臣之伦”等颂古非今的说教，都是欺人之谈。同时他还肯定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进步作用。严复对封建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更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他认为，科举制度危害极大，它起着禁锢人们智慧、败坏人们的思想、助长因循守旧等恶劣作用。因此，必须坚决废除。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挣脱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儒

---

<sup>①</sup>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五八页。

家的“三纲五常”，也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谭嗣同为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大声疾呼，要冲决一切封建罗网。痛斥“三纲五常”，“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愤慨地指出，只有那些“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谭嗣同公开宣告，要与流毒两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宣战。他热切地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废除“三纲五常”这个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按着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组织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

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相反，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死抱着儒家思想经典不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废“科举”、倡“新学”，都是“离经叛道”。如果要把这些废除，那就要招致天下“大乱”，就要“亡国”。

在这场思想论战中，洋务派大官僚，更以维护儒家道统的卫道士自居，向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猖狂地反扑。1898年张之洞写了《劝学篇》，狂叫：三纲五常是“百行之原”，“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还咬牙切齿地煽动说，若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就要遭到天下“共弃之”。张之洞的这些反动叫嚣，既得到了封建顽固派头子那拉氏的赞赏；又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贺彩，把这篇反动文章译成英文，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事实戳穿了洋务派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就是主张在不触动封建根基和儒家思想的前提下，依靠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来维护他们的反

动统治。

洋务派极力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反动论调，说明孔孟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成为封建买办势力对内镇压革命人民，对外投降卖国的精神支柱。

**论战的实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顽固派和带买办性的洋务派，在思想战线上展开的这场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论战，实质上，是当时新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这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抨击了陈腐守旧的孔孟之道，传播了要求革新、前进的新思想。这在当时起到了开阔人们的眼界，激发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积极作用。但改良派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决定，他们虽然抨击了反动的儒家思想，却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祖师爷孔丘；他们要抛弃陈腐的思想观点，却又拿不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更害怕人民革命。因此，他们在这场思想斗争中，是无力的。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

了，……”①

#### 四、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变法纲领和“百日维新”** 1897年冬，德国出兵侵占了胶州湾，沙俄抢占了旅顺大连，帝国主义公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家存亡系于千钧一发。康有为这时又到北京，立即向清政府递交了第五次请求改良变法的上皇帝书。康有为这次“上书”里尖锐地指出，中国已处于强敌压境的严重时刻，“瓜分豆剖”就在目前。如不发奋图强，继续苟安旦夕，清朝皇帝和大臣，就是沦为百姓也不能安生了。当时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虽然对变法维新运动切齿痛恨，但面对甲午战后，全国人民反侵略反卖国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他们还不敢立即大下毒手，实行公开镇压。他们便采取阴谋抵制，准备伺机反扑的反动策略。

在同顽固势力作斗争中，改良派逐渐受到帝党的重视。光绪和帝党官僚，有意利用维新运动的势力，来加强他们的地位。因此，当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传到光绪皇帝那里后，光绪大为感动，立即要接见康有为面谈变法事宜。但在奕訢等后党官僚的再三阻挠下，光绪的夙望没有实现。光绪仍然指令他的汉文老师、军机大臣翁

---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七页。

同和，与康有为保持接触，并允许康有为可以通过“奏折”呈递光绪。从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取得了与帝党联系的合法渠道。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帝递上一个《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全面推行维新变法的纲领。主要内容是：

第一，要求光绪皇帝当机立断，宣布变法。

第二，在中央政府设立“上书所”，接受各方请求变法的上书，从中挑选人才，加以重用。

第三，在清宫设“制度局”，其下设财政、教育、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由“制度局”主持全国的变法事项。

在《统筹全局折》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明确的变法维新主张，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设立议院参加政权的强烈愿望。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诏定国是》上谕，宣布实行维新变法。随后，光绪皇帝先后接见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等改良派的首要人物，并责成康、梁主持变法新政。至此，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靠光绪皇帝进行的维新变法正式开始。

光绪皇帝发布变法上谕，改良派十分兴奋，他们废寝忘食地今天一个奏章，明天一个条陈，流水般地传到



紫禁城，再由光绪皇帝把它们变作诏令，颁发全国。其中的主要内容有：

(一)中央设立铁路、矿务、农工商局，各省设商务局，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倡商办实业，允许私人开办工厂，组织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裁撤闲散官吏，整顿全国的行政机构。

(二)裁撤一些不必要的衙门、官员，裁减一些不能打仗的军队，用新式操法训练军队。

(三)废除科举制度，以策论代替八股。取消书院，废止一些他们认为没有存在必要的祠庙庵寺，设立各种新式学堂和中小学堂。北京设京师大学堂、翻译局，允许自由办报纸和创立学会，奖励发明。

“诏定国是”上谕的发布，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改良派以为只要紧紧抱住一个皇帝，就可以把一切权力转到自己手里。他们根本不懂得，对于反动派的夺权斗争，从来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皇帝下诏变法，更加激怒了握有实权的顽固势力。有的军机大臣就公开扬言：皇帝要开制度局，就要废掉军机处，宁愿冒犯圣旨，也不同意开这个制度局。总督，巡抚中，除湖南巡抚外，其余都拒不执行皇帝变法诏令，结果改良派绞尽脑汁起草的皇帝上谕，落个形同废纸的下场。

**帝国主义破坏变法维新**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sup>①</sup>在当时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日益发展的维新变法运动十分恐惧，极力想通过各种阴谋活动，把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引入歧途，纳入对它们有利的轨道。甲午战后，沙皇俄国极力拉拢以那拉氏、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实权派，妄图乘机不断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在戊戌变法时期，沙俄继续支持“后党”来破坏变法运动。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加强与沙俄争夺在中国的地位，绞杀维新运动，便极力拉拢“帝党”官僚和改良派。早在维新变法运动高潮之前，披着传教士外衣的英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等人，就把自己装扮成关心与支持中国维新事业的样子，到处游说，企图乘机打入改良派内部来操纵维新运动。甲午战后，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李提摩太又假惺惺的加入“强学会”，并且别有用心的接触康有为和翁同和，策划罪恶阴谋。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向翁同和提出的所谓《新政策》建议，就是帝国主义企图操纵维新运动的大阴谋。按照这个《新政策》，中国的变

---

<sup>①</sup>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一页。

法维新事业，都必须按着英、美的指示办事，由英、美等国侵略者派人参加主持。实际上，这是一个把中国改造成英、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大骗局。1898年初，日本参谋部也派出神尾光臣、宇川宫太郎、梶川重太郎等特务来华，拚命拉拢康、梁等改良派人物。他们公开扬言，日本愿意“帮助”中国“变法”。当年9月，下野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头子伊藤博文，也潜入中国企图收买改良派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

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寻找支持力量，竟然把口蜜腹剑的帝国主义也当成“朋友”。幻想联合英、日等帝国主义实行变法。显然这只能是认敌为友，与虎谋皮。

**那拉氏发动“戊戌政变”** 正当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靠光绪皇帝，埋头设计变法蓝图的时候，以那拉氏为头子的顽固派正加紧策划反动阴谋，准备彻底绞杀维新变法运动。在光绪帝发布《诏定国是》上谕后的第五天，那拉氏强迫光绪帝把翁同和革职赶出朝廷，切断了改良派与光绪的联系。与此同时，那拉氏又强令光绪帝把“后党”官僚荣禄任命为警卫京、津要地的直隶总督。鉴于封建顽固势力咄咄逼人的进攻，改良派曾力图进行反击。7月9日，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把顽固派官僚文悌革职。9月4日，光绪又下令把阻挠变法的礼部顽固派官僚全部罢官。接着，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改

良派为四品卿衔，军机处章京，竭力挽救面临失败的危局。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一开始就执行了一条敌视人民和脱离群众的改良主义政治路线。所以，在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在紧要的关头，改良派还幻想求助于反动透顶的袁世凯。9月18日夜，谭嗣同到北京法华寺袁世凯寓所，密访袁世凯。当谭嗣同说出请袁世凯出兵杀掉荣禄，进京保护变法新政的打算之后，阴险狡诈的袁世凯，装模作样地表示：“杀荣禄乃一狗耳。”9月20日，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回到天津即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进京向那拉氏面告了改良派的机宜。9月21日，那拉氏气势汹汹地发动了反动的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搜捕改良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事先逃出北京，随后逃往国外。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林旭、杨锐、康广仁等六名改良派人士，被捕遇害。到此，历经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宣告彻底破产。

**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 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是由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挽救民族危机，开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以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地位。同时，他们还对流毒极深的封建主义思想基础——孔孟之道，进行了一次冲击，形成了一股思想解

放的潮流。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当时是具有爱国性和进步性的政治运动。

但是，改良主义政治路线与彻底的革命路线是对立的。戊戌变法运动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惧怕人民，脱离群众。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失败。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彻底破产。有力的说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历史经验证明，要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只有发动群众，拿起武器走革命的道路。

此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发生了日益明显的分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沿着武装起义的道路迅猛前进。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死抱着改良主义路线不放，坠落为反人民、反革命的保皇党。

## 第七章 义和团运动

###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严重民族危机和反洋教斗争** 1900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革命风暴——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矛盾空前严重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彼伏此起的反帝斗争浪潮的一个总汇合、总爆发。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经进一步从沿海深入中国内地。仅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外国侵略者就把中国社会推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更加穷凶极恶地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妄图瓜分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各自霸占中国一方，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和掠夺，使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侵略要求。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也“分享”日本在中国取得的特权，乘机大肆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1895年至1896年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纺纱厂就有：英国的怡和纱厂、老公

茂纱厂，德国的瑞记纱厂，美国的鸿源纱厂。在资本输出的同时，继续向中国抛售商品。这样，外国侵略者不仅直接残酷地压榨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是殖民强盗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一贯的反动伎俩。十九世纪末，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达三千三百多人，发展教徒八十余万。传教士的足迹遍及许多城市和偏僻的乡村，以领事裁判权为护符，干尽了罪恶勾当。他们蒐集情报，包揽词讼，霸占田产，践踏中国主权。甚至还打着传播“西方文明”的幌子，在各地开办学堂、医院，实行文化侵略。外国传教士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清政府为了维持日趋衰落的反动政权，对中国人民加紧进行搜刮。从1895年开始，捐税名目增加，数额提高，漕米、土药、茶叶、盐、烟、糖、酒等项加税，整顿田产、房屋税收，强迫商户“捐输”。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酷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满腔怒火。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人民高举反洋教斗争的大旗，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全国反洋教斗争多达三百余起。最早的反洋教斗争于1861年在贵州兴

起。这一斗争迅速扩展到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福建、台湾等省。广大群众发布檄文、印发传单、焚毁教堂，愤怒声讨外国侵略者。在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的怒潮中，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反洋教斗争。1870年6月，法国在天津的育婴堂虐杀婴儿三、四十人，同时接连不断发生拐骗幼孩事件。于是群情激愤，反洋教揭帖飞遍天津的街巷。数千名群众前往法国教堂、领事馆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蛮不讲理，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要他们镇压示威群众，接着又开枪伤人。法国侵略分子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无比义愤。当即打死了这一血案的主凶法国领事丰大业和法国领事馆重要官员西蒙。随后，居民鸣锣聚众，捣毁了法、英、美等国的领事馆，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打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官员二十余人。

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联合向中国抗议，各国军舰麇集天津和烟台，以武力恫吓中国。在侵略者面前，清政府屈膝投降，急忙“道歉”、“惩凶”、“赔款”。

中外反动派的屠刀，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天津群众集会悼念烈士，并把天津反洋教斗争的故事，编成唱本，刻成板画，在各地广泛流传。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1876年，四川省的邻水、涪州、江北厅人民奋起反抗



传教士，一举摧毁了天主教盘踞多年的侵略据点。1890年，四川大足县的反洋教斗争爆发为武装起义。1891年，长江中、下游一带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斗争，形成“长江暴动”。1891年，热河朝阳（今辽宁朝阳）人民在金丹道、在理教的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洋教的武装斗争。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把反洋教斗争推向了高峰。

**义和团的组织纪律和口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又名梅花拳），是白莲教中八卦教的一个支派。它是具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的反清、反封建组织。

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义和拳这种秘密结社，进一步成为团结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组织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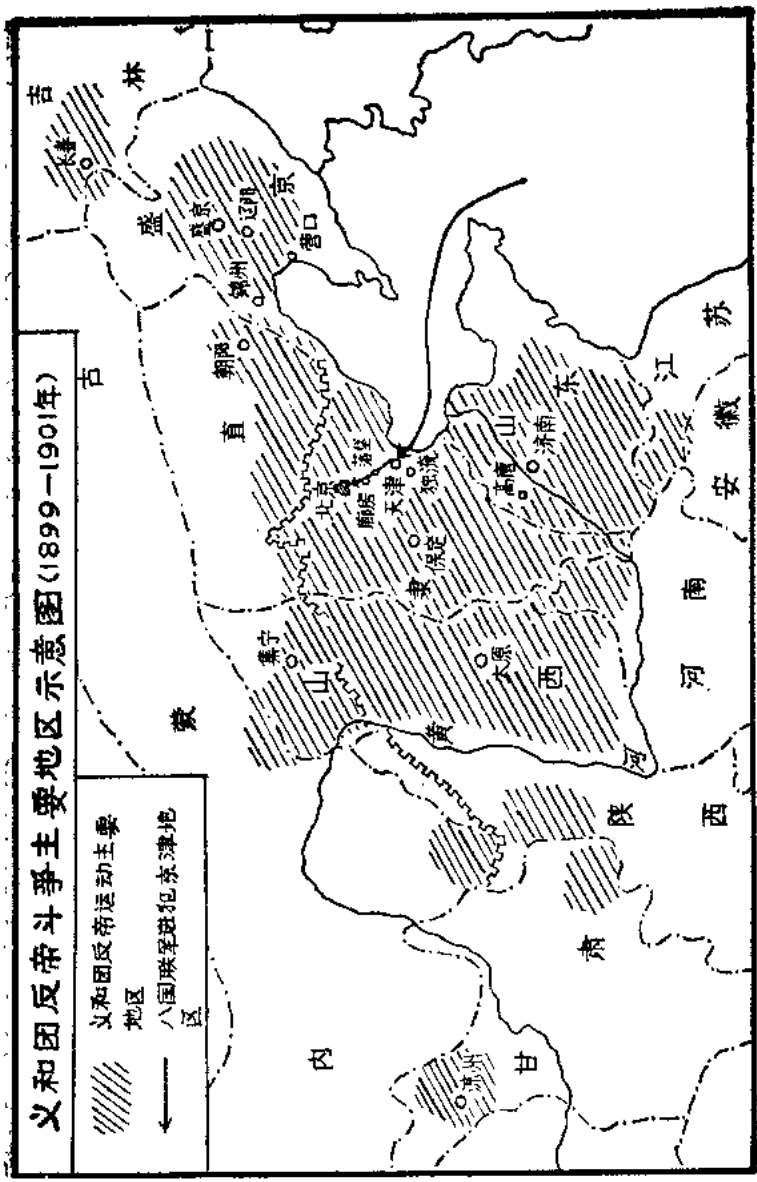
义和团的基本组织是“拳厂”（又名“坛口”）。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规定相互之间紧密团结；缴获胜利品一律归公；作战勇敢机智，服从命令。这种严格纪律，保证了义和团运动的胜利发展。

义和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城乡手工业者和水陆交通运输工人。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清军中的一些士兵也加入义和团的行列。妇女是义和团中的一支生力军，青少年妇女参加“红灯照”，中年妇女参加“蓝灯照”。其中以“红灯照”为最活跃，她们大则十七、八岁，小则十二、三岁，手提红灯，身着红色服装和红鞋，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平时练武习拳，战斗冲锋在前，是

妇女中的尖兵。“红灯照”的革命斗争实践，有力地粉碎了“男尊女卑”的儒家反动说教，再一次表现出妇女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

义和团运动有比较明确的革命宗旨，义和拳早期的战斗口号是“反清复明”，义和团时为“扶清灭洋”，后来改为“扫清灭洋”。这些口号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各个不同时期的矛盾情况，说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 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在山东地区特别尖锐。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对山东半岛进行疯狂地掠夺。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夺取了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特权，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强占威海卫，擅自勘界，圈占文登、荣城两县地方，在那里实行暴虐的殖民统治。外国教会势力在山东的恶性发展，更给山东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据统计，十九世纪末，山东一省就有教堂一千余所。传教士千尽了霸占土地房屋，包揽词讼，行凶杀人，收买流氓歹徒入教，欺压人民等坏事。清政府地方官吏采取了“扶教抑民”的反动方针，更加激起群众的反抗。



1899年，朱红灯领导的义和团高举“灭洋人，杀赃官”的革命战旗，在山东平原一带聚众起义，打响了义和团运动的第一枪。10月，平原知县蒋楷率领清军攻打义和团，义和团奋起迎战，他们每四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单位，采取“轮伏轮起，轮进轮退”的战术，打得清军七零八落，狼狈逃窜。

蒋楷被击败后，山东巡抚毓贤继续派兵镇压义和团，清军向义和团发起猛攻，义和团予以坚决反击。朱红灯为了保存实力，暂时避开强敌，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安全地转移到高唐、茌平一带根据地。到了茌平后，朱红灯同本明和尚（又名杨天顺）率领义和团队伍转战于禹城、恩县、高唐、长清、茌平、博县之间，他们焚烧了茌平洋楼、张庄等地教堂。在斗争中，朱红灯提出了“扶清灭洋”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当时义和团英雄们为历史条件限制，还不能从根本上识破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看不清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在清政府采取“安抚”政策时，便放松了警惕。山东巡抚毓贤采取诱骗方法，将义和团领袖朱红灯、本明和尚捕获，于1899年12月在济南把他们杀害。

革命人民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毓贤见义和拳势力强大，武力镇压无效，便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承认义和团为民间团练组织。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1899年12月5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照会清政府，要求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改派袁世凯。清政府顺从帝国主义意旨，把毓贤调往山西，任命大屠户袁世凯为山东巡抚。1899年底，袁世凯带领他的“新建陆军”到了山东，第二天就出了“告示”，严禁义和团活动。同时，制定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指挥各级官吏搜捕义和团民，并提倡告密，凡有练拳或赞助设立拳厂者，杀无赦。袁世凯还勾结在山东的德国侵略军与各地教堂反动武装，杀气腾腾地对义和团进行围剿。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疯狂屠杀，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杀了袁鼃蛋，我们好吃饭”，就是当时山东人民发出的反袁的愤怒吼声。还有人在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了一幅漫画：一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洋人屁股后面，以表示对卖国贼袁世凯的嘲弄和痛恨。

义和团在斗争中经常用散发揭帖和传播歌谣等形式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并用来团结群众鼓舞斗志。如：“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这些歌谣生动有力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深仇大恨和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强意志。

## 二、反帝怒潮席卷全国

**义和团挺进直隶** 山东义和团在中外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中，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义和团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扩大自己的队伍，除留一小部分在山东坚持斗争外，大部分义和团在1900年春挺进直隶（今河北省）。

直隶义和拳活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山东义和团到达直隶后，大大加强了直隶义和团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他们以冀中地区为中心，开展毁教堂、扒铁道、抗捐税、夺粮食的斗争，其势如暴风骤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山东和直隶义和团汇合后，分兵两路，东路沿大运河向天津猛进，西路顺芦汉铁路直趋北京。义和团高举反帝大旗，沿途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张贴告示，宣传革命道理，提出了“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的口号，号召“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直隶人民纷纷响应义和团的号召，革命队伍迅速壮大。1900年4月间，保定以南义和团已聚集万余人。4月底，在保定参加反洋教斗争的义和团达两万余人。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巨大革命力量。

在洪流滚滚的革命群众运动面前，帝国主义和封建

势力被吓得惊慌失措。帝国主义者不断发出战争叫嚣。1900年4月，英、美、俄、法四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令它两个月内把义和团“剿灭尽净”，否则他们就自动出兵。5月，清政府命直隶清军副将杨福同带兵去涞水镇压义和团。广大义和团群众奋起痛击清军，杨福同在途中陷入了义和团的埋伏圈。义和团战士把清军团团围住，用大刀长矛杀入敌阵，这支骑兵被杀个人仰马翻，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杨福同被义和团砍了脑袋，官兵被打死七十多人，其余纷纷逃命，四处溃散。

涞水大捷后，义和团联合当地居民破坏芦保铁路，捣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地车站。沿路的卖国官吏和帝国主义分子也被赶跑。义和团还袭击了京津铁路的要道丰台车站，连那拉氏、光绪皇帝“御用”的“龙车”，也被付之一炬。

**义和团威镇京津** 义和团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  
向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心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总枢纽——  
天津发展。北京和天津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

北京城里，早就有义和团活动的踪迹。义和团大队人马进入北京城后，和原有义和团汇合一起，声威大振。他们除了通过揭帖、歌谣展开宣传攻势外，还经常进行武装示威。帝国主义分子十分恐惧，他们龟缩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甚至有的装做死人藏在棺材里雇人抬着出城，但也被义和团查获。义和团把前门大栅栏

老德记西药房烧掉，表示严禁“洋货”的决心，许多商店都把“洋”字招牌换掉，“洋药店”改为“土药店”，“洋货店”改为“广货店”。义和团还动员居民不买“洋货”。并把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切洋街”，将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北京城内人民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

义和团的革命行动，深受北京地区广大人民的拥护，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纷纷加入义和团队伍。当时北京城里到处都在练拳，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附近，每天都有青少年在那里操练。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匠铺，炉火熊熊，工人们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刀矛，积极支援义和团的革命斗争。

当时，北京城已处于义和团的控制之下。义和团派人监视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小衙门和王公贵族的住宅，甚至皇宫的大门也由义和团把守监视。义和团还宣称要杀掉“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大卖国贼李鸿章和奕劻，“三百羊”指各衙门的卖国官吏）。在义和团的打击下，清朝政府及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

义和团在天津也异常活跃。他们一进入天津，饱受帝国主义迫害的农民、运输工人、工匠等广大群众以及青少年便纷纷汇集到义和团的旗帜下。顿时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怒潮。他们通过歌谣、揭帖展开了广泛的反



帝宣传活动。在揭帖中说：“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为了表达义和团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的决心，歌谣中还表示：“反正是个死，不能这样完！先抢粮，后造反；杀洋人，砍贪官。打开官家米粮囤，逮着官、洋个个砍。”

6月初，天津城内第一个总坛口在三义庙成立，不到三、四天就建立坛口三、四十处（每坛四、五十人到二、三百人不等）。到了6月底，坛口已有二、三百个，人数增到五万左右。广大女青少年在义和团的旗帜下，也组织了“红灯照”。红灯照首领为船民林黑儿（又名“黄莲圣母”）。她们的战斗口号是：“红灯照，红灯照，杀了毛子（指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灭大清”。人民群众歌颂红灯照说：“别看女兵女将，专杀东洋西洋。杀得东洋满天飞，杀得西洋投了降。有的吓得直磕头，有的吓得叫亲娘。”天津义和团的主要首领还有船夫张德成、贫苦农民刘呈祥、王德成和曹福田等。义和团唤起了人们反帝爱国的革命激情，并给广大群众作出了榜样。于是，海河两岸，战旗招展，一场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烈火在天津迅速燃烧起来。6月15日晚，义和团又一次烧毁了三十年前被天津人民烧过的“望海楼”教堂（天津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又重新修建的大教堂）。18日，沙俄侵略军二千名从大沽调到火车站炮轰义和团。义和团狠狠惩罚了沙俄强盗，打得沙俄鬼子兵一个个弃甲丢盔，乱成一团。打死

打伤敌人五百多名。革命群众热情歌颂道：“大刀一耍，地裂山塌。大刀一耍，洋头搬家。”从此沙俄侵略军看到银光闪闪的大刀都心惊肉跳，忐忑不安。

义和团英雄们，在北京和天津昂首挺胸，奋勇向前，京、津地区变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sup>①</sup>

**东北等地的反帝斗争** 在山东、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从1900年2月开始，营口、锦州、朝阳等地人民也纷纷练拳，决心“杀逐洋人”。6月以后，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盛京（今沈阳）急剧发展起来。全城到处贴满反帝揭帖，号召人民行动起来，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领土”。随后，义和团运动又从辽宁扩展到吉林、黑龙江，反帝烽火很快燃遍整个东北。1900年6月以后，东北义和团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激烈战斗。6月29日，义和团开始拆毁辽阳附近铁路桥梁，阻止旅大俄军北犯。30日，义和团在盛京城内发动大规模斗争。到7月底，辽宁境内铁路，北起开原，南到海城，长达五百余里，除鞍山站外所有沙俄铁路桥梁都被

---

<sup>①</sup>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八页。

革命群众拆毁。辽宁省内的大部分外国教堂，也被捣毁。

在吉林和黑龙江，义和团对侵略者也发起了猛攻。1900年6月末，吉林省城人民开始秘密练拳，吓得侵略分子纷纷逃跑。长春义和团焚毁了城内天主教堂、耶稣教堂、英人医院和沙俄的二道沟车站。沙俄在富拉尔基雇用的中国筑路工人，将帝俄的房屋、商店、桥梁纷纷捣毁，侵略者狼狈逃跑。

东北义和团在很短时间内，几乎全部烧掉了帝国主义的教堂，拆毁了帝国主义修筑的铁路、桥梁、车站和公司楼房，破坏了帝国主义开采的矿山。革命烈火把外国侵略者烧得焦头烂额，十分狼狈。传教士、铁路员司、“护路队”，纷纷逃到旅顺、大连、哈尔滨等地躲避，现出了沙俄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原形。

山西也是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区。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早就伸向这里。臭名昭著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到山西搜集情报，以办教育为掩护，从事文化侵略。十九世纪末，英、德、俄先后攫取在山西筑路和开矿的权利。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山西人民的反抗。

1900年6月，山西义和团开始活动，省城太原是当时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城内到处贴满义和团的揭帖，群众结队练拳，革命斗争日益高涨，在巡抚衙门前面也设立了“拳厂”。

帝国主义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怀有刻骨仇恨。6月27

日，义和团群众在太原城内游行时，教堂竟开枪射击，打伤群众。愤怒的革命群众立即把教堂烧毁，给侵略分子以迎头痛击。太原义和团队伍在反帝斗争中不断扩大，揭帖更广泛的流传开来。到1900年7月，山西全省几乎都有义和团活动。

义和团的反帝烈火，也燃遍了内蒙古整个草原。

内蒙古是祖国的一个边远地区，经济和文化较内地落后，交通也不发达，但是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也不放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建立了蒙古教区的总教堂，以后又在内蒙古地区东部、中部、西部扩充为三个教区。从城市到农村都有传教士的侵略活动。

内蒙古的反帝斗争，主要在西部地区展开。东起集宁、丰镇，西到托克托，都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内蒙人民曾把一个作恶多端的传教士捉住公审，在背上插一面小旗，写上“老洋魔”三字，推出游街示众，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内蒙古义和团吸收了蒙、汉、回、满等各族人民参加斗争，他们同心协力，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表现了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反帝的革命精神。

在山东、直隶掀起反帝高潮的时候，革命的洪流，也很快涌入邻省河南。1898—1899年间，大量的反帝揭帖由山东传入河南。1899—1900年间，河南省的大部分

地区都曾发生过规模不等的反帝斗争。在1900年的一年之内，河南省内教堂被捣毁四分之三，黄河以南的教堂绝大部分被毁掉。传教士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动气焰，一落千丈。

除了上述省、区之外，义和团的革命风暴几乎席卷全国所有地区。1900年8月间，浙江白旗党、斋教发动起义，攻破江山、常山、开化县城；衢州、召州、绍兴教堂被毁。江西全省捣毁法、英、美、德等国教堂三十九处。云南拆毁昆明教堂，箇旧矿工聚众七、八万人，准备抵抗法国侵略。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安徽、福建、广东都发生了烧教堂、逐教士的斗争。江苏、广西、甘肃也曾出现义和团的揭帖。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北起黑龙江，南至珠江平原，东自江浙沿海，西到陕甘高原，到处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各地革命斗争互相呼应，相互支援，汇合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猛烈冲击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 三、八国联军武装进攻与京津保卫战

**廊坊、落垡阻击战**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它们在中国的侵略特权和殖民统治地位，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地反扑。1900年5月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5月

下旬，帝国主义各国舰队麇集大沽。各国领事与侵略军头目，紧急决定，从大沽和天津拼凑二千一百名“联军”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于6月10日，坐着清朝直隶总督裕禄替他们准备好的专车，杀气腾腾地向北京进犯，妄图利用优势装备，一举消灭北京的义和团。

义和团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拆毁铁路，破坏桥梁，不分昼夜地堵截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进犯。6月11日，西摩尔侵略军正在落堡车站修复铁路，义和团英雄们突然冲杀过来，打得侵略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

6月13日，侵略军除留下一部分守护落堡外，其余都窜犯到廊坊车站，随后，义和团先后在廊坊、落堡痛击侵略军，使侵略军遭到重大伤亡。

义和团在落堡、廊坊狙击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迫使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灰溜溜地退回天津。当时群众在一首歌谣中称赞义和团的英雄气概说：“义和团，猛如虎。看见洋鬼子，就像猫见鼠。叫他脑袋搬了家，一刀一个如宰猪。”义和团的顽强斗争使帝国主义侵略者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惩罚。甚至当时德皇威廉二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仗，在亚洲人面前丢尽了脸”。

**天津保卫战** 6月中旬，各国军舰三十余艘麇集大沽口外，侵略军由俄军司令官带头向清军发出通牒，要求让出大沽炮台，被中国守军拒绝。17日凌晨，八国联军在俄军司令官指挥下悍然向大沽炮台发动猛烈进攻，

义和团和守军进行了坚决抵抗。打伤敌舰六艘，打死侵略军二百多人。但因寡不敌众，又没有援军，炮台失陷。

面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义和团愈战愈强的严重局势，清政府最高决策者那拉氏认为义和团已经控制了北京城，其势力甚至达到宫廷之内。这时如若对帝国主义公开表示妥协，它的反动政权必然立刻被革命人民推翻。在那拉氏的天秤上，义和团的压力要比侵略军重得多。于是她便采取借刀杀人的阴险手段，立刻向八国联军“宣战”，把义和团推向斗争的第一线。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对外“宣战”。在“宣战”上谕里那拉氏虽然表示要和外国侵略者“一决雌雄”，实际上，却是一场大骗局。就在清政府“宣战”的第八天，即6月29日，那拉氏便向各国公使表白自己的“宣战”“苦衷”说：如果对义和团立即镇压，会“激成大祸”，所以不得不暂时“支持”一下义和团和各国开战，希望“各国所深谅”。这完全暴露了那拉氏“宣战”是假，假手帝国主义消灭义和团是真的反动伎俩。

1900年6月23日，各国侵略军八千人由大沽到达天津租界，立即遭到义和团的有力阻击。在争夺老龙头车站时，义和团同帝国主义八国联军展开了一场鏖战。老龙头车站是京津线的交通枢纽，又紧临租界，处于战略要地，侵略军派有重兵死守。义和团手持刀矛，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猛打猛冲，终于击退侵略军，胜利地收复了车站。天津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连夜送“得胜饼”、

绿豆汤，慰劳义和团勇士。还在饼上写着“义和神团，大得全胜”的字样，热烈祝贺义和团大捷。

义和团在天津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紫竹林租界。帝国主义在天津租界驻有重兵，在通衢要道埋下地雷，坚固的建筑物里设有密集的火力网，妄图负隅顽抗。义和团为了集中打击租界的敌人，曹福田、张德成等义和团的首领，也率队回到天津，密切配合当地义和团，大大地鼓舞了义和团的战斗士气。从6月8日开始，义和团英雄们，向盘踞在租界的侵略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杀伤大量敌人。义和团用牛冲入敌阵，破坏侵略军布下的地雷。随后猛打猛攻，摧毁了俄国领事馆、太古洋行等建筑物，炮击了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和德军司令部。打死打伤侵略军九十余人，英国“戒严司令官”被打成重伤，一个德国将军也丧了命。

在保卫天津斗争中，“红灯照”勇敢冲杀，视死如归，充分说明了中国妇女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硬骨头，为反帝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义和团和侵略军激战的日子里，在天津的清军聶士成、马玉昆、宋庆等部，也和八国联军交过战。但他们却在那拉氏的指挥下，仇视义和团，屠杀革命群众，很多义和团的英雄们牺牲在他们的屠刀之下。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力量大为削弱，被迫撤离天津。7月14日天津失陷。随后，侵略军到处杀人放火，奸



淫掳掠。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并在7月30日，成立帝国主义军事殖民统治政权，即天津都统衙门。从此天津人民过着更加痛苦的地狱生活。

**义和团在北京的英勇战斗** 在天津保卫战开始前后，北京义和团也向外国侵略军发动了猛烈攻势，天津陷落后，义和团同侵略军在北京展开了关系全局的大决战。义和团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东交民巷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外国使馆是当时帝国主义策划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帝国主义强盗屡次向义和团挑衅，随意开枪，杀死群众。从1900年6月19日开始，侵略者封锁东交民巷和长安街一带，不许居民来往，在告示上竟威胁说：“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侵略军的武装挑衅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和清军士兵的无比义愤。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这是中国人民对殖民强盗的严厉惩罚。从6月15日起，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从6月20日起，义和团开始进攻外国使馆。战斗异常激烈。西什库教堂是天主教在直隶北部的总堂，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宗教侵略活动的指挥部。6月15日，万余群众包围教堂，发起了凌厉的攻势。由义和团担任主攻，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群众积极支持义和团的革命行动，供应教堂的粮店拒绝卖给它们粮食。部分清军士兵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行动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战斗。

义和团发扬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并采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打击敌人。他们制造一种“土火箭”射入教堂，“力大穿屋”，而且尾部带有火种，可以引起炽烈燃烧；又用陶罐装满火药，点好火绳掷入堂内，落地就爆破燃烧起来。最使侵略军伤透脑筋的是义和团的地道、地雷战术。弄得帝国主义分子胆战心惊，经常疑惑地下有挖地道的声音。由于义和团的英勇战斗，据守教堂的侵略军死伤甚重，连法军头目恩利也被击丧命。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长达两个月之久，里边粮食吃光，侵略军无可奈何，只好杀骡、杀马吃，用树皮野草充饥。帝国主义强盗在义和团沉重打击下，大有朝不保夕之势。

义和团攻击使馆的战斗是从6月20日开始的。当时据守使馆的侵略军四百余人，他们在东交民巷一带分区防守。另外，美国公使又命令别处教徒进入东交民巷，共约两千余人，编为“教民队”，协助侵略军作战和挖战壕。义和团采用火攻的战术，向使馆抛掷火炬，把比、奥、荷、意四国使馆完全焚烧，侵略军的防线多次被突破。义和团英雄们与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强盗展开英勇壮烈的搏斗，仅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就胜利打破侵略军的第一道防线，攻下四座使馆。到7月20日止，五十六名法军死伤四十二人，五十四名德军死伤三十人，

六十名日军死伤四十五人。其他国家侵略军也有很大伤亡。连遭惨败的侵略军，有的恐惧发疯，有的绝望自杀。使侵略者发出了“前途之事如何，无人能予推之”的哀鸣。正当义和团攻打使馆，与侵略军鏖战之际，清政府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上派清军“围攻”使馆，实际上是保护使馆。那拉氏还派荣禄前往使馆慰问，进行安抚，并竖起“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在使馆被围将近两个月中，那拉氏不断派人往使馆送大米、白面、蔬菜、西瓜、酒等。奴才的丑恶表演，说明义和团的铁拳打在帝国主义身上，却疼在封建统治者的心上。那拉氏虽然称义和团为“团民”，发给义和团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但又别有用心的派刚毅等人充当义和团的首领，还制定了束缚义和团手脚的所谓“团规”。“团规”规定：义和团要服从总团领导，俘虏敌人和缴获的武器要交给官府；团众和清军要联成一家；清军欺压团众，必须报告清军首领办理，义和团不能自行反抗等等。如果违反这些“团规”，就是假团，格杀勿论。许多义和团战士被指为“假团”，惨遭反动派杀害。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假支持，真出卖；对帝国主义的假宣战，真投降的无耻嘴脸，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8月初，敌军约四万人，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沿途遭到义和团的顽强阻击。北仓一战，歼灭俄、日、英等侵略军一千余人。侵略军步步进逼北京，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英勇地进行抵抗。他们

在北京东直门与朝阳门和俄、日等侵略军进行了连续一昼夜的激烈战斗。终因力量悬殊，侵略军攻入城内，8月14日，北京沦陷。那拉氏、光绪皇帝带领一批皇族亲贵，狼狈逃往西安。从此，清政府完全撕下了对外“宣战”的假面具，正式和八国联军进行投降谈判。

八国联军是一群帝国主义武装匪徒。进入北京后，到处烧杀抢掳，公开准许抢劫三天，实际上直到这伙强盗从北京滚走，抢掠从未间断。从公使、将军到传教士、士兵都参加了这一无耻行径。日军将户部所有的白银，全部抢走，数量在百万镑以上。法国侵略军头子福尔利将抢到的珍贵品装成四十箱运回欧洲。英国把抢到的东西集中到使馆拍卖，然后按官职高低坐地分赃。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也被抢劫一空，英法联军劫后仅存的《永乐大典》也被抢走。

侵略军在北京更是杀人如麻，疯狂到了极点。凡被侵略军指为义和团的，立即遭到残酷杀害。甚至把居民逼进死胡同，用机枪集体屠杀。

侵略军总头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帝国主义强盗的招供，有力地揭穿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本质。

**分裂中国的“东南互保”**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的迅猛发展，引起东南地区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官僚

的极大震动和惊恐。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稳定”长江流域的局势，确保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积极勾结东南沿海地区的买办官僚和军阀，演出了一幕镇压义和团、分裂中国的丑剧，历史上称为“东南互保”。

英国是这幕丑剧的主要角色。1900年6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伦致电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政府立刻与湖广、两江总督勾结起来，“帮助”他们在其辖区内“尽力维持秩序”。英国外交部立即表示赞同，令其代总领事通知上述两地总督：“假若他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他将要受到帝国海军的协助”。主子的“建议”，立即得到奴才的“响应”。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都表示：“皆极愿与英联络”，并立即出告示，命令各州县如果有群众反抗，要坚决镇压，对所有洋商、教士，要妥善保护。

在英国的策动下，大买办官僚盛宣怀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上海各国领事，共同炮制了《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另外，还签订了《保护上海城廂内外章程》，规定“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紧急之事，互相知照妥办。”经过一番密谋之后，中外反动派初步完成了他们互保的勾结活动。

更加阴险的是帝国主义妄图在东南地区成立另外一个中国政府，制造中国的分裂。当时的江海关税务司

安格联曾经供认：“英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内部重建一个中华帝国，以南京为核心。只有英国能办到这件事。”金陵关税务司韩森也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位总督和福建巡抚许应騫，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上海去，同各国领事商量保持华中华南中立的办法。”这一系列事实说明，所谓“东南互保”，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勾结地方买办、军阀镇压义和团运动，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东南互保”的活动范围，最初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五省，后来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也参加进来。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虽未加入，实际上也赞成这个反动的“互保”。参加“互保”的省份，几乎占了半个中国。

“东南互保”和清政府的对外“宣战”，表面上互相抵触，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因此，当清政府接到东南督抚关于“东南互保”的报告时，立即表示赞同，认为他们的意见和清政府的政策“正复相同”。

#### 四、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北 人民的抗俄斗争

沙俄侵略军的血腥暴行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消息刚传到俄国时，沙俄政府认为独占我国东北的机会已经来到。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立刻高兴的忘乎所以，对

财政大臣威特表示：“这给了我们一个取得满洲的借口”。“我们将使满洲成为第二个布哈拉(布哈拉为中亚汗国，十九世纪后半期被沙俄吞併)”。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除派大批军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外，还驱使俄军占领我国东北地区。

沙俄一手制造的“海兰泡惨案”和“血洗江东六十四屯”，就是老沙皇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根据 1858 年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条约》，江东六十四屯属于中国管辖。条约中规定：该处“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这里很早就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汉族人居多，也有满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历史上因有过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因此人们习惯的称它为“江东六十四屯”。这六十四个村屯的名称，在中国的文献中都有记载。这些村屯一直在清政府管辖之下，在这里设官镇守，征兵收税。

1900 年 7 月 15 日，沙俄调动大批军队，突然袭击海兰泡，对这里的中国居民进行疯狂屠杀。侵略军对中国居民，用刺刀扎，用斧子砍，甚至开枪打死。更为残暴的是，把几个中国人的辫子拴在一起，然后把他们强行推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造成“骸骨漂溢，蔽满江洋”的凄惨景象。

接着，于 7 月 18 日，沙俄又出动大批军队屠杀和

驱逐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造成中国居民倾家荡产，背井离乡，渡江逃难。由于船少人多，侵略军又尾追堵截，致使很多中国居民被淹死。没有来得及过江的人，惨遭俄军杀害。逃到江西岸的人，也没有幸免。不仅中国人民惨遭沙俄侵略军的屠杀，而中国劳动人民在江东六十四屯长期辛勤劳动开垦出来的肥沃土地，也被沙俄强行霸占了。

8月4日，沙俄侵略军攻陷瑗瑛城，把这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古城化为灰烬，城中到处是一片瓦砾。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沙俄这一灭绝人性的血腥暴行进行了强烈谴责，指出：“它们就象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sup>①</sup>

沙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之后，又得寸进尺，驱使十余万匪军，分数路大举向我国东北猖狂进犯。先后攻陷瑗瑛、哈尔滨、长春、营口、奉天(今沈阳)等地，1900年10月初，东北全境被沙俄军事占领。

11月8日，沙俄侵略军逼迫盛京将军签订了《奉天

---

<sup>①</sup>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



交地暂且章程》，强令解散中国军队，将武器、弹药交给俄军，拆除一切军事设施，规定沙俄在奉天设置总管，控制东北的行政大权。沙俄侵占东北的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这一不平等条约传出后，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清政府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派代表与沙俄谈判，要求废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1902年沙俄被迫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但仍不按期撤兵，企图赖在东北不走。

**抗俄烽火燃遍东北** 沙俄对东北的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曾经供认：“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曾遇不少困难。……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其中，忠义军是东北人民反抗沙俄的一支主要力量。它由破产农民、猎户、筑路工人、矿工、伐木工人等组成。最盛时期达到二十万人，号称四十营。他们响亮地提出“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多次粉碎俄军的“围剿”。他们主要活动在吉林省的东南部和辽宁省的东部。从1900年开始，坚持抗俄斗争长达三年之久。他们采用比较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白天埋伏起来，夜间袭击俄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地处祖国北部边疆的黑龙江省，也燃起了熊熊的抗

俄烽火。在宁安、呼兰、依兰、巴彦、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都先后发生过抗俄斗争。1900年沙俄驻哈尔滨骑队赴呼兰抢劫，呼兰人民奋起烧毁外国教堂，给俄军当头一击。同年7月，宁安人民曾与俄军战斗半个月之久。巴彦人民曾组织起来，痛击了从哈尔滨逃往伯力的沙俄“敖德萨”号轮船，使俄军伤亡惨重。沙俄“齐必斯”号拖轮经过三姓时，英勇的革命群众狠狠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侵略军头子文尼阔夫当即被击毙。

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人民的猛烈冲击下，纷纷逃窜。中东路总监工茹格维志无可奈何地下令暂停筑路，将建筑材料装上火车运走，铁路员司和“护路队”纷纷集中于哈尔滨。他们的家属都乘船逃往伯力。外强中乾的沙俄殖民主义者处处挨打，被东北人民抗俄烽火烧得焦头烂额，完全暴露出它的虚弱本质。

## 五、《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各有自己打算。英国要垄断长江流域和沙俄要独占东北的阴谋，都遭到列强反对。德国自从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头目后，计划攻占烟台，进一步控制山东。德国提出要议和必须首先惩办那拉氏，企图威胁清政府，取得更多好处。法国是沙俄盟国，支持沙俄主张。日本乘机派遣较多军队来华，力争在联军中占有重要地位。

日本是后起的强国，有独吞中国的野心。正在各帝国主义争吵不休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出来承担了调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角色。早在1900年7月间，正当义和团运动处于高潮时，美国就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通牒，虚伪地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其目的是防止别国占领中国更多的地盘，并借此笼络清朝统治者为日后美国全面独占中国创造条件。在帝国主义矛盾重重，谁也无法独占中国的情况下，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为各国所接受。列强决定继续维持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的统治，从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是把中国置于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之下。

帝国主义之间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抛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俄、美、德、日、法、意、奥、西、比、荷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除正约以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其主要内容是：

(一)勒索巨额赔款。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加上三十九年分年摊还的利息，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这是中国对外最大的也是最惊人的一次赔款。因为是在旧历庚子年订约的，历史上又名“庚子赔款”。

(二)拆除军事工事，帝国主义取得在中国一些重要地区驻军特权。“条约”规定，把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

大沽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允许帝国主义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十二个战略要地驻扎重兵。在北京设立特殊的“使馆区”，侵略者可以“常留兵队，分保使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三)控制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各省督抚以下地方官吏，如辖区内发生“排外”行动不立即镇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条约”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所谓“外务部”，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卖国部”！

此外，侵略者还强迫清政府“惩凶”以及向帝国主义国家“赔礼道歉”。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空前沉重的枷锁，也是清政府投靠帝国主义的一张卖身契。条约签订后，那拉氏表示：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把中国所有的财富搜刮净尽，达到外国侵略者满意。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清政府忠顺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外反动势力彻底结成“神圣同盟”，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 六、义和团的反帝精神永放光芒

**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之

后，义和团虽然遭受了惨重的牺牲，但仍继续坚持斗争。

天津失陷后，曹福田退到他初期曾经活动过的静海一带，筹备粮饷，立誓“非夺天津城不可”。“天下第一团”的首领张德成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左手负伤，退出天津后南返独流，沿途收集义和团散众，整顿队伍，欲图再举。在天津西南一带，由刘呈祥（即刘十九）率领的一支乾字团，总人数达二万人左右。他们始终志在“灭洋”，立誓要收复天津。

北京沦陷后，义和团改装易服，白天隐藏起来，夜间出动袭击敌人。使帝国主义胆颤心惊，惊恐万分。一个侵略分子哀叹：“平安之处，仅此大街，若小巷中，殊不可测也”，“安睡之乐，可想而不可得”。北京城内居民自发地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侵略者在城内经常遭到群众的突然袭击。在京郊各地，义和团斗争的规模很大，有的多达万人。1900年11月，德、意侵略军由北京向张家口进犯，中途受到义和团阻击，德军头目约克在怀来县境也被义和团打死。

全国各地反帝斗争仍然不断发展，义和团经常捣毁北京到山海关之间铁路，切断交通干线。东北义和团，继续反抗沙俄侵略。东南沿海各省经常出现义和团揭帖。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山西、陕西等省，都发生过焚毁教堂的暴动。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彻底合流，更

加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1902年3月，直隶南部的广宗、巨鹿、威县等地的义和团，在景廷宾领导下，高举“扫清灭洋”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他们捣毁教堂，杀死传教士。这支起义队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山东、河南一带的许多义和团也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发展到三、四万人。这次起义尽管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说明中国人民从义和团失败的历史教训中，识破了清政府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可耻嘴脸。在斗争中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义和团的丰功伟绩**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伟大革命。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曾经叫嚣：只要一万名现代化的侵略军，就能够横行全中国。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在中国人民铁拳教训下，却不得不承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义和团英雄们的斗争，使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sup>①</sup>

---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五页。

义和团运动，也有力地打击了中国封建势力，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十年后它就土崩瓦解了。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伟大的义和团运动，曾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有力支援。当外国侵略者发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的疯狂叫嚣的时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立即严正地驳斥了这种谬论。他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

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

义和团运动的消息刚传到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立即发表评论，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指出这是“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侵略者的战争”，“是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却公然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疯狂咒骂义和团，支持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运动。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胡说什么德国侵占胶州湾是“必要的”。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饶勒斯也狂热地支持法国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

事隔几十年之后，苏修叛徒集团的小丑们又扛起老修正主义分子的破旗，亦步亦趋地恶毒咒骂义和团运动是“自发而组织很差的运动”，站在“排外立场”，“极度保守”，“思想浸透着神秘主义和迷信”。他们诬蔑义和团的语言，简直和当年老沙皇诽谤义和团如出一辙。1900年12月列宁曾经严正指出：“目前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还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

---

①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sup>①</sup> 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学者们咒骂义和团，为老沙皇侵略中国辩护，就是为新沙皇反华效劳。林彪反党叛国集团重要成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也信口雌黄，恶毒攻击义和团运动是“用另一种落后的，而且是很反动的形式”，“表演叛乱”。适足以证明他的叛徒嘴脸是多么可鄙！

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中外反动派诬蔑义和团的种种谬论。毛主席指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sup>②</sup> 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义和团的攻击和诬蔑，丝毫无损于义和团运动的伟大光辉。义和团的丰功伟绩将传颂千秋万代，它的不朽功勋是任何人也抹煞不掉的。

义和团运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义和团英雄们从朴素的革命感情和反帝要求出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是非常可贵的。但由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武装，对帝国主义认识处在感性阶段，对清政府的反革命两手认

<sup>①</sup>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六——二一七页。

<sup>②</sup>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识不足，常常遭到清政府从背后袭击和暗算。

义和团运动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农民不仅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也是反帝斗争的主力军，但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彻底发挥主力军作用，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义和团英雄儿女的反帝革命精神万古长存！

## 第八章 辛亥革命

### 一、帝国主义角逐下的中国

**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辛丑条约》的基础上，通过清朝政府这个反动工具，加紧对中国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使中国人民更加陷入苦难的深渊。

1902—1903年，英、美、日三国分别与清政府签订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如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又名《马凯条约》）。规定英国商品进口抽税百分之十二点五后，免征其他各项杂税；英国在华工业商品，缴纳百分之十的出厂税，即可遍销各地；英国资本可向中国企业、公司投资以及增开长沙、江门、惠州、万县等地为商埠等条款。帝国主义逼迫清政府，陆续开放了广大内地城市昆明、长沙、济南、郑州等及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三十几处为商埠，帝国主义触角也相继侵入城乡各地。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几年前所攫取到有关修筑铁路等方面的侵略权益，正积极付诸实现。1901—1905年间，除了俄、德直接投资兴建的中东铁路（包括中东铁路哈尔滨—大连支

线)和胶济铁路已经修成,法国直接经营的滇越铁路正在修筑外,帝国主义更采取了贷款形式控制我国铁路。正太、沪宁、道清、汴洛等铁路,分别由俄、英、比等国与清政府订立借款行车合同,纷纷开始兴筑。据统计,到1911年止,我国铁路全长总计九千六百一十八公里,其中被帝国主义控制(包括直接经营和控制经营在内)的就达八千九百五十二公里。帝国主义通过铁路贷款,不仅获得惊人利息,包揽整个铁路工程和委派总工程师、会计师控制全路监督勘测、施工与财政收支大权,同时还控制了铁路通过的广大地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如沙俄强行修筑的中东铁路在1903年全线通车前后,便非法强占大片土地,实行移民,事实上把铁路沿线地区,变成沙俄的殖民地。又以“护路”为借口,派驻七万军队驻扎铁路沿线,并随时利用铁路运兵。沙俄还享有货物减收关税三分之一的特权,同时利用黑龙江盛产小麦的有利条件,在哈尔滨及该路沿线开设制粉厂三十四个。除当地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则劫运回国。沙俄还变本加厉地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煤矿、森林等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

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中,银行更是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重要工具。二十世纪初继英国汇丰、德国德华、日本横滨正金、沙俄华俄道胜及法国东方汇理诸银行之后,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荷兰银行、意大

利意品银行也在中国分别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外国银行通过他们的雄厚资本，不断扩大存款、放款、外汇、投资贷款和滥发钞票等。外国银行实际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财政资本侵华的中枢。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垄断我国经济各部门的庞大的托拉斯组织也出现了。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托拉斯。怡和洋行是英国垄断长江流域各省的重工业、矿冶、造船和轻工业的纺纱、制糖、缫丝、烟草以及公用事业的巨大经济垄断组织。其中矿冶、造船、纺纱、烟草和公用事业（水电为主）五个工业部门的投资，几乎占怡和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九十一强。“满铁”成立于1906年，是日本垄断我国东北地区南部的南满铁路、抚顺煤矿以及铁路沿线城镇电灯、煤气、自来水、缫丝、染织、酿造等多种企业的庞大垄断组织。它们的触角深入我国城乡，残酷榨取中国人民血汗，沉重打击我国民族工业，阻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年，除了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外，国际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急剧增加及其深入我国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垄断我国工矿、交通命脉，控制整个财政金融，是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深化的重要标记。

**日俄战争** 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局部地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爆发了日俄战争和英国第二次

侵犯我国西藏的战争。

我国东北是帝国主义角逐的重要地区。特别是日、俄争夺尤为激烈。甲午战争后，沙俄对朝鲜和东北的野心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俄两国在侵华过程中处于长期对立状态。为了抵制沙俄向东北扩张，英国和美国积极支持日本打击沙俄。1902年英日结成了反俄军事联盟。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趁机出兵侵占了东三省，在中国人民强烈抗议及日本、英国等列强牵制下，1902年4月，沙俄与中国政府订约，被迫同意分期从东北撤兵。心怀叵测的沙俄在第二年却背信弃义拒绝继续撤兵，于是日俄争夺东北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一场日俄两个强盗争夺朝鲜和我国东北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清朝政府，害怕开罪帝国主义，竟宣布“局部中立”政策，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划为日俄战场。日俄战争严重的践踏了我国主权，给我东北人民直接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日俄两个强盗在战争中受到了削弱。沙俄是战败国。沙俄国内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为了对付国内人民，急想结束战争。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也被战争拖个筋疲力尽，也期望早日议和。1905年9月，在美国“调停”下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保护国，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同时沙俄把由长春到大连的铁路和从我国攫取到的旅顺、大连及其附属特

权无条件的转让给日本。日俄战争的真正受害者是中国。从此日俄重新宰割了我国东北。日本又强迫清政府在1905年12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还签订了附约)。其中承认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特权，并同意开放辽阳、凤凰城、铁岭、哈尔滨、齐齐哈尔、璦琿等十六个城市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设立木植公司，日本将在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划定租界。

**英国第二次侵略我国西藏的战争** 英国早就对我国西藏抱有侵略野心。二十世纪初，沙俄势力企图通过西藏上层集团侵入西藏，引起英国的极大嫉恨。1903年7月，英国先发制人派侵略军从缅甸再次侵入西藏。藏族同胞对入侵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江孜保卫战中，西藏人民用木棒、刀矛等原始武器给英国侵略军以迎头痛击。包围敌军达二个月之久。藏族同胞用自己的鲜血在近代史上写下了慷慨悲壮的一页。1904年8月，英国竟背着中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拉萨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给予英国极广泛的政治、经济特权。包括江孜、噶大克等地开埠，对英赔款，拆毁边界至拉萨的防御工事等。《拉萨条约》实际上使我国西藏地区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这个条约遭到中国人民，首先是西藏同胞的坚决反对。1906年4月，双方重订条约，英国取得许多侵略权益。但它分割中国

领土西藏的阴谋则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清朝政府在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下，反动统治越来越走向衰落。为了重新稳定它的统治，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刺刀的保护，并披上“维新”的画皮，竭力把自己的狰狞面目掩盖起来，借以缓和人民群众的不满。

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实行了一套骗人的“新政”。练兵和筹饷在“新政”中占有突出地位。1903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头子的练兵处。地方成立了以总督、巡抚为头子的练兵公所。1905年练兵处拟定了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师”）的庞大计划，并整编成北洋六镇，达七、八万人，归袁世凯节制。编练新军的同时还设置了巡警部。此外，还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建立新式学堂等。练新军、办警政、设学堂增加了巨大的财政开支。清政府便巧立名目，加紧向劳动人民敲骨吸髓。这时期清政府还颁布了便利外国资本投资设厂、开矿的《章程》，并聘洋人为财政、军事顾问。所以“新政”的实施过程，也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彻底合流的过程。清政府“新政”，实际上起了激化社会阶级矛盾、促进人民反抗的作用。

1902年，河南农民掀起了反抗清政府摊派赔款的斗争。泌阳、桐柏、唐县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反对清政府的野蛮压榨，并组织“齐心会”，围攻县城。武安、鹿邑



等地农民纷纷响应。四川、福建、江西、江苏各地的抗捐抗税斗争的巨大开展，有力地戳穿了封建统治者的“新政”的骗局。

1904年乐平的抗捐斗争，是农民群众反抗清政府暴政的斗争。

乐平是江西省经济作物靛青的主要产地。在进口洋靛的排挤以及繁重的统捐、厘金的压制下，土靛销路日益缩小，价格猛跌，严重地威胁到靛农的生活。“新政”开始以来，地方官绅动辄以增加学堂经费为名，滥收靛捐，乘机勒索与搜刮劳动人民血汗。在忍无可忍的绝境下，终于爆发了抗捐抗税的群众性的反抗斗争。他们愤怒的捣毁了学堂、盐卡、厘卡，烧掉了县署，砸烂了教堂，并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法国侵略者借口“保护”侨民，驱使军舰进驻鄱阳湖，向革命群众示威。清政府害怕触犯帝国主义利益，立即派重兵勾结当地豪绅残酷地镇压了这次抗捐斗争。

1903年到1905年间，广西会党爆发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也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清政府动员广东、广西、湖南等五省军队，历时两年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除了农民的斗争外，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许多城镇也纷纷展开了抗捐、罢市的斗争。

无产阶级这时虽然还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

量，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也参加到斗争的行列。

1905年4月上海的集成、新华两个纱厂的纺织工人，反对封建把头监工暴行和裁减工人，掀起了罢工风潮与反抗斗争。

1905年在反美爱国运动中，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工人积极的斗争姿态，初步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和斗争精神。

二十世纪初年，人民反抗斗争的历史表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对中国人民残暴统治和种种迫害，使原来已经相当尖锐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各阶层人民群众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不满情绪，急剧的增长着。风云突起、怒潮滚滚的紧急形势，预告了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勃兴

**孙中山的早期活动** 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内部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形势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据统计，1900年前，完全由民间举办的厂矿企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有一百二十家，资本总额为二千二百七十七万元。到1906年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六家，资本总额达到二千七百万元。其中以棉纺织业等轻工业发

展较为显著。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为独立的阶级。但它的内部由于经济地位以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的程度不同，在政治上则形成为两大对立势力。上层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已从原来的改良派堕落为保皇党。这时代表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随着自身经济力量增长，迫切要求挣脱帝国主义压迫与封建势力的束缚，独立发展民族工业，它们强烈要求改变现实，寻找新的出路。在风起云涌的群众反侵略、反压迫的浪潮推动下，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整个斗争形势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开始成为历史的主流。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在中国第一个举起资产阶级革命旗帜，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原名孙文，号逸仙，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后来从事革命，化名中山樵，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孙中山。1879年孙中山到了檀香山，在他哥哥华侨商人孙眉的支持下，先后进入当地英、美教会学校读书。1883年回国，在广州、香港继续学习。1892年毕业于香港的西医书院。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了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希望清朝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根本不加



孙 中 山

理想。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立志推翻清王朝，走上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

1894年9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积极宣传反清革命。同年11月，在檀香山建立起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

在《兴中会宣言》中，严肃指出当时中国是：“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促使孙中山在寻找救国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建立香港兴中会。决定乘甲午战败，群情激愤之际，发动广州起义。香港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战斗口号，孙中山第一次表示以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榜样，改造中国的决心。

广州起义计划未实现即遭到清政府的镇压。此后，孙中山亡命海外。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兴中会又发动了一次惠州起义，因为没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又以失

败而结束。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继续在海外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这时他开始与留日学生直接接触，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和革命行动，并从中受到很大鼓舞。孙中山在1904年发表了《驳保皇报》、《敬告同乡书》等文章，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真保皇，假革命”给予了尖锐的批判。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903年夏，孙中山从越南到日本，支持留学生的“拒俄”“拒法”（反对法国侵略广西和驱逐广西巡抚王之春）运动。随着革命斗争的逐步展开，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华侨中，拼命用“名则保皇，实则革命”的虚伪宣传，抵消革命影响，檀香山等地兴中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甚至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受骗参加了保皇会。同年秋，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秘密创办军事学校，吸收革命知识青年入学。在入学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主张。

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他的革命斗志更加旺盛。1904年，孙中山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以蔑视一切反动派的伟大气魄，满怀信心的指出：“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清朝反动政府象“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任何反动势力想要支撑它，必定是

“反要加速其颠覆”。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二十世纪初期，留学生运动兴起。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他们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日益逼近的形势下，起了先锋、桥梁作用。

清政府“新政”时期，废除科举制，设立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在客观上为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创造了一定条件。留学生把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作为寻找救国真理的途径。那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sup>①</sup>1904年，除了赴英、美、德、法等国留学外，仅在日本的留学生即达二千三百多人，1906年又激增到八千人左右。这批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在斗争中逐渐汇集到孙中山的周围，成为民主革命的信徒。为在中国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sup>②</sup>

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勃兴，使思想战线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从斗争需要出发，广泛地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有的重新刊刻揭露清王朝初期满洲贵族入关时罪行的著作（如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五九页。

②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九期《红旗》杂志。

《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等)；有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斗争历史(如亚当斯密《原富》、《法兰西革命史》等)；还有的用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结合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现实，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和鞭挞清朝卖国投降活动(如《革命军》、《猛回头》等)。特别是这些结合中国实际，充满革命激情而又文笔犀利通俗的作品，尤为当时人们欢迎，到处传诵，有力地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

当时鼓吹革命的进步报刊也象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出来。如在日本创刊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浙江潮》等。在上海创刊的有《苏报》、《四川》及《廿世纪之支那》等等，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并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刊物。

辛亥革命前，出现了一批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宣传家。邹容、陈天华和章炳麟等人则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邹容(1885——1905年)字威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赴日留学。他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痛恨封建专制的腐败黑暗，热烈向往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1903年用通俗易懂文字写成《革命军》，并和章炳麟写的《介绍邹容〈革命军〉》一文，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革命军》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赞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历数清王朝专制残暴与反动思想统治罪状，尖锐

抨击了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投降政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基本政治观点。提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恢复人们长期被剥夺的人权，明确地提出了开创“中华共和国”，在中国永远根绝封建专制统治的理想。号召四万万男女同胞“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以自我牺牲的决心同封建统治者“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决一死战。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出身于贫寒家庭。他在留学浪潮中东渡日本，写成了鼓吹反帝爱国的《警世钟》、《猛回头》等有名的通俗小册子。提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的主张。他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立场上，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做了口诛笔伐，严正指出清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的“洋人朝廷”。他强调要在资产阶级（即所谓“中等社会”）的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反动统治。陈天华号召全国人民要向帝国主义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他说：“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

章炳麟（1869——1936年）又名太炎，浙江余杭人，



著名的爱国学者。他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从资产阶级改良派营垒中分化出来投入革命派的一个代表人物。1902年时，明朝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他在日本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用以唤起民族觉悟，激发反清革命的爱国热情。1903年，章炳麟在上海《苏报》发表一篇驳斥保皇谬论的著名论文，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高举反儒尊法的旗帜，一针见血地指出：“陵制汉人”的清政府“尊事孔子，奉行儒术”，以行“愚民之计”，并痛斥清朝皇帝光绪为“载湫小丑，未辨菽麦”。章炳麟在这篇文章里，通过大量事实，把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的假革命，真保皇的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击中了康有为坚持保皇，效忠清帝的要害。章炳麟勇于站在时代的前面，热情歌颂革命是明“公理”去“旧俗”，救中国“补泻兼备”的“良药”。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引起清朝政府极端的仇视与恐惧。清政府通过上海租界逮捕了章炳麟，查封了《苏报》。邹容毫不畏惧，自己主动投案。清政府判处章、邹徒刑。1905年4月，邹容不堪折磨，死于狱中。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苏报案”发生后，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而强烈的抗议。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初步发展的产物。反动派违反历史潮流企图压制、扼杀只能更加暴露自己的反动面目。同封建统治者主观愿望完全相反，“苏报案”在客观

上却进一步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

邹容、陈天华、章炳麟等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这是他们主要的历史功绩。但是他们长期脱离劳动群众，不但没有接触到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而且看不到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有的在革命暂时受到挫折时悲观失望，甚至动摇。1905年，陈天华因日本反动当局取缔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竟愤而投海自杀。这虽然表现出陈天华以死向日本反动派抗议，但也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

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爱国思想走上革命的道路，是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的。

1903年4月，沙俄背信弃义拒绝从东北继续撤出军队。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蔡元培等人发起下，召开了拒俄大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情绪更为激昂，他们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各省留学生到会有五百余人。会上决定建立一支“拒俄义勇队”，以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并致电袁世凯“请隶其麾下”到东北抗俄。“拒俄义勇队”的锋芒直指沙俄帝国主义，并未危及清政府。但是驻日清朝公使竟把“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罪名强加到“拒俄义勇队”头上。一贯与人民为敌的清朝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如临大敌，竟密谕各省督抚说：“东京的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托拒

俄以谋革命。”同时别有用心地扬言“拒俄义勇队”既已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下令各地“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朝驻日公使据此并要求日本政府强行解散“拒俄义勇队”。留学生听到了这个突然降临的灾祸，莫不义愤填膺，痛哭流涕。于是在“爱国有罪”，“报国无路”的形势下，多数学生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大倡“排满抗清”的言论，痛斥清朝政府的“媚外虐民”。决定把“拒俄义勇队”秘密改组为鼓吹革命的团体“军国民教育会”。

**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 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把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广东、两湖、长江中下游各省，逐步推到斗争的前列。

1904年春，留日学生黄兴（1874—1916年），字厘午，号克强，湖南善化县人。他同陈天华等在湖南长沙创立了华兴会，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同年冬，浙江留日归国学生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在上海创立了光复会。1904年夏，湖北刘静菴、张难先等在武昌建立“科学补习所”。这些革命团体和过去的会党不同，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参加者大部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有部分地主阶级反满派和会党领袖，成份比较复杂。它们虽然没有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而且局限于地方活动，但它们十分重视在学堂、新军和会党中间开展革命活动，特别是与会党联系更比较密切。1904年11月，华兴会领导

人黄兴，联合湖南哥老会，约定在长沙发动起义，并和武汉，浙江的革命者取得了联系。科学补习所原定在湖北响应长沙起义。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在浙江会党中也有所准备。长沙起义因计划泄露，被清政府破坏。黄兴等逃往日本。这时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渐渐聚集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旗帜之下。

### 三、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孙中山在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鼓舞下，在日本东京和华兴会领导人黄兴等会谈，决定几个革命团体实行联合，成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成立，适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高潮的标志。

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于日本东京召开了同盟会成立大会。中国同盟会是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的一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阶级基础是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它的成员的社会成份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盟会既包括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有部分地主阶级反满派，其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居于领导地位。这次成立大会的主要成绩是：（一）建立同盟会总部，推举孙中山担任总理，以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代表总



《民报》封面

理主持总部经常工作。并决定在国内大部分省区和海外华侨、留学生中建立同盟会支部作为它的基层组织；（二）通过了一个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三）决定从11月创刊《民报》，做为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机关刊物。

同盟会的成立，在组织上联合地方革命团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政治上，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从而为民主革命的高潮的到来进一步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

**同盟会纲领** 同盟会宣言(即《军政府宣言》)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宣言》中强调“国民革命”推翻清朝反动政府。在“国体民主”方面也要有所改革。

同盟会的纲领的显著特点是：第一，它坚持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第二，它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府；第三，它幻想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同时完成“社会革命”。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纲领中规定的基本任务，曾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孙

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当时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要实现民族独立，首先就是要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政府。可见，同盟会提出的“反满”是服从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

“民权主义”，主要是“建立民国”。它是同盟会纲领的核心。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鲜明旗帜下，吸引并汇合了广大革命党和人民群众为在中国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夺取政权而斗争，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列宁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他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sup>①</sup>

“民生主义”，主要是“平均地权”。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提出的一个新的理想。

孙中山在欧美经过长期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人运动猛烈发展，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主要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因而造成贫富悬殊

---

<sup>①</sup>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四页。

的恶果。他企图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同时解决土地问题，避免未来的社会革命。列宁指出：“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①

同盟会制定的政治纲领，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是同盟会政纲的理论基础，被同盟会通过政纲形式加以承认。

同盟会的成立，把中国民主革命推向了一个全国发动的新阶段。但是同盟会从组织上来看，它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的内部对政纲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原华兴会的一些成员，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反对“平均地权”。原光复会的一些成员，过分强调“反满”。这种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必然导致组织上的涣散和分裂。特别是同盟会的纲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它没有正确指出革命的对象。“民族主义”主要锋芒只针对着清朝的贵族统治，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把最大的最凶恶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放过了。

---

①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六页。

同盟会《对外宣言》，强调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所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都“继续有效”，对帝国主义赔款、外债“照旧承担”，对于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特权则“一体保护”。从同盟会这一条外交路线来看，确实表现出他们害怕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企图通过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至少保持中立。

封建势力是民主革命的另一个重要敌人。革命党人在《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和《略地规则》中，从狭隘的民族意识出发，对为虎作伥的汉族地主、官僚、军阀“一视同仁”，希望他们放下屠刀，“离仇讎之地位而复为兄弟”。并且在革命后企图依靠地主绅士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同它在“平均地权”中反对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已有”，企图把解决土地问题限制在“核定地价”，“照价纳税”和“土地国有”一样，都表现了对封建势力的妥协。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根本没有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能力。

#### 四、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 君主立宪派的论战

二十世纪初年，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主革命的高涨。当时君主立宪派站在封建统治者一边，坚决反对革命。已经彻底堕落成为一批坚持资产阶级议会道路的保皇党。他们害怕民主革命危害



自己的既得利益，除了从组织上大挖革命派的墙脚外，还在政治上疯狂反对革命，竭力鼓吹议会斗争，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他们在经济上顽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反对彻底的社会改革。并在思想上散布尊孔反法谬论，宣扬封建纲常名教，替封建反动政府张目。事实上，君主立宪派腐蚀群众革命意志，瓦解革命队伍，起了反动派所起不到的作用。民主革命与中外反动势力决战日益逼进的形势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同他们展开一场锋芒凌厉的思想论战，在政治上思想上压倒君主立宪派，就不可能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

1905年——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通过《民报》与君主立宪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一场大论战。

论战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中国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尊孔还是反孔的问题。

**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君主立宪派站在保皇党的立场上，竭力替清政府涂脂抹粉。胡说“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提倡革命是“无病而学呻矣！”并危言耸听的宣扬革命必将引起“下等社会”（诬指劳动人民）暴动，严重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同时列强必定出兵“以防我暴动”，进而招致“瓜分”大祸。因此“排满革命”决不能实行。他们认为“爱国”绝不应革命。同时扬

言“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君主立宪派还大肆污蔑中国人民“程度低下”，没有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当前不仅不能实行民主立宪，甚至连君主立宪也不能立即实行，只能“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

革命民主派高举革命战旗，热情歌颂革命暴力的伟大历史作用，对君主立宪派上述谬论，进行了坚决的驳斥。他们指出：“人类之压动力何？革命是已”。“夫革命云者，将以举凡从前之陋俗弊政，悉欣翻而摧拉之，非仅以杀人流血为能事也”孙中山严正指出：“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革命派相信本着建设的目的，采取破坏的手段，革命必不致于发生“内乱”。同时认为革命以“排满”为目的，而非以“排外”为目的，只要革命军“守国际法而行”，就可以避免被列强“瓜分”。革命派一针见血地指出立宪派所谓“爱国”就是爱清朝反动政府，爱充当洋人奴才的卖国政府。不推翻这个卖国政府中国则必将亡国。因此爱国必须革命。革命派揭露立宪派反对革命，鼓吹“劝告”“要求”的反动实质，就是站在保皇党立场上仇视革命，甘当清朝家奴，取得主子恩赐的一杯残羹。

革命派在论战中明确指出：“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要推翻清政府暴政，必须“颠覆现今恶劣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立宪派胡说中国人民没有享受民主立宪能力，缺乏共和国民的“资格”等，

这完全是污蔑。革命派认为中国只要实行民主共和，人民必定“皆明国家原理，知公权之可宝，而义务之不可不尽。”因此完全可以养成国民的资格。立宪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打碎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机器代之以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各族人民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基本条件。革命派在论战中，明确指出推翻清政府，“兴民权，改民主”，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论战中，他们既暴露出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暴露出害怕群众暴动的根本弱点，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它不仅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是广大农民群众遭受封建剥削的社会根源。因此摧毁封建土地制度也是中国民主革命一项根本任务。君主立宪派本身与封建土地制度存在密切关系，要改变它就会损害自身利益，所以他们对“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更是恨之入骨。他们挖空心思地为封建土地制度辩护，胡说地主占有土地“勤勉殖富”有利社会发展。攻击“土地国有”破坏生产，危及现存社会秩序，是“亡国之罪”。梁启超疯狂叫嚷：“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之具”，“土地国有”动摇“国本”，废除封建土地制

度则必然造成“富族畏避，贫民专政”，中国就会“亡国”。梁启超最后竟声嘶力竭般狂叫：虽以“匕首搦吾胸”，我也必定大声疾呼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革命派严厉驳斥了君主立宪派对“土地国有”的种种非难。明确指出垄断土地的地主“伤害社会多数之公益”，“土地国有”就是要“牺牲少数(地主)之私利化为大多数之公益。”打破“地主专制之牢笼”。并进一步指出解决土地问题要采取最有秩序和最合理的方法，因此绝对不会发生“贫民之专擅”。革命派在论战中，强调中国经济制度绝不是稍加改良或“补苴”就能解决，要想消灭贫富不均的现象“端赖提倡民生主义，而提倡民生主义，首在实行土地国有制。”

革命派批判立宪派维护封建土地制度，反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革命派既提不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又反对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的革命行动。因此他们对立宪派的批判也是无力的。

**尊孔还是反孔** 对孔老二抱什么态度，尊孔还是反孔，从来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尖锐表现。

康有为通过所写的《孟子微》、《论语注》、《中庸注》等书，卖力的兜售尊孔反法黑货。他把儒家的封建纲常伦理和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结合起来。并以“新学

派”自相标榜。实质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孔老二的借尸还魂。康有为肉麻地吹捧孔子是一个“百世制法”的维新派首领。梁启超更颠倒黑白，把孔子打扮成为一个“最恶贵族政治”并“摧毁贵族政治”的历史“伟人”。

革命民主派举起反孔尊法旗帜，对儒家反动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章太炎指出孔子虽生在“贵族竞争”时代，但他“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斗争，却不敢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在《春秋》上虽有“非世卿”的话，只是口诛笔伐，并不敢实行的，所以他教的弟子，总是“依人作嫁”，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同时还揭露孔丘诛少正卯的“诈伪”“忌刻”，残酷打击新生力量的险恶用心与卑劣手段。革命派指出：孔丘不仅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他的言行表明，孔子倒是一个“便辞利口，复邦乱家”的政治骗子。康有为注释的《中庸注》，实际上正是贩卖“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议论止于函胡之地”的政治权术。革命派在论战中，深刻地揭示了清朝政府“尊事孔子，奉行儒术”的政治目的，完全是为了“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康梁之流作为尊孔派“名为尊孔，实则借孔教为奥援耳。”

革命民主派以鲜明的尊法反儒态度，指出中国从汉代以来，官号、郡县、刑罚制度，都“本之秦氏”（即秦始皇），真正替“百世制法”的绝不是孔丘，它的历史功绩应当属于法家李斯。

尊儒反法，还是尊法反儒是这场思想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顺应历史潮流，敢于向封建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革命气概。但是他们并没有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加上本身的剥削阶级历史地位，因而不可能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因此革命派也不可能把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1905年—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君主立宪派的论战，是二十世纪初年革命和改良两条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是民主革命的高潮日益逼近，阶级斗争空前激化的反映。通过这场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不仅在政治上挫败了康、梁保皇党的阴谋，同时对尊孔反法逆流也作了有力的反击。进一步划清了革命和改良两条政治路线的界限，使广大知识分子从改良主义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投向孙中山高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旗帜之下，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革命民主派在论战中的胜利，为辛亥革命作了比较出色的动员。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甚至连君主立宪派头子梁启超也无法否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的客观事实。

毛主席指出：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

积。”<sup>①</sup>

但是革命派在论战中也暴露出在政治观点上的严重错误。他们在同盟会纲领里不敢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任务，论战中又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在答复立宪派所谓革命必招瓜分这个问题时，革命派天真的说：中国革命是反对封建专制，申张‘民权’只‘排满’而不‘排外’，因此列强不会干涉中国革命。在答复立宪派所谓革命必起“内乱”这个问题时，革命派又认为只要通过单纯的军事暴动进行“秩序的革命，”注意内部的调合，本着建设“民国”的目的，就不会发生内乱。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 五、革命形势的跃进

**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高举革命旗帜，在同君主立宪派展开论战的同时，为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展开了猛烈的冲击。

1906年萍、浏、醴起义，揭开了同盟会成立后武装斗争的序幕。

萍乡、浏阳、醴陵位于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处。这些地方原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就很尖锐，会党势力很大。

---

<sup>①</sup>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新华月刊》一九五六年二十三号。

1906年，湖南、江西一带发生水灾。当地官绅乘机高抬米价，使农民、矿工受到饥饿与死亡的威胁，酝酿着反抗的怒火。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这时通过会党在安源矿工、农民群众中积极宣传同盟会革命纲领，扩大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决定发动萍、浏、醴武装起义。但因事机不密，在年底浏阳首先起义。会党首领龚春台用“中华国民军”名义发表了革命檄文，愤怒斥责清政府“为借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力赠给外人”的卖国罪行，号召革命群众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这个檄文，不仅表现出广大农民对封建势力的强烈阶级仇恨，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要求。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在萍、浏、醴之间屡败清军。在醴陵宣布起义的清军士兵也纷纷参加斗争。特别是安源矿工六千多人响应起义，积极投入战斗，更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势，使长江上游为之震动。封建统治者惊恐万分，急调数省军队进行镇压。起义军同清军经过几个月的激战，最后失败。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激发了革命群众的斗争热情，增强革命党人的武装反清的信心。

1907年初，孙中山从日本到了越南。他在河内设立革命领导机关，直接筹划国内反清武装起义。从1907年到1908年间，革命党人在孙中山领导和号召下，先后在华南各地举行了六次武装起义。并在1907年出现武装斗



争的高潮。

在广东省有潮洲、惠州、钦洲、廉洲(钦、廉今属广西)四次起义。在广西省有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在云南省有河口起义。革命党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虽然充满了斗争和牺牲精神，但是他们基本上执行了一条单纯武装暴动的军事路线，没有发动和依靠当地革命群众，而把他们自己斗争同群众隔绝起来。如钦洲起义攻下防城，准备向广西发展时，对钦洲、廉洲群众因抗捐激起的武装斗争，并没有去组织领导，反倒对清军将领郭人漳的“反正”寄以很大希望，结果上当受骗，最后使起义遭到失败。

1907—1908年间，光复会在安庆也举行了两次起义。

徐锡麟是光复会会员，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堂长。他在安徽积极联络同志，准备起义。当时光复会会员陶成章、秋瑾(女、同盟会浙江主盟人、任绍兴大通学堂堂长)等在浙江联络各县会党，计划编练光复军，也和徐锡麟取得了联系。1907年7月，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徐锡麟当场击毙参加典礼的巡抚恩铭，率领学生起义。清朝防营前来镇压，徐锡麟被捕遇难。秋瑾在徐锡麟起事后准备响应，因计划泄露，也遭到反动派的杀害。

1908年11月，光复会会员熊成基联络会党乘清军

举行秋操，安庆防务空虚，决定起事。但因机密泄露，清军严加防范，熊成基起义后，未攻下安庆，便遭到清军镇压，他被迫逃往外地。

1908年4月，孙中山在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受到日本、越南、香港等地反动当局驱逐，被迫把革命工作委托黄兴等负责，自己到欧美为革命筹款。黄兴等在香港设指挥部与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计划发动广州清朝新军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同巡警发生冲突，倪映典率一部新军仓促进攻省城，中途被清军截击，倪映典牺牲。这次起义也失败了。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打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气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情绪，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这些起义都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和经过充分准备，因而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革命党中的某些领导人，在多次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既认识不到群众的伟大力量，也看不到革命前途。对同盟会总部怨言太多，甚至互相攻击，革命派的团结行将破裂。不久章炳麟等又重拉光复会的山头，进一步在组织上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还有些人从此走上暗杀统治阶级个别人物的错误道路上去。如1910年1月熊成基在安庆起义失败后，从山东流亡到哈尔滨，企图暗杀满州亲贵载洵被捕遇害。同年3月，汪精卫(后投靠袁世凯，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大汉奸)、黄复生也因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灃，被捕下狱。

但也有一部分革命党人，脚踏实地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群众工作，为革命积聚了力量。其中湖北革命党人投入新军，在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开展了大量艰苦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建立革命组织（如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等），进行了秘密活动。1908年12月，湖北新军中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又建立了“群治学社”（后改为“振武学社”）。所有这些对于武汉地区革命斗争的推动，都起了重要作用。

**群众抢米风潮和抗捐暴动** 辛亥革命前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彻底勾结起来，对中国人民残酷的统治和迫害，促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加剧了形势的动荡，全国各地群众纷纷掀起了革命斗争。从1907年到1910年，三年当中，仅在长江下游和湖南、湖北，因粮荒而激起的抢米风潮就有八、九十起之多。1910年4月，湖南长沙抢米风潮，就是当时规模很大的一次群众自发斗争。

湖南是我国著名产米地区之一。在帝国主义深入侵略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下，广大农民平时已处于半饥饿状态。1909年洞庭湖一带发生水灾。宝庆、衡山等地又有旱灾。全省灾民不下十余万人。灾民全靠剥树皮，掘草根过活。湖南地主官僚和帝国主义洋行乘机抢购米谷，囤积居奇，造成更大的米荒。

1910年4月，长沙城乡及附近饥民将近万人聚集于

巡抚衙门，要求减价粃米。反动当局进行镇压，用刺刀刺死数十人，被捕三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饥民盛怒之下，一夜之间就把城乡碓房，米店一百多家，一齐捣毁。接着全城罢市，饥民又烧毁了巡抚衙门、税局、官钱局和银行等处，同时还把城厢内外的外国教堂、洋行、学堂也几乎全部焚掉或捣毁。长沙人民从“抢米”斗争发展到有几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使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吓破了胆。清政府急调湖北军队和长江水师赶到长沙镇压。帝国主义也从上海、汉口调来十余只军舰，帮助清政府剿杀中国人民。长沙人民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斗争风潮暂时平息下去。长沙抢米风潮，不仅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封建势力，同时也以英雄气概横扫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群众抗捐抗税斗争，是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勒索巨额赔款和清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的愤怒抗议。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人民抗捐抗税斗争在全国猛烈的发展起来。许多地区甚至掀起了武装暴动。1910年春，山东莱阳暴动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群众抗捐抗税斗争。

1910年春，莱阳地区降了严霜大雪，秋收毫无指望。劣绅奸商又乘机囤谷，粮价骤然上涨，官府又令农民补纳人口税、牲畜税等。衙役、巡警下乡敲诈勒索，

形同虎狼。当贪官劣绅吞蚀积谷事件被揭发后，积怨已久的莱阳人民，便在清算积谷，反对滥增新捐新税的名义下，爆发了抗捐抗税的激烈斗争。

山东“联庄会”是这次暴动的组织者。“联庄会”领导人曲诗文率领三、四万农民到处捣大户，捉富豪，把封建秩序搅个七零八落。新县令奎保到任后妄称“莱民抗拒新政，勾结匪党滋事”。于是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同清军对峙达数月之久，最后封建统治者用“剿”、“抚”交替使用的反动策略，清军用巨炮向农民阵地猛袭，城北于家店等十三村顿成火海，妇女老弱死于炮火者不计其数。农民起义队伍在清军猛烈炮火下，无法坚守。于是曲诗文率大部起义军退出莱阳，与海阳、荣城农民汇合。这次暴动失败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起义农民被反动派残酷屠杀至少有一千六百多人，焚毁房舍不下千余户。莱阳人民这次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给予清政府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封建统治者这个反面教员再一次用它的血腥暴行，加深了人民对它的仇恨，动员广大群众奋起反抗它的暴政。

**清政府的假立宪** 1905年，清政府派遣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洋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仿行宪政”，并派载泽等人拟定新官制，筹备“预备立宪”。清政府的衰落，使它不得不作出虚假的立宪姿态进行欺骗。

1906年7月到1907年，清政府以“改革官制”为名，实行削减各省总督、巡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改革官制的结果，反而加深了满洲权贵和汉族地主官僚之间的矛盾，扩大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裂痕。

1907年，清政府农工商部修改了《奖励公司章程》。规定：集股自二十万元到一百万元以上者，准授该部各等议员；集股二百万元到一千万元者，准授该部各等顾问官；集股在一千万元以上者，还分别授予其子孙三代以世袭顾问或议员。同年又新订《华商办理工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凡个人投资新式工业在一千六百万到二千万元以上者，以二百万元为差第，分赏一、二、三等子爵；投资在一千万元到一千四百万元之间者，以二百万元为差第，分赏一、二、三等男爵；投资在一千万元以下者，也分别给予奖赏。从此民族资本家当中的一些大工厂主、铁路、银行股东等都兼有清政府授给的官衔和顶戴，俨俨乎变成了清朝皇帝的臣子。

1907年，清政府又宣布中央筹设“资政院”，各省筹设“諮议局”，作为中央与地方政权的諮询机关，并准备将来改为国会和地方议会。

1908年——1909年间，又颁布了《各省諮议局章程》、《諮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和《资政院章程》等。从此，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分子，又兼有议员、议长等头衔，抬高了他们的政治身价。

立宪派在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立宪”后，兴高采烈。国内外立宪派分子为争取实现君主立宪，参预政权而成立团体，到处奔走，一时显得非常活跃。这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海外的康有为，在1907年2月，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鼓吹“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准备推举皇族载洵、载灃为正副总裁，积极在华侨中展开活动。7月，梁启超在日本成立一个“政闻社”。在《宣言》中保证：“对于皇室，绝无干犯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之举”。想以此表白对清王朝的忠诚并换取在国内活动的自由。10月，“政闻社”鼓动南洋华侨和国内士绅上书，要求早日召开国会。1908年7月，“政闻社”成员联合绅士电奏，请定三年内召开国会。清政府对他们斥为“图谋不轨”，严令各省查禁“政闻社”，缉捕该社成员。于是清政府一道上谕，也就宣判了“政闻社”的死刑。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在国内公开活动了。

国内立宪派多是清政府议员、顾问，获得爵赏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1906年——1907年间，他们利用这种合法地位，在江浙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在广东成立了“自治会”等团体，其它各省也有类似的组织。他们公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立宪请愿活动，他们的目的是想用请愿活动抵制革命的影响；同时借革命形势促请清政府早日实行君主立宪，以便猎取较多的政治权力。

1908年6月，以江浙财阀、实业家张謇为头子的江浙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发起请愿活动。各省立宪派代表在7—8月间联合向清政府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清政府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在8—9月间宣布了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有十四条规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关于“臣民”权利和义务的只有草草的九条。除规定当兵、纳税等义务外，人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可言。《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披着“立宪”外衣，实行君主集权的反动宣言，它进一步暴露了清朝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本质。

1908年11月，那拉氏、光绪相继死去。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溥仪年幼，其父摄政王载灃为监国。

1910年初，在皇族权贵载灃统治下，罢斥了北洋新军头子汉族大官僚袁世凯，积极推行皇族独揽大权的方针，引起汉族官僚的不满。载灃为掩人耳目，曾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决心。不久，载灃又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諮大臣。1909年10月，各省諮议局成立，立宪派许多头面人物经过总督、巡抚遴选当上了议员、议长，他们利用这个合法讲坛，大肆宣传君主立宪主张。12月，立宪派头子江苏諮议局议长张謇在上海召集十六省諮议局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推动全国立宪运动。从1910



年初到10月，各省諮议局代表麇集北京，联合资政院大部议员和部分总督、巡抚，先后三次掀起要求速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的请愿高潮。他们通过向皇族权贵游说和叩头请愿办法，向当权者反复陈述立宪可以阻止革命，而不损害统治权的道理。尽管叩头请愿十分“温和”而又“文明”，但它仍激怒了封建统治者。清政府对请愿代表，竟以“聚众要挟”的罪名，严加禁止。于是立宪派发起的喧嚣一时的请愿闹剧，便在清政府镇压下立即销声敛迹。各地赴京请愿代表，也悄然离去。

**铁路风潮** 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铁路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帝国主义直接投资经营的有沙俄的中东、日本的南满、德国的胶济、法国的滇越等重要铁路。通过借款控制经营管理权的，美国有广九、北宁、京沪、沪杭等铁路，德国有汴洛路，沙俄有京汉、正太等铁路。此外，帝国主义还享有铁路借款权，如英国对浦信、津浦等铁路，法国对京汉铁路（沙俄资金不足，法国参与了借款），美国对粤汉路等。1907年收回利权斗争开展起来之后，奉天（辽宁）人民反对日本建筑安奉路，掀起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对英、德、法铁路借款，强烈要求将两湖境内的粤汉、川汉铁路仍归商办，江苏、浙江人民也掀起收回沪杭甬铁路的反英斗争。直隶、山东人民坚决要求从英、德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津浦路权，云

南继续为赎回法国强行修筑的滇越铁路而坚持斗争。

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集中力量策动武装起义，因此对这一重大斗争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致使立宪派分子乘机窃取了领导权。立宪派力图把这一斗争限制在所谓“文明争路”框子里，借以控制整个形势的发展。

1910年5月，封建统治者被革命烈火烧得焦头烂额，决定颁布新订内阁官制，裁撤军机处等机构。这个新内阁由摄政王载灃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在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尚书十三人当中，满族占九人。满族九人中皇族又占七人。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皇族内阁”。它的成立，彻底戳穿了清政府假立宪真集权的政治骗局。处于革命烈火炙烤中的清政府，为救燃眉之急，便加紧同帝国主义勾结，出卖铁路主权，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接着又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强行接收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铁路公司。清政府又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列强拍卖中国铁路利权。清政府这种公开劫掠和丧心病狂的卖国行径，立即激起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抗议和坚决反对。

1910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湖南长沙、株州工人万余人举行罢工示威，遍贴揭贴。湖北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反抗清军，发生激烈武装斗争，打

死清军二十多人。湖南学生罢课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国外留日学生集会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广东华侨也开会通过决议“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各地群众保路斗争，风起云涌，相互激荡，出现一派大好形势。

粤汉、川汉铁路是经过广东、湖南、湖北和四川人民长期斗争才改归商办的。铁路股金来自民间，四川、湖南、湖北除商股外，还有用各种捐税征集而来的民股。四川并按亩收租作股。在征收租股中，租捐由官府代征。农民小户受尽摧逼鞭鞑，甚至扣押监禁。因此“铁路国有”政策，不仅危及官绅利益，而且直接损害劳动人民切身利益，所以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群众性的巨大武装反抗。

6月，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筹谋抵制。人们痛骂清政府邮传部为卖国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为卖国贼。当场议决成立保路同志会。推立宪派蒲殿俊、罗伦为正副议长。四川各府县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斗争迅速向全省扩展，声势很大。立宪派害怕群众运动越出“文明争路”轨道，触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他们劝告群众“文明争路”，不要暴动。成都保路同志会，还令居民供奉光绪牌位，用“上谕”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作为对联，焚香膜拜，以束缚群众的手脚，压制革命群众保路斗争的积极性。

8月下旬，成都开始罢市、罢课。9月初，抗捐抗粮，群众暴动接连发生。立宪派再也无力控制运动的发展。同盟会会员龙剑鸣、王天杰等利用当时四川一触即发的局势，积极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龙剑鸣等革命党人在成都把数百块木板上写好“省城已发难，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字样，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这些“水电报”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飘往各地，有力地推动了这次斗争。

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布置了一个骗局。扬言北京来电有好信息，把蒲殿俊、罗伦、邓孝可、张澜等骗到督署加以逮捕。同时封闭了铁路公司。赵尔丰这种高压手段，立即激起成都数万人前往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恼羞成怒，竟下令军警开枪，当场群众被打死数十人，伤者不计其数。大屠户赵尔丰一手造成的成都流血惨案，象火上浇油一般，使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整个四川到处沸腾起来。

这时，同盟会会员龙剑鸣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会，进攻成都，转战各地，攻占州县。赵尔丰被成都四周各县群众紧紧围困在城内，一筹莫展。清政府也是时而调岑春煊入川“宣抚”，时而又令端方率兵镇压，搞得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端方在清政府一再催促之下，硬着头皮领兵进驻四川。这时温江、崇庆、新津、眉州、青神、井陘等十几个县先后都从抗粮抗捐发展到武装暴动。群

众武装斗争烽火大有席卷整个四川之势。

9月25日，荣县在同盟会会员吴永珊(玉章)、王天杰等领导下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封建统治者被推到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随时都有烧成灰烬的危险。

## 六、武昌起义

**黄花岗起义** 1910年10月，孙中山从欧洲到槟榔屿，召集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破釜沉舟的起义。孙中山负责购置军火。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统筹部，积极联络广西、湖北、湖南、浙江一带会党和新军。广州设立秘密机关三十多处。从各省调集大批优秀骨干组成八百人的“先锋队”(即“敢死队”)。每人写好“绝命书”，抱定“虽死而不辞”的决心。预定在1911年4月13日正式发动，起义胜利后，黄兴进军两湖，赵声出兵江西、南京，举行全国反清大起义。

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引起敌人警惕。便决定延期举事。4月27日(旧历3月29日)黄昏，仓促起义。黄兴率“先锋队”百余人进攻总督衙门，因布置不周，革命军内部因误会发生冲突。同时起义命令屡次变更，也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原来拟定十路同时发动，但实际只有四路按时起事。

这次起义牺牲的人很多，主要是学生、军人、工人、农民。后来有人收敛死难者尸体得到七十二具。广州人

民为了纪念他们合葬在黄花岗。从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名满全国，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武昌起义** 同盟会在黄花岗起义中丧失大批骨干，它的领导力量受到很大削弱。黄兴等因失败而一度丧失信心，赵声也忧愤死去。但大部革命党人在群众革命浪潮推动下，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仍坚持斗争。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湖北革命党人，1911年1月，把振武学社扩大改组为文学社。在武汉新军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半年后参加文学社的革命党人从一千人很快增加到三千人以上。湖南、湖北的共进会联络会党、新军发展革命力量也拥有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正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武装斗争阶段，清政府急调鄂军入川。9月湖北革命党人在同盟会中部总部策动下，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起来成立了统一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的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当时革命党人通过长期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已掌握了湖北新军百分之四十左右（湖北新军约一万五千人，参加文学社、共进会及与之有联系的达到六千余人）。他们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在1911年10月11日举事。

10月9日上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内制造炸弹失事，本人负伤，机关被破坏，所有旗帜、文告、印信等都被搜去。起义计划泄露。接着武昌总指挥部和许多秘

密机关又被敌人连续破坏。领导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被捕遭到杀害。蒋翊武逃走。湖广总督瑞澂严令禁闭城门，封锁营门，按照所获党人名册捕人。武汉三镇于是陷入人心惶惶、极端恐怖状态。



武昌起义

这时处于群龙无首、失去领导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时刻有被敌人搜捕、杀害的危险。10日当晚，开始自发地举行起义。新军八镇工程八营后队革命党人熊秉坤等首先起事，打死前去镇压他们的反动排长、队官等人。起义士兵四十多人，冲出营房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夺取枪支、弹药，楚望台守军响应起义。当晚武昌各地革命党人听到枪声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在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临时指挥下发起了对总督衙门的进攻。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及其他官员在革命党人起义后，仓猝逃

去。11日上午，武昌全城遂为起义军完全占领。三天之内又先后占领了汉阳、汉口及武汉三镇外围的天门、监利、潜江等县。革命党人在武汉地区首先夺取了胜利。

**湖北军政府** 11日上午，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和立宪派分子齐集省諮议局，讨论研究建立湖北军政府问题。立宪派分子原来极端仇视革命，武昌起义胜利后便摇身一变，附和革命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利用革命党人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弱点，乘机抓住政权，力图控制革命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就这样在立宪派推举下，决定请原清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原諮议局议长，湖北立宪派头子汤化龙为政事部长。黎元洪被迫做都督后，胆小怕事，不敢出面。革命党人暂设谋略处，负责湖北军政领导工作。

湖北军政府是辛亥革命中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政权。它是在民主革命风暴中诞生的。虽然它的内部一开始就潜伏着夺权、反夺权的危机，但是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巨大热情，使他们采取了基本上适应革命需要的一些政策和措施。

(一)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废除清朝皇帝年号。

(二)号召各地会党响应起义。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

(三)豁免苛捐杂税，裁减海关以外的内地税关。废



除盐、烟、酒、糖以外的统捐。免征本年及历年积欠的田赋。

(四)扩大革命武装，从工农群众中增募四协，加强保卫革命政权的能力。

此外，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或中立，还颁布了同盟会所制定的对外宣言，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一切权益，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

武昌起义成功，使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亿万人民，长期郁积的革命热情迅速迸发出来，形成不可阻挡的革命怒潮。

起义士兵攻下武昌总督衙门之后，附近居民在革命胜利鼓舞下，主动协助救火和搬运、掩埋尸体，汉阳光复后，汉阳兵工厂的工人经过努力很快全部复工，不分昼夜地为前线赶制军火。革命军攻克汉口时，各家商店、铺坊纷纷燃放鞭炮，扶老携幼，热情欢呼革命的胜利。商会也保证每天送往前线几百担馒头，同时代筹数十万元经费支援前线。湖北军政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扩军四协，城乡人民闻讯踊跃参加，仅仅五天之内就完成扩军任务，而四郊农民仍络绎于途，赶来应募。武汉三镇及其外围在起义后仅仅三天就相继光复，除起义士兵勇敢战斗外，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和热情支援的结果。

武汉三镇是长江上游战略要地，也是南北交通的枢纽。辛亥革命首先光复武汉，对清朝政府是一个致命的

打击。对全国各省革命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从武昌藩库缴获的银元，即足供军政府十个月的开支，楚望台军械库所存各种军火，武器数量较大，又有汉阳兵工厂工人昼夜不停的生产，因此除供应本省所需军火外还可支援湖南、江西革命军大批新枪和弹药。汉口商业比较发达，商店林立。汉口商会第一次筹款即达十万元以上，从财政上有力的支援了革命斗争。

## 七、武昌起义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

**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武昌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急骤发展。到十一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有十四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有些农村也掀起了革命风暴。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的武装暴动，烧毁恶霸地主房屋，树立革命大都督旗帜，传贴聚众。地方豪绅纷纷逃窜。扬州的手工业工人和会党宣告起义，建立军政府，通告“三年不完粮”，“诸捐杂税全免”。广东顺德等县农民拆毁豪绅大户住宅，包围衙署，勒缴餉械，组成各路民军，逼近省城，全省为之震动。陕西从咸阳直到凤翔、陇州数百里地区内到处发生戮官劫狱等群众暴动。四川农民反抗清军和地主武装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湖南衡州、嘉禾、醴陵、澧县等十几个州县，在武昌起义鼓舞下，相继出现围攻县署，杀逐贪官劣绅的斗争高潮。农民群众的革

命行动，并没有引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视，很多群众暴动遭到了当地反动武装甚至革命政府的残酷镇压，因而辛亥革命时期，并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农村变动。”<sup>①</sup>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夺权、反夺权的激烈展开，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

当时各省由于革命和反动势力力量对比不同，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斗争形式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新军士兵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结果被旧官僚、立宪派用阴谋手段篡夺了领导权。如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在武昌起义后，于10月22日在长沙发动新军和会党群众起义响应，杀死清朝湖南巡防统领黄忠浩，巡抚余诚格逃走。第二天建立了湖南军政府。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这时諮议局议长，湖南立宪派头子谭延闿，在立宪派支持下，乘机要挟革命党人必须按照湖北军政府先例，也要夺取政事部长一职。焦达峰等害怕分裂，于是把掌管民事大权的政事部让给立宪派。在革命政权内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焦达峰等起义后积极派出军队，全力支援武汉斗争，对湖南反动派和军政府内部别有用心的立宪派分子放松

---

<sup>①</sup>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六页。

了警惕，谭延闿在革命党人的血泊中夺取了政权，继任为湖南军政府都督。于是起义士兵、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政权再次被反动派所篡夺。接着，谭延闿利用篡夺的政权对全省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后来贵州也发生过类似的反革命政变。立宪派和旧官僚窃取了革命成果。

第二种情况是两个政权并存，最后革命政权向旧势力妥协。如四川，同盟会会员在万县、内江和新军革命士兵取得联系后，在资州发动起义。杀掉了端方。接着同盟会会员在内江等地宣布起义。成都附近新军起义后直趋重庆，并与同盟会会员联合占领了重庆。11月22日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革命党人张培爵做了都督。五天后，赵尔丰见大势已去，把政权交给諮议局议长，四川立宪派头子蒲殿俊，在成都成立四川军政府。出现了成渝对峙的局面。后来蜀军政府一再退让妥协，终于丧失了政权。

第三种情况是群众起义还没有爆发，当地立宪派和旧势力就勾结起来，利用革命一触即发的紧急形势，逼使清政府官员“自动”宣布脱离清政府，借以阻止革命形势的发展。结果是换汤不换药，旧的秩序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如江苏在11月初，立宪派便联合苏州地方士绅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立即脱离清政府。11月5日，在程德全同意下，当天上海民军代表向程德全呈递江苏都督大印，连放九炮，旗杆上悬挂“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

都督兴汉保民”字样的新旗。典礼告成后，清朝政府的江苏巡抚衙门，变成中华民国的江苏“新政权”。除江苏外，清朝山东巡抚孙宝琦在11月8日宣布脱离清政府，但是不到二十天，又明令取消独立，重新回到清王朝的怀抱。

综观武昌起义后全国复杂斗争形势，清楚看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和反革命的阶级搏斗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软弱，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它既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扑，也不可能克服革命内部不断增长的危机。

**清政府的垂死挣扎** 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惶恐万分，急派陆军大臣荫昌亲率北洋新军赶到武汉地区镇压革命党人。北洋军队统兵大员冯国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凯心腹，他们暗中掣肘，荫昌指挥不灵。清军在湖北前线的被动形势，并没有扭转过来。这时清政府不得不向袁世凯“求救”，任命已被罢斥回籍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火速前去武汉。袁世凯被罢黜后仍与帝国主义分子如英驻华公使朱尔典等和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和满族权贵密切往来。袁世凯时刻在观察政局的变化，以求一逞。武昌起义后他想利用清政府的困境，逼使它交出更多军政大权，故意称病不肯就职。11月初，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继湖北之后，湖南、江西、山西、云

南等省相继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1911年11月初，清政府决定取消“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同时公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表示立宪的“诚意”。这时接受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在湖北前线指挥北洋军作战的袁世凯，立即加紧对革命军民的进攻。黄兴在武昌起义后到了武汉，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指挥革命军迎击疯狂来犯的清军。

汉口保卫战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军民同清军战斗十分激烈的一役。革命军大部是招募的新兵。这支以武汉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人、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他们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怀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作战非常勇敢。10月16日，他们被调到汉口刘家庙一线迎击北洋军，革命军虽然缺乏训练，在清军猛烈炮火下，死伤很大，但是战斗意志仍然非常旺盛。19日革命军炮队轰倒刚开到刘家庙附近的清军兵车一列，革命军抓住战机勇猛冲锋。当地群众也拿锄头、扁担跟着追击敌人。火车内侥幸活命的清军纷纷爬出车窗逃命。清军顿时出现一片混乱，革命军乘胜追击到三道桥，把清军逼退到汉口一线。

汉口保卫战，革命军民奋勇杀敌，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但是由于北洋军队不断增援和民军指挥上的单纯阵地防御，因此经过艰苦战斗之后，11月2日汉口失守。清军攻陷汉口后兽性大发，大肆烧杀抢掠，完全暴露出大地主、大买办反动武装北洋军队的凶残本性。

汉口失陷，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11月27日，北洋军冯国璋部再次攻陷汉阳。正当武昌受到北洋军炮火严重威胁时，12月2日，苏浙革命联军在南京击溃了张勋、铁良等负隅顽抗的清军，一举光复了南京。长江下游重镇南京的光复，不仅鼓舞了武汉革命军民的斗争，而且对全国局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袁世凯为了控制当时的形势并实现他的反革命篡权野心，大耍反革命政治权术，在攻陷汉阳后，对武昌除以重炮轰击外，还发动了瓦解武昌军心的政治攻势。企图利用武昌革命政权迫使清政府让出更大权利，同时又以重兵压境威胁革命党人，使之就范。袁世凯在给冯国璋电报里曾毫不隐讳的供认说：“不夺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袁世凯在武昌革命政府和清政府之间，纵横捭阖的反革命阴谋，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武昌起义引起帝国主义极大的震动和不安。当时帝国主义分子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就怀着恐惧情绪说：“革命党在这里胜利了，整个长江流域都会起事，别处也可能闹起来。我们对北京的情况都很担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更担心的是通商口岸的税款落入革命党手里。他在给英外交部报告说：“一旦某通商口岸脱离清政府而落到革命党的手中，所收税款就听任革命党支配，税款就有被革命政府移作军用或应付其它迫切需要的严重危

险”。武昌起义后，湖广总督瑞澂逃上“楚豫”号兵舰，他请求英国兵舰阻止革命军渡江进攻汉口时，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商请英驻华海军总司令“给以他们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到10月16日，集中到武汉江面的外国军舰共达十三艘，虎视眈眈的注视着革命军的行动。英国怡和公司轮船替清政府装运军火，运送军队，德国军舰并公开向革命军炮击挑衅。

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它们之间矛盾重重，暂时还没有可能实行联合武装干涉。湖北军政府对外宣言，使帝国主义列强产生了新的希望。英帝国主义在华喉舌《字林西报》指出：“我们相信，这次革命后将有一个较好的政府。但将是经过改良的旧政府，而不会是革命的新牌产品”。

10月17日，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奉本国政府命令，照会湖北军政府“承认民国为交战团体”，并表示“严守中立”。帝国主义“中立”的阴谋，据江汉关税务司英人苏古敦在给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供认：“事实上，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帝国主义宣布“中立”不久，帝国主义大坐探、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就通过帮办税务大臣胡维德向清政府提出分化和消灭革命的一条“锦囊妙计”。他说：“我觉得政府军收复汉阳，主要是因为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军闹意见。……这件事说明各首不能长久合作，这样就给政府一个机会在敌



对的党派间打下楔子，离间他们，最后恢复自己的大权”。帝国主义企图在革命内部“打下楔子”的阴谋，由于江浙革命联军很快光复南京，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此后，帝国主义列强，明显地看出清朝政府实在不中用了，便采取了进一步更换走狗的伎俩，唆使大刽子手袁世凯出头作为绞杀中国革命的工具。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帝国主义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在北京就替袁世凯大肆吹嘘：“如果清朝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当袁世凯组成内阁时，英外交部迫不及待地表示了对袁世凯的热烈捧场。说：“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

袁世凯窃夺了清朝大权后，一面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向武昌轰击；一面频频写信派人对黎元洪进行议和试探。这时湖北军政府内部在袁世凯软硬兼施，一打一拉之下发生了重大分化。黎元洪因战争失利，竭力主张妥协。革命党人也存在严重分歧，孙武等人附和黎元洪力主议和，张振武等坚决要抵抗，表示与武昌共存亡。黄兴莫衷一是，竟搭船到上海一走了事。这时英国公使在袁世凯的要求下，授意给驻汉口的英领事，直接插手控制“和谈”。

12月1日，英领事派盘恩到武昌“商谈”南北双方停战条件。当时黎元洪已经溜到了葛店，由孙武、蒋翊武

分别同他谈判，最后在英国海军官员监督下，签订了“停战”三天的屈辱协定。期满后又续订了十五天的停战协定，于是全国注目的湖北战事，从此也就烟消云散了。

敌我斗争的关键时刻，湖北军政府内部由于立宪派、旧官僚串通一起，步步进逼和革命党人节节退让，妥协势力日益抬头，面临着新的危机。

## 八、南京临时政府和“南北议和”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海外筹款，在赴纽约途中，从报上看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精神十分振奋，决定马上回国。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孙中山从事革命多年，不顾政治风险，为革命到处奔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这时在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便改变原来关于“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决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同时还决议孙中山当选后致电袁世凯表示：袁世凯如赞成共和当即举袁为大总统，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指出：民国建立后的基本任务，对内“尽扫专制之流毒，确立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宗旨”，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他看到临时政府成立后，“艰难远逾

于前日”，号召一切革命者，“要保此革命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立于大地”，表现了孙中山勇于前进的革命精神和斗争胆略。临时政府成立，参议院也产生了。南京临时政府采取总统制。总统下设内务、外交、陆军、海军、司法、财政、交通、实业、教育等九部。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的重大措施有：

（一）、保护人民权利，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保护华侨，严禁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取消“贱民”限制，废除奴婢卖身契约。

（二）、革除社会陋习，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蓄辫和缠足。

（三）、奖励发展工商业，宣布振兴实业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章程、条例，鼓励兴办实业。

此外，还宣布了对外政策，重申帝国主义同清政府所订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对列强在华特权和利益表示一概尊重。希望借此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临时政府的承认。

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是近代中国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它的成立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同时也给封建帝制和最后一个反动王朝敲响了丧钟。到此，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内部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它的内部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君主立宪派和旧官僚政客等各种政治势力。革命民主派虽然居于领导地位，可是立宪派和旧官僚也掌握了内务、实业、交通等重要部门。政府部长九人当中，立宪派、旧官僚占六人。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而“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实际上并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帝国主义控制海关税款，拒不交出，各省（包括江浙财阀）也不合作，财政极端困难。南京临时政府不敢触动封建势力的根基，避开土地问题，空谈“扫尽专制流毒”，严重脱离群众。内部貌合神离，矛盾重重。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联合向它进攻时，它就完全处于无力抵抗的地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3月11日颁布了《临时约法》，它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同时还规定，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临时约法》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质的国家根本大法。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这部《临时约法》，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处于它的战斗的民主主义阶段。但是这部《临时约法》仍然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并不可能把对人民许诺的权利，真正兑现。

“南北议和” “南北议和”是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绞

杀辛亥革命的一项重大政治阴谋。

1911年12月初，南北双方停战，革命战争正式结束。12月18日，在帝国主义导演下，所谓“南北议和”正式开场。第一次会议，成立了湖北、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

“南北议和”一开始，帝国主义就通过他们的政治影响，压迫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妥协。

12月15日，北京外交使团举行会议，研究对策，采纳了俄国公使提出的建议，决定由各国公使向本国政府电商先采取步骤，对南方施加压力，促成南方向袁世凯的妥协。

20日，它们通过英、美、日、俄、法、德驻上海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指出：“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以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认为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

20日下午第二次会议时，伍廷芳代表南方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又表示只要袁世凯同意推翻清王朝，即以总统一职做为对袁世凯的报酬。北方代表唐绍仪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促使南方确认袁世凯的地位，“君主”或“民主”只是形式问题，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加以表决。12月29日举行的会议就开始了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讨论，次日，即签订召开国民大会的协议。

12月29日，南京代表会议决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时报告“南北议和”达成协议和孙中山“暂时承乏，虚位以待”的两封电报先后到达北京。袁世凯大为恼火，立即电致唐绍仪，以行动越权为借口，拒不承认。袁世凯扬言要用武力打垮南京临时政府，帝国主义者也出来帮腔，声称只有袁世凯统一中国，他们才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威胁下，不敢同袁世凯作坚决斗争。他们同意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条件是袁世凯承认共和，逼使清帝退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一方面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也同立宪派、旧官僚钻进革命队伍内部联合革命党中右派从中进行破坏有关。他们公开要求解散同盟会，指责孙中山“理想太高”，“贪恋禄位”。其目的都是要把政权从南方转移到袁世凯手里，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独夫民贼袁世凯悍然不顾社会舆论，在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指使冯国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以此对南方进一步施加压力。帝国主义同袁世凯紧密配合，公然做出武装干涉姿态来恫吓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英、美、日、德帝国主义军舰，一直在长江游弋；沙俄军队在东北北方窥伺；日本也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

部虎视眈眈。帝国主义在军事讹诈的同时，更无理指责“和议破裂，伍（指伍廷芳）与其党徒，实尸其咎”。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强加到革命党人身上。对真正破坏谈判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却称之为“公平正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一贯伎俩，不过在这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罢了。

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指出：（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请转知民国政府，或转饬驻沪各国领事转达亦可；（二）、袁世凯须同时发表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袁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后，即行解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五）、袁被举为大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约法》，始能接受事权。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明确保证后，决定用北洋军队这张王牌逼清帝退位。清政府皇族亲贵看到大势已去，为了取得退位优待条件，遂在二月初，令袁世凯同南京磋商退位问题。2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优待条件。12日溥仪宣布退位。袁世凯将“退位诏书”请各国公使转致各国政府，同时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政见。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袁世凯的甜言密语和虚伪表态欺骗了革命党人，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孙中山辞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

统。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中，为了防范袁世凯专权跋扈，曾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定都南京；（二）、大总统在南京就职；（三）、大总统应遵守《临时约法》。前两条是要把袁世凯调离北方，剪除他的羽翼。后一条是通过责任内阁制来束缚袁世凯的手脚。

当时北京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反动势力的政治中心，袁世凯绝不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职。于是他便以北方局势“不稳”为借口，坚持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通过要求袁世凯南下的决议，并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五人为迎袁专使。专使到京后，袁世凯又施展一套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上隆重接待专使，“诚恳”地与专使讨论赴南京路线；而暗则在2月29日则一手策划北洋军队在北京前门、东安门一带的纵火抢劫事件。蔡元培等人仓惶逃往东交民巷避难。接着，天津、保定、通州等地也发生类似的反革命暴乱。帝国主义趁机作出武装干涉姿态。日本首先调集军队一千多人在秦皇岛登陆，向北京推进。京津地区外国驻军也蠢蠢欲动。

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导演的这出政治双簧，果然产生了效果。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交出了总统权力。5日，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设北京。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反革命阴谋，于是得逞。



辛亥革命的历史至此也就基本完结了。

## 九、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三次革命高潮。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sup>①</sup>又指出：“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sup>②</sup>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历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创举。辛亥革命，提高了民主主义革命觉悟，开辟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在历史上是具有伟大功绩的。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

<sup>①</sup>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一四〇二页。

<sup>②</sup>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五二八页。

了。”<sup>①</sup>又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sup>②</sup>

中国从一九一一年把最后一个皇帝赶走以后，不管是袁世凯帝制自为也好，张勋复辟也好，以及后来的独夫民贼蒋介石，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他们的倒行逆施，结果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和人民的唾弃。辛亥革命后反动派的短命，说明一切反动势力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论它们背后有什么靠山，手里有什么新式武器，都注定要失败的。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派。从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再也无力重建“统一”的、“稳定”的反动统治秩序。中国人民每一斗争都日益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的危机，不断震撼和冲击反动统治的根基。

辛亥革命发生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它是继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在亚洲爆发的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不仅搅乱了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秩序，而且也给帝国主义东方阵线以致命打击，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越南、朝鲜、印尼、印度和菲律宾各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五九页。

②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六〇页。

革命导师列宁在中国辛亥革命后，怀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亚洲是世界风暴底新泉源”。“世界资本主义和 1905 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sup>①</sup>并满怀信心地说：“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民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sup>②</sup>

---

①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四八页。

②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三九页。

## 第九章 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 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的反革命专政** 每当一次大的革命运动或社会变革之后，总是要出现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大地主、大买办、大军阀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窃取辛亥革命成果之后，出于复辟的需要，在“中华民国”招牌掩护下，向资产阶级革命党发动了猖狂的反扑，为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政扫平道路。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扶植下，以北洋军队为后盾，窃取了北京中央政府及北方各省大权，可是他的统治地位还没有巩固下来，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南方还有七、八个省和十几万军队仍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党手里。面对着这种现实，富于反革命权术的袁世凯便打着“俯顺輿情”，“尊重民意”的幌子，采取“以屈求伸”的反革命策略，逐渐实现其政治野心。

同盟会转入公开活动后，大批官僚政客纷纷参加进来，内部更加涣散。1912年8月，在宋教仁等妥协派积极活动下，同盟会和当时一些官僚政客的统一共和党、

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协进会等合并，组成了国民党。这时孙中山在名义上虽然是理事长，而实际上国民党却掌握在宋教仁等人手里。国民党打出所谓“朝野合作”，“新旧合作”这面妥协派旗子，不仅完全抹杀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同反动官僚、政客的界限，而且变成了袁世凯统治下争夺权势的官僚政客集团。国民党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条与袁世凯妥协，并在妥协中求发展的错误路线，它比同盟会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

袁世凯为取消民主制，首先是向“责任内阁制”开刀的。袁世凯窃国后第一任内阁是1912年3月组成的唐绍仪内阁。唐绍仪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官僚，它的施政多少还反映了一些民主色彩。唐绍仪坚持《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命令必须国务员副署，否则无效的规定对袁加以牵制，遭到袁的嫉恨。1912年6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问题，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据此不经唐内阁副署面由总统发布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造成唐绍仪组阁不足三个月终于倒台的局面。这是民国以来袁世凯践踏《临时约法》和破坏责任内阁制的第一次丑恶表演。

新内阁一度陷于难产状态，袁便以其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从此，内阁便成了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工具。

唐绍仪内阁被一脚踢开后，袁世凯心怀鬼胎，急忙

发表通电，重申“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的誓言，向国民党声明仍“尊重”《临时约法》。袁世凯的欺骗，对国民党产生了麻痹作用。孙中山、黄兴等人一度模糊了对袁的认识，他们公开声明“尽让权于袁氏。”孙中山自愿以在野党身份筹划建设全国铁路，幻想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实现民主政治，贯彻民主主义。不久，黄兴也自动解散了原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撤消了南京留守府，表示拥护袁世凯。同时也助长了宋教仁等人的政党政治的幻想。

“宋案”和“善后大借款” 宋教仁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议会迷”。他企图在袁世凯的刺刀下，建立政党内阁，分取袁的部分权力。在宋教仁等奔走呼号下，通过竞选活动，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胜利。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

宋教仁忘乎所以，俨然以未来的“内阁总理”自居。正当宋教仁到各地发表演说，批评时政，自我陶醉时，袁世凯为了抵制国民党，积极策划把国会选举失败的三个政党，拼凑成为进步党，使它在国会中与国民党对抗，同时密遣特务，暗下毒手，决心把宋教仁置于死地。

1913年1月，北京政府宣布4月国会在北京开会。3月，宋教仁到上海组织国会欢迎团，主张在南京召开国会。3月21日，袁世凯在宋教仁乘沪宁车北上时，派凶手于上海车站刺杀了宋教仁。第二天宋伤重身死。宋教仁临死前还写信给袁世凯，表示“望总统开诚心，布

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说明宋教仁死到临头，仍对袁世凯抱有幻想。

“宋案”发生，震动全国。袁世凯假惺惺地电令江苏都督，“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4月26日，经过调查，“宋案”大白于天下，原来谋杀“主名”不是别人，就是民国总统袁世凯和总理赵秉钧。袁世凯狰狞、凶恶面目的大暴露，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也唤醒了一部分国民党员，抛弃了对袁的幻想。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更加疯狂地摧残民主制度，消灭政敌，加强其独裁统治。他决定依靠北洋军队，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这是袁世凯反对民主实行独裁的进一步升级。

4月，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订立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以盐税收入为抵押。帝国主义贷款给袁世凯除了榨取高额利润、控制中国财政外，更重要的是支持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借以在中国建立为帝国主义需要的“强权政治”，巩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革命导师列宁指出：“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的。”<sup>①</sup>

<sup>①</sup> 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五〇页。

《善后借款合同》刚刚订立，齐集北京参加国会的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对“宋案”和“善后大借款”，纷纷提出质问，要求立即废除借款合同。袁世凯对此毫不介意。一方面唆使进步党人同国民党对抗，另一方面暗中加紧军事部署。6月间，借口国民党李烈钧（江西都督）、柏文蔚（安徽都督）和胡汉民（广东都督）通电反对借款，以不服从中央的“罪名”，免去三人职务，并派遣北洋军队向江西进发，于是一场袁世凯削除异己的反革命内战，随之爆发。

宋教仁的惨死，和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惊破了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的迷梦，同时击碎了他们企图通过委曲求全的途径，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

## 二、“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正当敌人磨刀霍霍，反革命内战逼近的严重时刻，国民党内部却产生了重大分歧。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讨袁，“非去袁不可。”黄兴动摇于和、战之间，希望法律解决。汪精卫则反对武装倒袁，鼓吹与袁继续“合作”。国民党内部的涣散与分歧，给袁世凯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袁世凯看准了国民党的弱点，抓紧时机部署军队，秘密下了动员令。并制造反革命内战舆论，把罪责诿过于人。他扬言：“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



月9日，袁世凯经过周密部署后，派兵向江西猛扑过去。

一 7月12日，李烈钧于江西湖口誓师，首先树起义旗，宣布讨袁。南京国民党人接着进行武力声讨。上海、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也先后宣布讨袁。“二次革命”爆发，虽然声势不小，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严重脱离群众却使反袁斗争一开始就因为不能统一行动，处于单纯军事防御的被动地位。从7月12日，两军正式开战后，江西湖口的讨袁军，被袁军水陆夹攻，于7月25日败退。8月18日，袁军攻陷南昌，江西便为北洋军阀所占领。南京方面，因为一部分军队被袁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遂急调扼守临淮关的第八师回南京防守。在徐州与袁军对垒的讨袁军，后路空虚，退守临淮关。黄兴在7月29日潜离南京，江苏都督程德全又宣告取消讨袁。到9月1日，南京经过激战，终被袁部张勋夺取。上海的陈其美等也在8月13日弃吴淞炮台而去。安徽柏文蔚同样被袁军所逐。于是反袁战争，便宣告结束了。长江流域从此陷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指出：“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说明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有一定认识的。

“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保卫民主制度而进行的一场武装斗争。它虽然没有阻止住北洋军阀势力的南进和袁世凯在全国建立的黑暗统治，但是揭露了袁世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搞反革命独裁的丑恶嘴脸，撕毁了大独裁者的伪装。这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

**白朗起义** 袁世凯的卖国独裁打内战的反动方针，激化了国内社会阶级矛盾，促进了人民群众的反抗。

河南地区，白朗领导农民群众掀起的武装起义，就是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有力回击。白朗提出：“推翻袁世凯”和“政治革命”的响亮口号，揭露袁贼祸国殃民的狼子野心，开展了反对袁世凯和焚烧外国教堂、杀逐洋教士的武装斗争。这支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以不足三万人的兵力和二十万以上的反动军队对抗。从1912年到1914年8月，坚持了两年多的武装斗争，虽然最后遭到残酷镇压，但是它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支援了“二次革命”。表现出广大农民群众在辛亥革命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毫不妥协的鲜明政治立场和顽强的革命精神。

### 三、短命的“洪宪王朝”

**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加紧侵略** 英帝国主义在

1912年8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的无理要求，并以承认“中华民国”做为诱饵。1913年9月，根据英国的建议，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袁政府的代表在条约草案中向英国承认了“外藏”的“自治”。但在全国舆论愤怒斥责下，袁政府未敢正式批准。

沙俄在辛亥革命后，积极策划外蒙古王公贵族脱离中国宣布“独立”。1912年3月，沙俄强迫蒙古上层分子签订《俄蒙条约》。沙俄从此不仅掌握了外蒙古的经济命脉，同时控制了外蒙古的军队编制和军事设施。1913年，袁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签订了所谓《中俄条约》，向沙俄帝国主义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从此外蒙古陷入沙俄帝国主义魔掌之中。

辛亥革命后，沙俄还在我国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巴尔虎旗和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策动当地反动封建王公发动了叛乱。但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王公的支持下，先后被中国军队粉碎。老沙皇妄图把沙俄帝国的疆域扩张到中国长城脚下的迷梦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灭。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注视辛亥革命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日本一面表示“帮助”“二次革命”，允许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本活动；一面向袁政府表示“确有取缔乱党之意”。日本的反革命两面策略，加强了袁世凯卖身投靠日本的活动。袁世凯派特使去日秘密交涉的结果，

1913年，日本取得了满蒙“五路”<sup>①</sup>的侵略特权。

美帝国主义在1913年5月，抢先承认袁记“中华民国”，接着在1914年3月和袁政府签订合同，攫取到三都澳军港和马尾船厂的“修建”特权。因合同牵涉到日本在福建的权益，遭到日本反对而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袁世凯集中权力，主要依靠三个“法宝”。第一个“法宝”是军队。他利用北洋军队这支反革命武装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打败了南方国民党，镇压了农民起义。第二个“法宝”是“孔孟之道”。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和以往的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一样，尊崇儒家思想。1913年曾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在北京公开举行“祝孔典礼”，强调“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礼义廉耻”，“遏横流”，“正人心”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并批准尊孔派尹昌衡的关于“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的建议。在反动派倡导之下，于是出现了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袁世凯拾出孔老二亡灵的反动企图，正是用“孔孟之道”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替他的复辟帝制大造反革命舆论。第三个“法宝”，就是扶植死党，利用“帮闲”做为走向独裁专制的“阶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议由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既是他对进步党人在“二次革命”中替他效劳的“报酬”，也是他再

<sup>①</sup> 即四平到洮南、开源到海龙、长春到洮南、洮南到承德、吉林到海龙五路。

次利用进步党作为爬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工具。

进步党集中了早年的君主立宪派“名流”，他们是善于察颜观色，惯于政治投机的一批政客“闻人”。1913年7月，熊希龄组成的进步党人为骨干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正式登场。进步党要人梁启超、张謇等都以“第一流人才”和“社会贤达”资格入阁。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第一流奴才”内阁。

袁世凯早就想当正式大总统。他唆使其爪牙打出“公民党”旗号，在国会里提出“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怪论。国会议员早被军阀的枪杆子吓破了胆，明知袁世凯要作大总统，也随声附和，顺水推舟。10月16日，国会开会，决定正式“选举”大总统。袁世凯心怀鬼胎，深怕有些国民党议员与他为难，便聚集便衣军警数千人，扯起“公民团”旗号，在议员进入会场后，即将议院围得水泄不通，声称“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于是被人视为庄严不可侵犯的国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这些堂堂国会议员，如同囚犯一样，不准自由行动，他们忍饥挨饿，一天连续投票三次，从上午八时闹到晚上十时，才算结束了这场“选举”丑剧。

**袁世凯向民主制度的猖狂进攻**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立即向《临时约法》和国会发起攻击，他扬言《临时约法》对总统的权力“限制”过多，要在制定宪法前，修改《临时约法》。又唆使在各地的爪牙反对制定《宪法草案》，

叫嚣：所订的宪法，“妨害”国家者“甚多”，是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要求必须解散国会。11月，袁世凯假造证件，硬说国民党议员和讨袁军有过联系，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及其它跨党分子的议员证书，造成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名存实亡的局面。12月，袁世凯组成“政治会议”，明目张胆地篡夺了国会职权。1914年1月，经“政治会议”决议，并由熊希龄副署的解散国会的命令正式发表。于是“民国时代”的庄严立法机关——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宣判了死刑。熊希龄的进步党内阁，也被袁世凯一脚踢开。

宣布解散国会的命令墨迹未干，袁世凯决定进一步撕毁辛亥革命后留下的唯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象征的《临时约法》。三月间，“约法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即《民三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把总统权力扩大到最大限度。接着，又改革官制，废除了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与总统府。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置左右丞。又设立参议院代行立法机关的权力，参政则由总统任命。又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经过这样一番变动，旧制度相继恢复起来，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各项民主制度被摧毁得一干二净。从此，袁世凯由临时总统一变而为正式总统，再变面为终身总统和世袭总统。袁世凯彻底变成了独裁者。这个独裁者还要去掉“中华民国”这个空名，登上皇帝的宝座。于是，在辛亥革命打

倒了封建皇帝之后，又出现了一场复辟君主制的丑剧。

袁世凯在复辟帝制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侵略中国，它利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做为这场政治交易的条件。“二十一条”规定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及南满、安奉两路的限期为九十九年，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的特殊利益；还规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并享有附近矿山的开采权；明令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与他国。尤为严重的是，日本还有企图控制我国的政治、军事、财政以及警政的狂妄野心。“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吞并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宣言书，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二十一条”提出后，袁世凯称帝心切，竟不顾亡国灭种危险，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同日本公使举行秘密谈判。经过了几个月的交涉，日本竟以最后通牒方式逼令签字，5月9日，袁世凯同意接受除第五项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中日合办等以外的全部要求。

“二十一条”签字后，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大大小小的喽啰们大肆颂扬袁世凯的卖国“德政”。有的肉麻地吹

捧是“元首外交成功”；有的报纸还赞扬是中日“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甚至还有人主张举行提灯游行来庆祝卖国的“胜利”。

正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群魔乱舞的时候，中国人民高举反帝爱国旗帜，掀起了群众性的反日斗争。“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留日、留美的爱国学生，集会发表宣言，抗议日本的侵略，准备回国宣传武力抵抗。上海人民纷纷结成团体，大力宣扬抗日救亡主张。上海张园召开了有三、四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议决拒用日货，实行经济抵制。汉口经常有人散发传单、抵制日货和砸毁日本商店。烟台人民“相戒不卖货物给日人”。厦门有禁用敌人通货的檄文散布各处。福州从3月26日起，市场一律拒绝使用台湾银行发行的支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卖国的群众斗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正是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才使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没有能够得逞。

**短命的“洪宪王朝”** 袁世凯所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是同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分不开的。沙俄反动分子盖沙令，这时跑到中国，到处鼓吹“孔教”，胡说“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国家新命之所托”，宣扬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美国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袁世凯政府的宪法顾问古德诺也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篇奇文，污蔑中国“民智低下”，人



民“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别有用心地说“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盖沙令、古德诺之流的狂吠，完全暴露出帝国主义替袁世凯称帝大造反革命舆论和仇视中国进步的反动本质。帝制活动，既有了“洋大人”的热烈捧场，袁世凯的党徒，当然更不能落后。紧接着鼓吹帝制的团体，纷纷出笼。其中筹安会更是善于揣摩袁世凯急于称帝的迫切心情，摇唇鼓舌，争夺拥戴首功。筹安会是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一批袁世凯心腹，老君主立宪派和革命叛徒、无耻文人拼凑在一起的一个所谓“学术”团体。他们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卖命地鼓吹帝制，颂扬袁世凯的“盛德”。其它什么“公民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以及各省军阀、袁派官僚五光十色的团体，也纷纷出笼。买办官僚梁士诒看风使舵，乘机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策划帝制活动。10月初，参议院在所谓“请愿联合会”的一再催促下，决议以“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改行君主政体。10月下旬，选出各地“代表”，并在当地举行投票。11月中旬，各省投票结束，“全部”同意改行君主政体，并以相同的词句“委託”参议院为“国民”的“总代表”，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经过一再“劝进”，袁世凯才表示接受推戴书。12月13日，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对黎元洪等一百二十八人加官进爵。12月31日，宣布将中华民国六年改为“洪宪”元年，并要在元旦那天举行正式“登

基”大典。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和他的御用工具鼓吹下，复辟帝制活动达到了最高峰。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激怒了全国人民，促进广大群众纷纷走向反对独夫民贼的斗争道路。

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团聚了国民党中的激进分子，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从“二次革命”失败中，痛感恢复革命精神的重要。提出“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准备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中华革命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力图重新举起资产阶级革命旗帜，这是可贵的。但是，它并没有提出足以动员广大群众的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而且在组织上还陷入浓厚的宗派主义小圈子，严重脱离群众，因此不可能把全国反袁斗争真正领导起来。

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组成了“欧事研究会”。他们在政治上接近进步党。在反对“二十一条”时，主张停止反袁，一致对外。袁世凯称帝时又联合原来国民党议员和进步党进行反袁斗争。“欧事研究会”不但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而且在反袁问题上出尔反尔，随波逐流，因此在群众中影响不大。

进步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伙善于政治投机的“变色龙”。他们看到全国形势剧烈动荡，袁世

凯急于称帝将危及整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认为称帝条件并不成熟。几经劝告袁世凯“稍假岁月”，延缓称帝日期。但是袁世凯一意孤行。进步党梁启超等人，看出不久形势必将大变，深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袁世凯同归于尽，于是决定把反袁斗争的领导权抓到手里，企图控制反袁局面。他们是一批不掌握枪杆子的政客、文人，但也懂得枪杆子的重要。他们狠抓领导权的活动，首先就是从联络西南军阀，策动武装倒袁开始的。

帝国主义出于本身的政治需要，时刻在注意中国政局的变化。随着帝制公开进行和全国反袁斗争形势的日趋高涨，列强对袁世凯帝制活动的态度，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英国本来支持袁的帝制活动，但因欧战正酣，中国人民反袁斗争的日益发展，非常担心影响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优势。因此希望袁世凯不要走的太远，以免酿成“巨变”。

美国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一贯是积极怂恿和支持的。但在日本出兵占领山东，取代德帝国主义在华战略地位时，深恐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扩大更多侵略利益，影响美帝国主义在华地位。加以欧战日益升级，中国形势难以控制，它也没有能力来挽救袁世凯的复灭命运。

日本在“二十一条”签订后，看到袁世凯并不是一个真正“强者”。随着袁氏帝制活动的展开，它的统治地位

岌岌可危。他们认为袁世凯主要依赖于欧洲列强，对此心怀忌恨。决定采取制造中国内部纷乱从中取利的办法，既不放松对袁的约束，又鼓励和“帮助”反袁力量，扶植亲日势力。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左右逢源的侵华方针，确是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危险性。

国内外复杂的斗争形势，加速了袁派内部的分崩离析。

北洋军阀内部靠着封建关系维持它的“团结”，北洋军将领地位的升降以及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势斗争，日益破坏着这种虚假的“一致”。

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两大实力台柱，具有继承袁世凯地位的趋势。他们对袁的态度影响到其它北洋将领的态度。帝制活动开始前，段、冯屡次试探袁的本意，都被袁巧言欺骗蒙在鼓里。帝制活动紧张进行时，袁世凯怕二人势力尾大不掉，日后难以控制，就开始对他们疏远疑忌。而帝制一旦成为现实，段、冯便完全丧失继承袁世凯大总统地位的可能。他们不安于久居袁氏臣仆地位，因此对袁的帝制自为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当全国反袁斗争日渐高涨时候，他们又怀疑袁氏一意孤行，势难持久。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扩大，裂痕加深，乃是全国人民反袁斗争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于反袁斗争的进行是有利的。

进步党利用全国反袁斗争一触即发的有利时机，加

紧同云南、贵州等西南军阀联络，很快结成了反袁联合阵线。1915年12月，经过梁启超等人的策划，蔡锷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联络滇军中下级军官，迫使唐继尧起义。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总司令部，发动武装讨袁。

云南护国军起义消息，惊破了袁世凯的“登基”迷梦。12月26日，袁世凯下令展期“登基”，并调令曹錕、张敬尧军队进攻四川。妄图抓住北洋军队做为救命稻草。

1916年1月，贵州宣布“独立”；3月，广西宣布“独立”；4月，广东“独立”。长江方面的冯国璋也袭用袁世凯故伎，大搞反革命两面手法，联络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联名争取其它省共同要求取消帝制。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令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任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的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没有终场就停锣辍鼓了。

帝制撤消后，袁世凯抓住大权不放，继续要保持大总统地位。他指使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对“护国军”发出通电，表示“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这个通电如同废纸一般已经再不被人们重视了。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也积极发动反袁斗争，在山东、江苏、湖南等省策动武装讨袁。1916年6月，湖南武冈农民群众揭竿而起，猛攻县署，打破监狱，

释放囚犯。湖南新化锡矿工人也举行罢工，部分工人赶到山右长龙界，夺取新华昌公司矿警的枪枝，宣布工厂独立，悬挂“护国军”旗帜。原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等，以十九省“公民”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再当总统。向人民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号召再接再厉，共同“捕杀此獠。”全国各地更是发表通电，愤怒声讨袁贼“背叛共和，谋窃帝制”的罪行，主张“一致倒袁”。海外华侨也强烈要求审判独夫民贼袁世凯。

5月22日，袁世凯嫡系将领、亲信爪牙陈宦宣布四川“独立”。29日湖南又宣布“独立”，袁的另一条忠实走狗汤芑铭也起来反袁。6月1日，在全国人民怒吼声中，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袁世凯结束了他的反动一生。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sup>①</sup>

袁世凯从1915年12月31日接受“推戴”到1916年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前后不过八十三天。“洪宪”王朝的短命说明辛亥革命以后，搞复辟，开历史倒车，逆潮流而动的一切反动派，不管背后有什么“靠山”，不管他们多么狡猾多端，注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被人民所抛弃，绝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

<sup>①</sup>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九五页。

#### 四、张勋“复辟”的前后

**北洋军阀的分裂和割据**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失去共同统治中国的工具，北洋军阀也失去了它的主宰。随着帝国主义各自寻找和培植自己的走狗，引起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政局更加动荡纷乱。中国开始进入军阀割据与混战时期。

北洋军阀系统中，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存在着皖系和直系两个主要派别。袁世凯死后，两派的分裂进一步具体化和表面化。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欧战时期，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扩大，皖系军阀势力也膨胀起来。段祺瑞盘踞北京政府，控制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广大地盘。他利用把持中央政府的地位扩张势力，排斥异己，俨然以袁世凯的当然继承者自居。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地盘，据有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实力仅次于皖系。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原来仅在辽宁一带。“护国”战争时，张作霖乘机驱逐袁世凯在东北势力，把奉系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它在日本帝国主义豢养下，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山西省阎锡山、徐州地区张勋等大小军阀，他们割据一省或一省的某个地区，虽然不是北洋嫡系，但与北洋军阀互通声息。当时，全

国除了西南六省外，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

西南各省也处于军阀的控制之下。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是以唐继尧为头子的滇系(云南)军阀，一个是以陆荣廷为头子的桂系(广西)军阀。滇系军阀控制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桂系军阀在“护国”战争时赶跑了广东军阀龙济光，也盘踞两广地区。滇系、桂系军阀接近北方的直系，附属于英、美帝国主义势力。

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2月，段祺瑞内阁正式组成。

国会恢复又为官僚、政客提供了一个争权夺位的舞台。国会中，旧国民党议员和进步党议员人数最多，勾心斗角，彼此对立。旧国民党议员这时又分裂为以谷钟秀为首的“政学会”(即“政学系”)，以张耀曾为首的“宪法商榷会”和以张继等为首的“益友社”，以王正廷为首的“政余俱乐部”。进步党唱出“不党主义”高调，取消了党的名义，分裂为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和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讨论会”。这些集团各自为了权势地位进行着斗争。

“府院之争” 段内阁组成，标志着皖系军阀势力的上升。段祺瑞既有日本帝国主义做靠山，又有北洋军队为后盾，趾高气扬，专断独行，把没有实权的总统黎元



洪根本不放在眼里。段祺瑞的飞扬跋扈引起了黎元洪集团的不满。黎元洪为了打击段的气焰，便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勾结国会中的“宪法商榷会”部分议员和段明争暗斗。段祺瑞则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和“宪法研究会”议员申通一起压制黎元洪。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府院之争”）的焦点是中国参加世界大战的问题。

1917年2月，德国宣布以潜艇无限制封锁公海，美国鉴于时机成熟，立即对德绝交，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同它一致行动。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和太平洋霸权，得到英、法、俄、意的所谓“谅解”。日本对中国参战问题便从反对到赞成。段祺瑞企图从“参战”下手取得日本的借款和军火，扩大自己的势力。日本则想通过中国“参战”进一步控制中国。但美帝国主义看到日本积极唆使段祺瑞政府参战大有独霸中国趋向，基于它本身的利益，又主张中国暂时无需对德宣战。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参战问题态度的变化，使“府院之争”更加激化。

1917年4月，段祺瑞在北京召集了“督军团”会议。“督军团”在段的指使下向黎元洪和国会频频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同意参战。

5月，国会开会辩论参战问题。段祺瑞再次效法袁世凯故伎，唆使军警、特务、政治流氓、失业游民等二千多人打着“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等等旗号，包

围了国会，殴辱议员。狂叫“国会必须当天通过参战案”。段祺瑞及其党羽这种蛮横、暴虐、摧残议员的暴行，不但使原来反对参战的议员更为愤慨，甚至也使一些赞成参战的议员感到羞愤难当。多数议员在气愤下拒绝开会讨论。段内阁中的非皖系阁员也相率愤而辞职。段祺瑞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联合研究系议员，唆使“督军团”内外夹攻，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也不甘示弱，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院总理职务。“府院之争”达到了空前炽热的阶段。

段祺瑞决心用武力继续把持中央政权。当天就到天津发表通电，策动各“督军团”反对黎元洪和国会。皖系和追随皖系的督军在段唆使下，纷纷宣布“独立”。通电声明要率军“直捣京师”，实行“兵谏”。这时黎元洪孤立无援，感到压力很大。先请徐世昌出来调停，老奸巨滑的徐世昌在关键时刻不肯相救，又吁请研究系头目梁启超来京调处，梁则以“退处海滨，与世暂绝”婉言谢绝。黎元洪在痛苦徬徨之际，张勋派人到京表示“总统若令我入京，愿任调停。”黎元洪立即同意张勋率“辫子军”到京，稳定自己的地位。

**张勋复辟** 张勋在民国年代是个臭名昭著的封建余孽。他为了“重整清室”的反革命复辟“大业”，自己和他的军队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保留着发辫，是一个顽固不

化的复辟派。

1917年5月间，张勋召开“督军团”徐州会议。会上决定先由参加会议及有关的各省督军宣布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伪装“调停”诱使黎元洪接受“督军团”的要求，使其威信扫地，然后驱黎，迎接废帝溥仪复辟。

6月上旬，张勋到了天津。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授意，表示与张“合作”，企图用张勋的武力赶走黎元洪，造成“东山再起”机会。张勋被复辟热涨昏了头脑，就在天津电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在当时本已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又在张勋压力下，6月13日正式宣布第二次解散国会。次日，张勋率“辫子军”到京。康有为也赶到北京共谋复辟。同年3月，康有为向北京政府吁请全国仍行跪拜礼，并发出“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等荒唐无稽的尊孔谬论。许多封建遗老遗少和形形色色的复辟派在张勋和康有为的蛊惑下蠢蠢欲动，于是继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又一出复辟丑剧宣告粉墨登场了。

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从紫禁城里拥出废帝溥仪正式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发布一连串“上谕”。北京不仅悬挂了龙旗，在街头又出现了穿着清朝袍褂，装着真假发辫的“大清皇帝”的臣子。

张勋这一小撮复辟派的令人作呕的丑行秽态，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7月3日，湖南长沙召开拥护共

和、反对复辟的大会，到会者约万余人，群情激愤，严厉声讨张勋的反革命复辟罪行。有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个字，以示同复辟派誓不两立。上海资产阶级也悬挂五色共和国旗，反对复辟。在复辟策源地北京也有部分报刊，当天宣布停刊，表示抗议。

孙中山获悉张勋复辟消息后，立即在上海开会决议声讨，并派军舰赴秦皇岛接黎元洪到南方，准备成立新政府，同北京的复辟王朝对抗。

段祺瑞在日本一百万元的财政“资助”下，以张勋复辟为出师借口，与冯国璋联合宣布张勋的“祸乱民国，复辟帝制”的罪行，组织“讨逆军”，在天津马厂“誓师”，12日逼进北京。张勋的辫子军立即溃散，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短短的十一天复辟政权，也就付诸东流，烟消云散了。从此，北京政府的大权又落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

张勋复辟败亡的历史再次说明，凡是被打倒的或行将灭亡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总是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并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但是，反动派的复辟，总是转瞬即逝的。因为世界的进步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改变的。

7月14日，段祺瑞到北京，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资格，重新回到国务院总理宝座，掌握了中央政府大权，并组成了以皖系、研究系的封建买办官僚内阁。直系军

冯国璋继任为总统，但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和影响远不及段祺瑞。

段祺瑞第二次攫取到中央政权之后，把他的反革命统治的重心，进一步放在武力“统一”中国上面。为了对内建立一个军事独裁的政权，他不惜彻底出卖国家主权，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爪牙。8月，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既满足日本侵华利益，也符合接受外援、编练军队，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

段祺瑞政府参战后，向日本大举借款，组成“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从1917到1918两年中，日本用各种名义借给段祺瑞政府的款项总数达五亿日元。这些借款大部分是通过日本政客西原龟三之手，所以又叫做“西原借款”。段祺瑞为了取得日本的巨额借款，决定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侵略利益，把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以及满蒙五路，吉、黑两省金矿、森林抵押给日本。甚至还让日本派遣军官训练军队，掌握对参战军的指挥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段祺瑞这个大卖国贼又与日本订立了以反苏为目的所谓《中日军事协定》，短期内进入东北的日军达到七、八万人，日本迅速代替了沙俄在东三省的侵略地位。段祺瑞骇人听闻的卖国罪行，使中国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为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1917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石井订立“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

日本再次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日两个强盗公然拿中国主权做为相互勾结妥协的条件，进一步暴露了美、日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狼子野心。

段祺瑞政府的对内专制、独裁、摧残民主；对外疯狂卖国，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工具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18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游行抗议段祺瑞和日本反动当局的“军事协定”，遭到日本政府的殴打逮捕，他们纷纷罢课回国，组织救国团体，进行爱国宣传。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奋起要求废约，反对日本侵略和段祺瑞的疯狂卖国。

## 五、孙中山号召下的“护法运动”

“护法运动” 段祺瑞再次总揽中央大权之后，便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资格勾结研究系政客，彻底抛弃《临时约法》摧毁国会，另行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做为御用工具，进一步导演一出假共和真独裁的活剧。

孙中山是“临时约法”的真正缔造者。他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立场，竭力反对段祺瑞披着共和外衣，大搞专制独裁。他指出：“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虽美，其实尤窳，民国之名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有力的戳穿了段祺瑞摧残《临时约法》解散国会的罪恶目的。

滇系、桂系等西南军阀，这时对段祺瑞的专权跋扈也纷纷表示抗议，他们通过宣布“暂行自主”来和皖系对抗，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1917年7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亲自率领脱离北京政府而赞成“护法”的海军舰队南下，联合西南各省宣布“暂行自主”的军阀政客实行“护法”。于是一场以维护《临时约法》为直接目标的“护法”运动，正式揭开了序幕。

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9月，正式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任副元帅。“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反段“联合阵线”的形成，和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局面的出现。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依靠的主要力量是西南军阀和一部分从北京随他到南方的旧国会中商榷系和政学系的议员。西南军阀所以卷入“护法运动”，主要企图是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向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当这笔政治交易得手时，他们就随时准备把孙中山排挤出去，甚至加以无情地打击。因此反段“联合阵线”并没有巩固的基础。

“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政府决定采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反动方针，妄图实现建立皖系中心的全国反动统治的野心。

这时，冯国璋提出“和平统一”口号，与段的“武力

统一”相对抗，并命令进入湖南的军队采取消极观望态度。11月，湖南的直系军队竟自动退兵，发表“停战宣言”。段祺瑞还勾引奉军进关，对冯国璋施加压力。接着又采用分化瓦解策略，促成直系内部的瓦解。段以副总统禄位和两湖地盘作钓饵，引诱直系军阀曹錕进兵西南，但又不放心，于是又任命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段祺瑞的出尔反尔，使曹錕、吴佩孚与段的矛盾又逐步发展。1918年6月，吴佩孚同“护法军”订立了“停战协定”。8月，吴佩孚通电全国，发表“和平”主张。直系军阀联合西南军阀，反对皖系、奉系军阀的斗争，集中地反映出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激化。

正当直皖两系军阀明争暗斗相当激烈的时候，护法军政府内部由于西南军阀向直系靠拢，阴谋排斥孙中山，也发生了重大的分裂。1918年2月，西南各省军阀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对抗。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反段联合阵线彻底破裂。7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改组，废除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孙中山虽被列为总裁，但实权都由陆荣廷把持。孙中山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至此，“护法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军阀割据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各派军阀在卖国投靠帝国主义的同时，对国内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军阀间长期混战，给中国



人民造成倾家荡产，颠沛流离，甚至大量死亡的惨剧。1918年12月，仅湖南醴陵一地，由于军阀混战，被害的有四万七千九百零一户，死伤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九人（其中被杀二万一千五百四十二人）。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袁世凯窃国开始，到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出现为止，总共有十五年历史。这十五年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纷争不已，造成中国政局的动荡，社会经济凋弊，人民极端痛苦。军阀混战时期，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也象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从1912年到1928年，仅仅十六年当中就更换了四十届内阁，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六天。

伟大领袖毛主席针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反动派的衰亡史，深刻地揭示了一条规律。指出：“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sup>①</sup>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彻底破产。也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完全陷入绝境。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做出了卓越贡献。辛亥革命果实，为独夫民贼袁世凯窃取之后，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

---

<sup>①</sup>《人民日报》，1975年3月1日

维护共和国的命运，保卫民主制度，曾奋不顾身地展开了多次的斗争。孙中山从自己的斗争经历中，企图不断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但是怎样才能不蹈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的覆辙？怎样才能正确区分敌我？怎样才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依靠群众夺取真正的胜利？……一连串的问题，还不可能获得明确的回答。这个事实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了。

历史实践证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sup>①</sup>这就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结论。

---

<sup>①</sup>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六〇页。

## 第十章 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资产阶级先后组成各种实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等。这些团体以“发展工业，振兴民生；挽回利权，抵制外货”为宗旨。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有利时机。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sup>①</sup> 同时期，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扩张经济侵略势力，但是中国人民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和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运动，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

---

<sup>①</sup>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五九〇页。

发展。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速度较快，时间持续较长，而且方面也较广。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十九年间，开设厂矿共五八三个，投资总额为一亿二千万元，平均每年开设厂矿三十个多一点，每年平均投资为六百三十余万元，而1914年至1919年六年间，新设厂矿共三百七十九个，投资总额为八千五百八十万元。建立厂矿数和投资额，都有显著的增长。

轻工业仍然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中心，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最为突出。

在纺织业方面：1911年全国有华商纱厂二十家，纱锭约五十万枚，资本一千七百万。1919年增至三十余家，纱锭六十五万枚，投资总额达六千多万元。机器染织厂和针织厂，1911年前不过各有三、五家，到1919年分别增至十余家。缫丝厂在1911年有二百六十余家，到1917年增至四百六十余家。丝织厂到1919年已有七十余家，并开始使用电力织绸。

面粉工业增长的幅度也是可观的。1911年全国面粉厂和机器磨坊约有四十家，到1919年增至一百二十余家，资本从六百多万元增至四千五百万元，每昼夜生产面粉的能力，从四万三千余袋增至十八万八千余袋。在大战期间，中国面粉畅销英、法、美、俄、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在对外贸易中面粉由战前的入超变为出超，1919

年出超额超过一千万海关两。

火柴工业发展的也很快。1911年全国有火柴厂三十家左右，资本一百八十余万元。到1919年增加到近九十家，资本达七百余万元。

此外，毛纺织、碾米、榨油、罐头、造纸、玻璃、肥皂、制革等轻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国家是很难得到发展的，但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侵略的间隙中，中国重工业也有一些发展。

钢铁冶炼业除原有的汉冶萍公司在1914年新建大冶铁厂外，先后兴办了五个钢铁厂。1916年成立了龙关铁矿公司，资本五百万元。1918年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建厂。1917年在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资本五十万元。

采煤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全国华资煤产量由1912年的八十余万吨到1919年增至三百三十余万吨。

轮船航运业在1911年有轮船九百只，运输能力九万吨，到1919年轮船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只，运输能力达十五万吨。在这个期间成立了中国轮船公司和中华航运公司。

银行业，1911年有华资银行十五家左右，到1919年增至六十余家，全部资产达五亿元以上。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特点。

第一，中国近代工业，主要还是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的基础依然极其微弱。重工业企业数量不多，规模较小，机器制造业几乎还没有建立。中国民族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仍然没有改变。

第二，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投资总额中外国资本的比重仍然大大超过本国资本。如钢铁方面，日本资本直接控制全国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又通过贷款方式控制了百分之六十九。煤的生产，外国资本直接投资以及通过贷款控制了全国机器采煤量的百分之七十五。陆路交通方面，中国铁路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占有百分之九十，水路交通方面，1918年外国轮船占百分之七十七·一。在轻工业中，外国资本势力也相当庞大：棉纺织业中，外资纺织厂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的纱锭数和百分之五十九的布机数。在帝国主义投资设厂竞争和贷款控制之下，不少中国工业厂商或者被收买、吞并，或者不得不停工、倒闭。在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三，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着显然的优势。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削弱了农村购买力，严重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和市场。苛捐杂税的剥削也限制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民族资本往往又要靠军阀官僚的政治保护和投资。因而，中国民族

资本与本国封建势力仍然保持着又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全国性的抵制外货运动。但是，中国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手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不可能有坚决的反抗行动。

##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特点**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建厂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很快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五十万至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三百万人。其中铁路、邮电工人约二十万人，工厂工人约一百一十万人，矿山工人约八十万人，海员约十五万人，码头工人约三十万人。

毛主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突出的优点。”<sup>①</sup>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

---

<sup>①</sup>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六〇七页。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把中国工人当做奴隶，剥削率高得惊人。中国的“官办”企业，把工人当作“官奴”，封建的管理制度和剥削极为苛刻。中国的资本家，为了同外国资本竞争，更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中国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一般是十一、二个小时，多达十六小时以上。工资之低是世界上少有的。重体力劳动的矿工工资，每天平均两角多钱，一般产业工人的工资每天只有一、二角钱。女工和童工则更少，只有五分至一角。

中外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大量招雇童工和女工。在上海的丝厂里，六岁的童工要做十二小时的工作。在开平煤矿，十五岁的童工，要在井下劳动十六小时。女工不但受着同工不同酬的剥削，而且还受着“抄身制”的污辱。

在旧中国的工厂、矿山里，普遍地存在残酷压榨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和包身制。大大小小的封建把头，用克扣工资、借故罚款、放高利贷、设赌抽红、强迫工人送礼等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工人们终年在把头的皮鞭、棍棒的监视和毒打下，进行奴隶般的劳动。被包身的工人，不仅工资被剥削，连一点人身自由也没有。

在近代的工矿里，工人们健康和生命安全丝毫没有保障，职业病和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如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抚顺煤矿，在1913年，伤亡事故达二千九百一十



八次，死伤人数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差不多占矿工的一半。1917年1月11日，一次爆炸事件，就死亡工人九百多名。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开滦煤矿，井下发生塌陷事故时，矿方救马急于救人，因为死一匹马价值一百八十元，而死一名工人只给四十元的“抚恤金”。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工人的生命，不如牛马。

中国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权完全被剥夺了。

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剥削和压迫的严重性与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sup>①</sup>

第二，中国工人非常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sup>②</sup>在地区上，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沈阳、广州、香港等大城市，每地都集中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在行业上，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造船、纺织以及卷烟、火柴、丝织业中。在这些企业和大城市中，大企业的工人数又占了全部工人数的极大比重。工人阶级的集中，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容易表现，斗争智慧和力量容易集中，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六〇七页。

②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八页。

第三，中国工人和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是从农村和手工业作坊游离出来的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同广大的农民及其他劳动者有天然的联系。所以，中国工人阶级越壮大，他和农民的联盟也越加亲密，所联系的社会力量也越是广泛。

**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不懈地进行英勇的斗争。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利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也越加严重。军阀政府先后颁发了《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等反动法令，大大限制了工人的活动，更使工人陷入毫无自由权利的境地。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更加沉重了。这就激起了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的高涨，阶级觉悟在斗争中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工人出现到1911年，大约七十年间工人先后罢工一百多次，其中1905年至1911年占二分之一还多，平均每年八次。以1912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罢工共一百三十多次，平均每年十八次。

工人们罢工斗争主要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和反对资本家和工头们的压迫。1913年1

月，北京邮政工人为反对增多送信次数而罢工。1914年10月，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宁波籍海员为响应一部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总同盟罢工。1915年4月，湖南乾成大王岩煤矿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延长劳动时间，举行罢工。同年7月，苏州全城丝织业三千名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同盟罢工。1916年3月，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举行罢工，捣毁印刷局，夺取前来镇压罢工的警察的枪械。1917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因厂方无理解雇工人而罢工。中华书局和其他印刷厂工人举行支援罢工。同年7月，上海又爆发英美烟厂工人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三千人，坚持了三个星期。从1918年4月至1919年5月，仅上海一地的纺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撤换工头等，就发生了三新纱厂的两次罢工，上海第二纱厂的两次罢工，日华纱厂四次罢工和厚生纱厂数千工人的大罢工。这些罢工都是要求改善生活的阶级斗争，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地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卖国的斗争。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16年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工人阶级不但成了这两次运动的主力，并

且用同盟罢工，把斗争推向高潮。在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运动中，许多地方的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上海所有日本企业的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这个斗争。

老西开靠近天津的法租界，法帝国主义早就想霸占此地。1915年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法国公使乘机向中国军阀政府提出侵占要求。卖国军阀政府表示“未尝不可”。法国领事据此即私立木标，捣毁中国警察局，于1916年10月强占了老西开。法国帝国主义这一强盗暴行，立即遭到了天津工人的反抗。以工人为主的天津广大群众，召开大会，对法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法租界的中国工人，一致举行同盟总罢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组织了“工团”，成立了“工团事务所”，指挥罢工，领导示威游行。这次罢工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支援，最后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把老西开地方，划为“中法共管”。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显示了伟大的力量。

工人阶级罢工斗争日益高涨和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力量，引起社会各阶级的注意和重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反动阶级屡次派军警来镇压罢工。资产阶级妄图控制罢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提高了觉悟，互相支援举行总同盟罢工，成了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中的重要特点。在斗争中也开始组织一些工会。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斗争中壮大，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迅速

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将勇敢地担负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领导中国人民，把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引向新的阶段。

### 三、打倒孔家店

**尊孔复辟的逆流** 辛亥革命后，以北洋军阀为中心的反革命复辟势力，卖身投靠于帝国主义，妄图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建立更加黑暗的独裁统治。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反革命逆流。

袁世凯上台以后，丧心病狂地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竭力提倡尊孔读经，妄图利用孔老二的亡灵为其复辟帝制大造反革命舆论。1913年他发布《通令》说：“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祝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同年10月，在《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他又狂热吹捧“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在袁世凯制定的《教育纲要》中又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至其用”。在反动势力庇护下，保皇党头子康有为，从1913年起在他主编的《不忍》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宣扬民主共和的破产，表示不忍“纲纪之灭”，“国粹之丧失”，胡说什么：“中国之人口、风俗、礼仪、法度，皆以孔教为本”，并上书袁世凯，建

十三  
议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过去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闻名的严复，这时不仅彻底向封建主义投降，滚入复古的逆流，而且成了复辟帝制的积极倡导者。

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也竭力鼓吹尊孔复古。1913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鼓吹什么：“孔教昌则民国愈固”，让北洋军阀反动政府规定攻读《四书》、《五经》。同年，英国威海卫区行政长官约翰斯顿公然发出《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胡说“保存民粹，盖中国今日所不可不急行提倡之事”。1914年，沙俄侵略分子盖沙令到处游说，鼓吹“孔教”，大弹尊孔亡华滥调。

在袁世凯等支持下，大批封建余孽纷纷登场，于是出现了“孔教会”之类的组织。1913年陈焕章等人拼凑了一个“孔教会”，出版《孔教会杂志》，用孔子纪年，以“大倡孔子之教，保存国粹，发扬国性”为宗旨，以达到“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的反革命目的。反革命尊孔气焰十分嚣张，一时鬼神迷信之说，大为流行，《灵学》杂志也公然在上海出版了。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向中国人民的恶毒进攻，企图用孔老二的亡灵腐蚀群众抵制民主思想，来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

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①

**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 面对这股复古尊孔的反动逆流，除了孙中山等少数人外，资产阶级当中多数人己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或涣散消极了，他们在反动复古逆流的反攻下偃旗息鼓，败下阵来。

但是，这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成长壮大，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求摆脱封建势力束缚。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不断发展，反复辟、反尊孔的斗争更加尖锐、深刻和激烈。于是一些急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新文化运动。

什么是新文化？毛主席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又说：“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 and 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②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五页。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六五五——六五六页。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开始的。它的代表人物当时主要有鲁迅、李大钊等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当时提倡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旧道德。提倡科学，就是提倡自然科学知识，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

当时封建军阀恢复帝制，复古分子反对共和。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所以，新文化运动很快就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孔老二和他的学说。树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两千年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孔教，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这场斗争中，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当时冲锋陷阵的最勇敢的战士。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一直做教育工作。1918年4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对封建主义的宣战书。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极其犀利的文笔通过对“狂人”的描写，对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旧礼教发动极为猛烈的进攻，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淋漓尽致地刻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嘴脸，撕下了封建礼教伪



善的画皮。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历史。他假借一个“狂人”的口吻满腔愤怒的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那些吃人的家伙，“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嘴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装着吃人的意思”。鲁迅不仅透彻无情的揭露摆人肉筵席的黑暗现实，而且决心消灭这摆人肉筵席的政治制度。他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写了《我之节烈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从封建社会中妇女遭受压迫摧残的事实，愤怒谴责了竭力维护封建礼教，“表彰节烈”的“业儒”不过是带着“虚伪的脸谱”“制造并尝玩别人痛苦”的强盗。他指出节烈是“无益于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坚决表示：“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尝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封建礼教是压迫劳动人民的毒辣手段，孔孟之道是欺骗人民的麻醉剂。鲁迅有力地批判了封建道德，深刻

地揭露了旧礼教的罪恶。鲁迅这种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伟大旗手。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战斗口号，使文学也出现了一次革命。在文学革命中，鲁迅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和白话文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在文学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革命精神，为中国新文学打开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鲁迅写了《孔乙己》和《药》等小说，用新文学的武器向封建势力宣战。

**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分化** 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一个反封建文化的革命统一战线，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尖锐化，参加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便迅速地向不同方向分化了。

在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随声附和着文化改革的口号。买办学者胡适就是其代表人物。胡适(1891——1959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出身于官僚买办家庭。清末留学美国，从来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混入运动中来。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所谓的改良是只限于文体形式，对文学的思想和内容，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意见。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他很快就背叛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转而对封建文化反对人民革命。1919年春，他就开始大捧孔子，“要想把

无道变成有道”，并大骂法家“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当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他又跳出来叫嚣什么：“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他还发表《实验主义》一文，大力贩卖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实用主义，否定一切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孔家店进行过比较猛烈的冲击。吴虞主要攻击封建伦理道德。他认为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基础。而封建伦理道德由巩固家族制度而巩固了专制主义。他指出：“儒家以孝悌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干而不可动摇”。他又指出：封建伦理道德的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也”，“盗丘之遗祸及万世”。在《吃人与礼教》一文里，他把封建礼教斥为“吃人的礼教”。他撕下了孔道的伪装，揭露了封建仁义道德的本质。但是，他对孔老二的批判只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不打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家店，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而没有认识到孔老二的反动阶级本质，不肯彻底否定孔老二。正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在“五四”以后，这个曾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就收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颓唐、隐退、抽起鸦片烟来了。

陈独秀(188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出

身于官僚家庭。陈独秀是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在主编《新青年》，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时，在批判封建文化上，提出过一些比较激进的口号，曾经痛斥孔老二“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过批判，但在政治上却鼓吹调和妥协。他虽然反对封建军阀官僚的专政，要求实现民主，但却极端鄙视人民群众，强调中国人民愚昧和落后，认为中国人民没有争取现实民主政治的“才能”和“能力”。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去幻想“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达到统一和民主的目的。同时“他还主张一切向西方学习，把自由、平等、博爱看作是近世文明的“精华”，而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却又完全否定。以后，随着他对无产阶级的出卖和叛变，很快地沦为尊孔的小丑。

从1915年开始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一场激烈斗争，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深刻反映。在这场斗争中，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孔斗争还不彻底，但却沉重地打击了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剥去了儒家思想的伪装，动摇了孔丘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地位，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势力所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为后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

利条件。

但是，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本身受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给运动带来严重缺点。由于他们忽视和轻视人民群众，运动被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没有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由于他们不敢明确指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企图回避“批评时政”的罪名，没有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文化遗产，不能正确解决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①“五四”以后，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孔老二所代表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表现了无产阶级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彻底革命精神。

#### 四、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开

---

①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七八九页。

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具有极其深刻而广泛的世界意义，它对中国也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之下，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sup>①</sup>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和真理，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信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sup>②</sup>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积极努力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起了根本变化，它把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

<sup>①</sup>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五九页。

<sup>②</sup>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一三六〇页。

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进一步显示了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这些变化，正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变的鲜明征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转变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五四”以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革命理论，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 附录:

### 大 事 年 表

- 1839年6月3日—25日 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
- 1840年6月—1842年8月 英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
- 1841年5月29日—31日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取得辉煌胜利，是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先声。
- 1842年8月29日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1844年美、法又强迫中国先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 1843年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砸毁村塾中的孔丘牌位，大胆的向孔孟之道挑战。
-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出现。
- 1851年1月11日 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掀起近代中国第一次革命高潮。
- 1853年3月19日 太平军攻克南京，建都于此，改称天京。



- 1853年5月 太平军北伐、西征。
- 1853年 安徽、河南等地捻军起义。
- 1853年9月 上海小刀会起义。
- 1853年 太平天国颁布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 1855年 贵州省苗民张秀眉率众起义。
- 1856年 云南省回民起义，云南省彝民起义。
- 1856年10月—1860年10月 英、法等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 1856年11月 太平天国粉碎韦昌辉妄图篡权的反革命叛乱。
- 1858年5月 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我国大片领土。
- 1858年6月 英、法、俄、美侵略者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 1860年10月 英、法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中外反革命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 1860年11月 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沙俄还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

- 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 十九世纪六十一九十年代 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大力从事洋务活动。
- 1864年7月19日 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出现。
- 1881年 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及一些勘界议定书，强占我国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 1883年12月—1885年6月 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中法战争。
- 1885年6月9日 中法签订《中法条约》，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
- 1892年 沙俄无理越过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边界线，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二万多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
- 1894年8月—1895年4月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
- 1894年11月 孙中山建立兴中会，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活动。
- 1895年4月17日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 1895年5月 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主张抗日，反对议和，提出变法维新主张。
- 1896年6月 《中俄密约》订立。沙俄在中俄“共同”防止日本侵略的幌子下，攫取到黑龙江、吉林境内修筑中东路特权，后来又窃取了这条铁路沿线地段的经营管理权以及采矿、伐木等权利。
-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帝国主义在中国竞相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严重的瓜分危机。
-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 “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宣告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
- 1899年4月 朱红灯在山东平原武装起义，点燃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烈火。
- 1899年9月 美帝国主义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为其独霸中国扫除障碍。
- 1900年 义和团威镇京、津，各地反帝斗争风起云涌，形成近代中国第二次革命高潮。
- 1900年4月 英、美、俄、德、法、日、意、奥拼凑八国联军，大举进犯中国。义和团奋起抗击，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

- 1901年9月7日 清政府彻底投降帝国主义，与英、俄、美、德、日、法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 1905年8月 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宣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 1910年4月 湖南长沙抢米风潮。
- 1910年7月 山东莱阳抗捐暴动。
-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各地响应，形成近代中国第三次革命高潮。
- 1912年1月1日 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推翻清政府反动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
- 1912年4月1日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
- 1912年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
- 1914年—1918年  
8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

- 1915年1月 日本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 1915年12月31日—  
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复辟称帝及其皇帝迷梦的可耻破产。
- 1915年 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 1915年12月 “护国”战争爆发，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
- 1917年7月1日—12日 张勋复辟及其可耻失败。
- 1917年7月 在孙中山号召下“护法”运动兴起。1918年5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改组，孙中山被西南军阀排挤出去，“护法”运动陷于瓦解。1919年的“五四”运动，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0-6623

## 后 记

为了配合广大工农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简明中国近代史》。虽然征求了部分工农兵的意见，做了修改，但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不高，肯定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诚恳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解放军战士、工人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协助，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

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

1975年2月